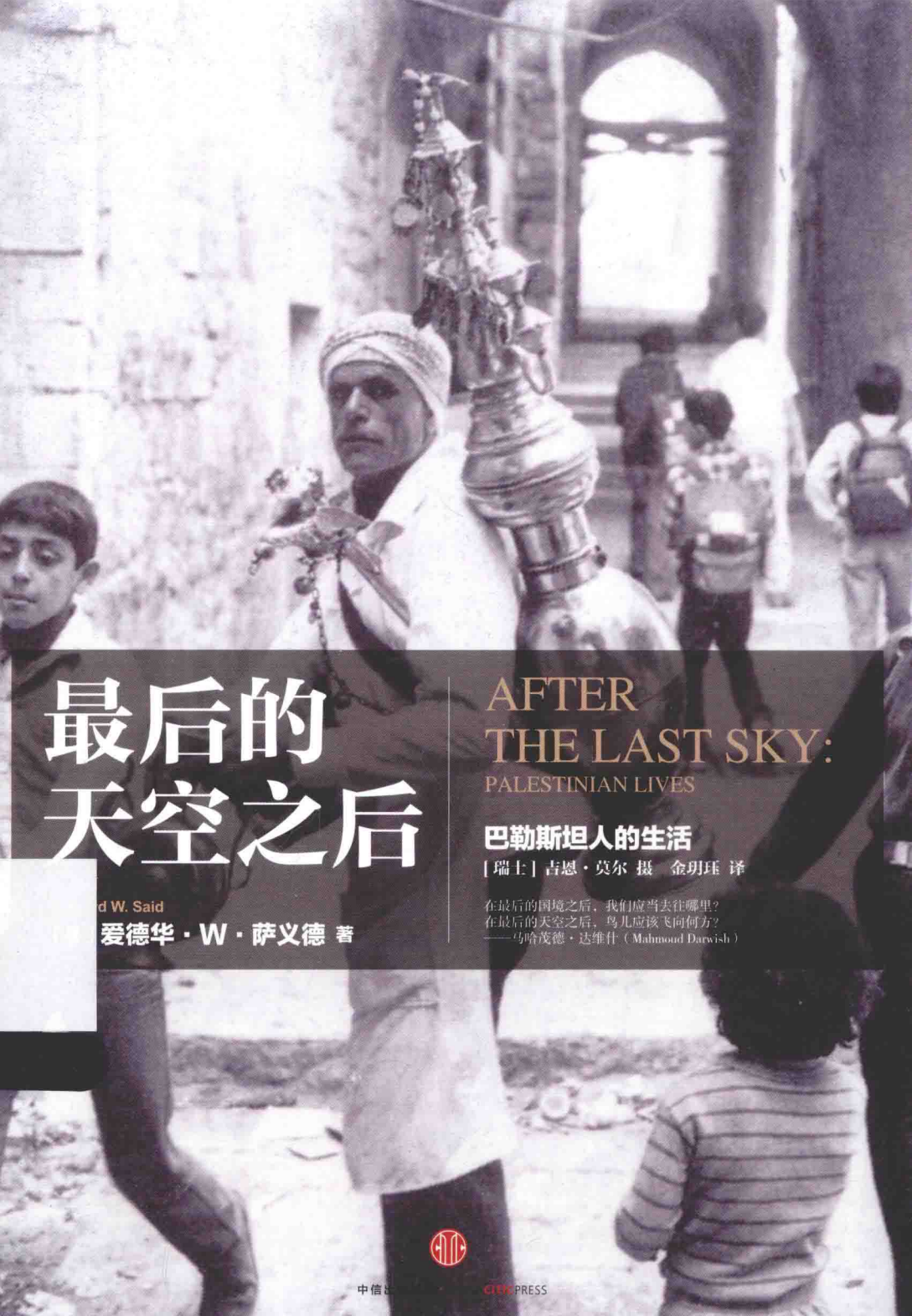




最后的 天空之后

Edward W. Said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瑞士] 吉恩·莫尔 摄 金明珏 译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该飞向何方？
——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



中信出版

CIP PRESS

深刻而沉痛的流亡之书 最动人的巴勒斯坦民族群像

巴勒斯坦人民“最有力的政治声音”、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萨义德
致力用镜头记录民生的人道主义摄影师莫尔

文字与影像、激情与忧伤、苦难与愿景
带你走进最真实的巴勒斯坦和最深情的萨义德

萨义德以一种内在化的视角向我们描摹巴勒斯坦的一切，这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内在，而是精神层面的。于他而言，巴勒斯坦是一种精神状态，这也是本书的独特之处。一场精神流亡的漫游。

——《国家民族政坛杂志》

一个非常私人化的文本，感人至深，关于一场内部的斗争……关于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全部意义，最为动人的篇章。

——《卫报》

在萨义德去世前几个月，他发现自己“仍然不知道去爱一个国家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作为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最显著的特征。

——托尼·朱特



ISBN 978-7-5086-5238-2



9 787508 652382 >

定价：38.00元



最后的 天空之后

AFTER
THE LAST SKY

THE LAST SKY
AFTER THE LAST SKY

最后的 天空之后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瑞士] 吉恩·莫尔 摄 金明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天空之后: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 (美) 萨义德著; (瑞士) 莫尔摄; 金玥珏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9

书名原文: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ISBN 978-7-5086-5238-2

I. ①最… II. ①萨… ②莫… ③金… III. ①巴勒斯坦—概况 IV. ①K9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6009 号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by Edward W. Said and Jean Mohr

Copyright © 1986, The Estate of Edward W. Said and Jean Moh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后的天空之后: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著 者: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摄 影: [瑞士] 吉恩·莫尔

译 者: 金玥珏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 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238-2/K·45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

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

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马哈茂德·达维什

致谢

ACKNOWLEDGMENTS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很多人珍贵的帮助、鼓励和关怀。伦敦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唐纳德·米切尔、纽约潘赛恩图书出版公司的安德烈·希夫林一早就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声援和支持。之后，萨拉·伯什特尔辛苦而又敏锐的编辑使这份书稿更加优美、尖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德博拉·普尔精确到位地校对书稿，尤其是协调文字与图片之间的关系。多方面亲密的朋友——戴尔德丽·伯格森和艾伦·伯格森、朱莉·戴蒙德和伊科博尔·阿马德、珍妮特·阿布－卢格德和伊卜拉欣·阿布－卢格德、理查德·波里尔——都向我提供了可靠且精确的读物。我还要向以下这些人致谢，卡马尔·布莱塔、伊卜拉欣·戴卡克、坦尼亚·纳西尔和汉纳·纳西尔、米林·戈森、弗兰·安特曼、诺巴·霍夫塞皮安、伊利·桑巴、谢菲克·阿尔－霍特，以及马哈茂德·达维什^[1]（他的诗歌勾勒出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个画面，因此，我借用他诗歌中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书名）。他们给我的建议和帮忙实在太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最后，玛丽亚姆·萨义德^[2]以特有的智慧和爱的支持始终守护着我们的努力。

爱德华·W·萨义德

纽约，1986年

译注

[1] 马哈茂德·达维什 (Mahmoud Darwish, 1942—), 巴勒斯坦著名诗人, 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山区的一个村庄。1948年,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以后, 达威什一家离开家乡成为难民。1970年, 他前往莫斯科的一所大学深造, 之后曾先后在埃及、黎巴嫩、突尼斯和法国定居。1984年出任巴勒斯坦作家和记者协会主席, 1987年当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 兼任文化和新闻高级委员会主席。达威什的诗歌主要反映巴勒斯坦人丧失故土、流离失所的悲哀和痛苦, 以及对明天的美好希望, 代表作有《巴勒斯坦, 我的国家》《玫瑰更加稀有》《在这土地上的最后夜晚》《橄榄枝》《巴勒斯坦有情人》等, 至今已出版了30多本诗集, 作品被翻译成35种语言。——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以下不再标示。)

[2] 玛丽亚姆·萨义德 (Mariam Said), 萨义德的妻子, 出生并成长于黎巴嫩。

目录

致谢 _ I

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_ 1

第一章 国家 _ 12

第二章 内部 _ 74

第三章 涌现 _ 124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_ 184

后记：贝鲁特的衰落 _ 242

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PALESTINIAN LIVES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最早来自吉恩·莫尔和我的首次见面。1983年，我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ICQP）^[1]的顾问，我建议在日内瓦主会场的入口大厅里悬挂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当然，那时我已经知道并且十分仰慕莫尔为约翰·伯杰^[2]拍摄的照片，因此我推荐联合国委派他去拍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几个主要场所。这个提议最初得到了热情的回应，于是莫尔便在联合国的特别资助下前往近东^[3]。他带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应却有些令人费解和微妙——对某些喜欢讽刺的人来说。我们被告知可以悬挂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说明，也不能有图片解释。最后的折中办法是那些放大的图片可以附上国名或地名（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奇怪而又顽固的规则时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机构一样，有关禁止文字之事我们也只得到了官僚主义的解释，而我必须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不过，我非常确切地记得反对的理由被归于“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这些国家在ICQP会议的准备期间，感觉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会延续下去的文字都是令人讨厌和在原则上难以接受的。哎，这些成员国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对于召开ICQP会议这样的想法都存在各种意见，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遗憾和可耻

的记录。巴勒斯坦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项用途,那就是攻打以色列,抗议犹太复国主义^[4]、帝国主义和美国,以及用以感慨被占领土上兴建定居点和阿拉伯土地被没收征用。除了这项用途以外,当涉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迫切需要,或者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处的极其糟糕的境况,则必须划清彼此的界限。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年中,我曾受联合国大会之命委派了至少 20 项研究,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 ICQP 会议的参加者——清一色为政府——提供关于我们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的三份报告幸存下来,成为会议的官方文件。其他的则全都被删去或否决,原因是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国家反对这条或那条原则,此处或那处暗讽,这个或那个假定的对他们主权的伤害。而以色列和美国则不愿意屈尊去理会有关该会议的任何方面。

吉恩·莫尔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起工作。我们对彼此说,让我们来使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说明,讲述巴勒斯坦人从未被人提及过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种新鲜的方式来描写和表现——从字面的任何意义上来说——巴勒斯坦人,却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并非没有人谈论或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困难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内,都谈论过很多。大量的文学已经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目前这个时刻,没有人从零开始描写巴勒斯坦,事实上还没有人亲身前往巴勒斯坦。我们过去都曾经去过那里,或者通过阅读有关巴勒斯坦的文字,体验它千年的历史和力量,或者确实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地方,对于历史或历史解读要求它承载的,几乎太过拥挤。

然而,即使有所有这一切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

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我们这个民族肯定还不如和我们同样声称拥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得有名。自 1948 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次要的存在。我们大量的经历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留下永远的伤痕，并且从此沉默，毫无踪迹。而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只是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我们的真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尼柯夫^[5]步枪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变化继续让我们的真实状况复杂化，这种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某个季节，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萨布拉—夏蒂拉^[6]难民营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马龙派^[7]民兵集体屠杀（分清楚这场屠杀是由黎巴嫩马龙派还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搞清楚谁应当为此负责）；而在另一个季节，就在这场大屠杀成为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可怕标志后不久，什叶派阿迈勒^[8]民兵，多半是在叙利亚的指使下，围攻了同样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9]，并且犯下了许多同样的暴行。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虽然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近 30 年中的遭遇是由 1948 年以色列破坏我们的社会直接造成的，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和我们认知上的——在我们 1948 年的灾难和今天的不幸之间，是否能

够划上直接的联系。

我不认为可以划出这样的联系，没有任何清楚和简单的叙述能够说明我们复杂的经历。即便以色列的确在阿拉伯国家内外对我们无情地紧追不舍，自 1948 年以来一刻不停地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甚至是巴勒斯坦这样的观念，我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遭遇毕竟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这些遭遇都是独立的。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甩开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关系，它们既无法进行简单的归类也有异于我们过去所碰到的情况。

复杂性还不止这些。我们无人能忘记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 1948 年我们遭遇的被斩尽杀绝的暴力、社会受到的摧毁，或者是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暴力，我们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还是最为可怕的，我们在彼此身上所发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经历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也强化了我们作为远离其他群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会立即回应说，我们所遭受的暴力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施加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且在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更有不公开的默契要消除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承认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动态，至少是在 1967 年^[10]以后，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这种逻辑不容许有如此简单和简化的辩解。是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胁，但是，不，我们也不是被动或无辜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激起的激情，已经证实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相当独立的力量，否认它的存在是不诚实的。

自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数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太过多样和分散，因而无法

达成这样的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地,事实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呢?我们的流离失所,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完全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太短,经历又太过多样,因此很难用系统的眼光来准确记录我们离散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太过健谈,并且经常制造麻烦,无法单纯地做一大群可怜的难民。一位年长的亲戚在过去 25 年来一直对我说:“巴勒斯坦人是一种疾病。”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因为我们不符合很多分类标准,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的朋友、敌人,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肯定地,它还普遍地为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造成麻烦。

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的简单甚至有害的表述,然后以更能够捕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描述来代替。它的风格和方法——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风格——既不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既然我们当前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剥夺、流散,但又拥有一种与无国状态不相称的力量,我坚信应当使用本质上非传统的、混合的和断续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于是,我故意设计了一种与在媒体、社会科学作品和流行小说中常见模式不同的表达形式。这是对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种个性化的表现——掩饰、遵从、自豪、软弱、悲惨、滑稽、不屈不挠、讽刺、妄想、防备、过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这不是一本“客观的”书。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来表现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不减少就连巴勒斯坦人自己也能感觉到的不同或者“他者”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

了吉恩·莫尔的照片后，觉得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过的我们。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所看到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会看到的自己一样——在同一时刻，既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又在之外。同样的双重视角渗透在我的文字中。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变换着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词，从“我们”到“你们”，再换到“他们”。虽然这些转换很生硬，但我觉得它们再现了“我们”是如何体验自己，“你们”是如何察觉别人正在观察你们，孤独时又是如何感觉“你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多面的视觉对于任何有关我们的描述都是必需的。失去国土，财产被剥夺，偏离中心，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陈述为人所闻。我们并不通常控制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我们被限制在那些用来控制或阻碍我们的空间里；我们还经常被加诸身上的过多压力和力量所扭曲。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西方不为人熟悉，它属于一个常被误解和诽谤的传统和文明。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所有描写都是翻译自我们的语言、经历以及对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然而，只有认识到这些复杂性，我们才能接近我们特性之难以捉摸的本质，或者结合公众与私人的现实，或者领会那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异常多样的个体和行为。就像吉恩·莫尔和我，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合作那样，我们希望你们——巴勒斯坦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也能同样合作。

爱德华·W·萨义德

纽约，1986年

大约两年前，当我路过纽约的时候，我去探望一位摄影师朋友，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记者、一位摄影世界中的完美鉴赏家。在热烈地交换了一阵新闻、感想和回忆后，他向我提了个礼节性的问题：

“目前你正在做什么项目？”

“一个展览，展出我 30 年来的报道和作品，以及一些色彩上进行美学探索的实验作品。与此同时，我正在完成一本新书，这本书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是关于什么的？”

“巴勒斯坦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沉默之后，我的朋友看着我，带点儿哀伤地微笑着，最后说道：

“当然了，为什么不！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主题已经有点儿过时了吗？你看，我也拍过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尤其是在那些难民营里的……那的确令人难过！但现在这个时候，谁还对那些用手从地上取食物吃的人感兴趣？而且还有恐怖主义……我还以为你会把你的精力和才能用到更有价值的项目上呢！”

我坚持完成这本书，正是要回应这类愚蠢。但我必须简要解释一下我对巴勒斯坦事业感兴趣的动机。下面这些事实和时间可以作为说明。

1925 年，我在日内瓦出生，德国国籍；我的父母亲最初都来自德国南部。

1936 年，全家申请移民瑞士，从此“背井离乡”这个词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

1949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委任我为代表，参加一支为了巴勒斯坦难民而前往中东地区的队伍。那时我刚从日内瓦大学毕业，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满怀良好的意图，并决心要圆满完成任务。我在贝鲁特地区待了大约3个月后前往杰里科^[11]，然后到希伯伦^[12]。我们发放食物，建立难民营和学校，并且实施人口普查。

1950年，红十字援助即将结束；我留下来，担任联合国在伊尔比德^[13]的地区官员。

1967年，我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旅行了两个星期。

1979年，我得到机会，前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一个月，随行陪同的是一个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朋友：这是一次伤痛心灵的经历！30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远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难民营里的帐篷被棚屋取代，难民们冬天冷得发抖，夏天热得窒息。新一代出生了，但是有何未来？有何希望？

以色列人并非唯一要被指责的，我们也全都有罪。30年来，我一直尝试着用虚伪的借口来遗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我说服自己由巴勒斯坦人中最极端的那些人引起的暴行绝不是正当的，然而我的这种遗忘其实也是有罪的。

在我从那里带回来的照片中，部分已经发表，但这些照片总是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期刊上，而我也会欣然地把这种状况解释为学术性的。这些杂志的读者群是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对左派（或者按照美国人说的自由派）的偏见，换句话说，这些读者早就已经部分地相信巴勒斯坦人主张是合理的。

我之后又数次回到中东：回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尤其是回去探访那些难民营。

在我最近一次以色列之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在我要从特拉维夫^[14]机场出发到瑞士去的时候，一名海关官员——年轻和蔼的以色列当地人——问了我几个让我觉得十分轻率的问题：

“你在我们国家过得怎么样？你住在哪里？……你有没有见到任何阿拉伯人？”

“听着，除非你把眼睛闭上，否则你很难不在以色列看到阿拉伯人。”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拜访任何阿拉伯人？”

她很困惑；我没有坚持。我冲着她微笑了一下，然后往登机口走去。是的，我拜访了一些阿拉伯人和一些以色列人，但是这并不是个向她解释，或者企图说服她的合适的时机和地点。

吉恩·莫尔

日内瓦，1986年

译注

[1] 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简称 ICQP), 于 1983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7 日在日内瓦召开, 共 137 个国家参加。会议的召开最初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等国的反对。

[2] 约翰·伯杰 (John Berger, 1926—), 小说家、画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 出生于英国伦敦, 作品包括《一个幸运的人》《另一种叙述方式》等。

[3] 近东, 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 与中东通用。

[4]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又称锡安主义, 指犹太人以回归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为目标的全球性政治运动。Zionism 一词来源于 Zion, 汉语常译为“锡安”, 是古代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 在《圣经》中锡安被认为是上帝居住的圣地和封大卫为王的圣山, 因而成为犹太教徒心目中的圣地, 具有强烈的宗教和感情色彩。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术语, Zionism 一词在 1892 年 1 月被内森·伯恩鲍姆 (Nathan Birnbaum) 首先提出。1897 年在瑞士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采用。

[5] 卡拉斯尼柯夫 (Kalachnikov, 1919—), 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 发明了 AK-47 (Avtomat Kalashnikov-47) 等。译名除“卡拉斯尼柯夫”外, 也常见“卡拉什尼科夫”。

[6] 萨布拉—夏蒂拉 (Sabra and Shatila), 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市南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1982 年 9 月, 在以色列军队的支持下, 黎巴嫩的马龙派长枪党民兵对萨布拉—夏蒂拉的千余名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血腥屠杀。

[7] 马龙派 (Maronite), 属于东仪天主教会, 是黎巴嫩最重要的宗教教派之一, 左右黎巴嫩的政治局势。据说为叙利亚人马龙 (? —410) 所创, 保持古代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 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

[8] 什叶派阿迈勒 (Amal Shi'ite)。什叶派 (Shi'ite), 伊斯兰教教派。阿拉伯语中 Shi'ite 意为党人、派别, 专指阿里的追随者, 该派以拥戴阿里及其后裔为穆斯林社团领袖为主要特征, 因内部分歧后分化出许多支派。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约有 8000 多万人, 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巴基斯坦、叙利亚、海湾各国和东非等地区。阿迈勒运动 (Amal), 1974 年成立, 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组织。Amal 在阿拉伯语中是“希望”的意思, 阿迈勒运动在黎巴嫩内战中逐渐强大起来, 并发起了“打击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运动, 最强盛时曾经拥有 1.4 万名民兵, 现已部分解散, 余部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

[9] 1987 年 2 月, 什叶派阿迈勒民兵在叙利亚支持下包围萨布

拉—夏蒂拉等多处巴勒斯坦难民营，用重炮、坦克轰击难民营，造成数万人伤亡。

[10]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闪击战，仅用6天就占领了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等大片土地。这场战争被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月战争”“六日战争”或“六五战争”。

[11] 杰里科 (Jericho)，约旦河西岸的小镇。该地区历史悠久，曾是古代巴勒斯坦的都市，如今也是约旦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2] 希伯伦 (Hebron)，约旦河西岸的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偏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伯伦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曾是大卫王的都城。据《圣经·旧约》记载，这里也是埋葬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地方。希伯伦于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13] 伊尔比德 (Irbid)，约旦的城市。

[14] 特拉维夫 (Tel Aviv)，以色列港口城市。Tel Aviv 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山丘”之意。



Chapter 1

STATES

第一章

国家

> 贝尔谢巴附近的贝多难民营，1979年。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儿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代表德国（Deutschland）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黎凡特^[1]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



> 的黎波里^[2]，巴达维难民营，1983年。

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

迁移和不安之间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3]与撒马利亚^[4]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给他们特殊的卡片来鉴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在那里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他们知道在东道国的眼中，自己将永远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里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加重了离散的巴勒斯坦人从未缓解的紧张。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5]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

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降临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他们的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这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不相符。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纤细朦胧的苍白相对照。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也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实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有时迁徙的辛酸突出得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字迹上再摹写上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而我们被置于其中。我们就坐在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抱起来，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行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名字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它们的时候，我没有任



> 泰勒什瓦，1979年。位于贝尔谢巴^[6]附近，是一个定居下来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所构成的村庄。几年以前，这些人仍然生活在帐篷里，头顶沙漠的天空。如今，唯有脚下的地毯还能让人们回忆起那段岁月。

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被拍摄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欧洲摄影师来观察他们。我想象他通过翻译依次和他们交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对他十分礼貌，或者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好像他是导致他们如此悲惨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们感到很窘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观察和记录。然而，他们却无力去制止这一切。

当 A. Z. 的父亲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子女叫进房间，进行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他的一个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他是个年纪很大的虚弱的老人，来自海法^[7]。他最后的 34 年都在贝鲁特度过，始终激动地不愿相信他已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如今，他对子女们喃喃低语着，这是一位贫穷无助的家长颤抖的最终遗言。“拿好这些钥匙和契约”，他一边指着床边那个破旧的箱子，一边告诉他们。箱子里储藏着当海法的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境时，他自巴勒斯坦抢救来的家族财产。这些关于过去的亲密的纪念品在我们当中已经无可挽回地不再流传，就像是流浪歌手吟唱的家谱和神话一样。照片、衣服、从原先的场所分离的物品，以及说话和风俗的例行习惯：被大量复制、放大、主题化、添油加醋，并且广为传播，它们缠丝结网，被我们巴勒斯坦人用来维系自己的民族身份，联系彼此。

有时，这些带着沉重回忆的物品——照相簿、祈祷的念珠、头巾、小盒子——对我来讲似乎是些累赘。我们携带着它们到处迁移，把它们悬挂在每一个新的藏身之处的墙上，钟爱地想着它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注意痛苦，尽管痛苦仍然在继续和不断加重。我们也不会去承认自己的心态已经被冻结得一成不变。最终，过去掌握了我们。我的父亲倾其一生想要摆脱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实际的地点以及它被重述和被编造出的化身。父亲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整个家族都出生在耶路撒冷。父亲是一个旧城^[8]的孩子，向游客们兜售真十字架^[11]和用荆棘编织的皇冠。但是他憎



> 安曼^[9]，1984年。拜访前耶路撒冷市长和他的夫人，他们如今流散在约旦。



> 拉马拉^[10]，1979年。一幅平凡和令人安心的街景。然而，紧张状态是恒常的。一辆路过的军用吉普车，一块飞来的石头——事件、冲突可能在任何时刻发生。

恨那个地方，他常说那个地方意味着死亡。那地方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两个断断续续的故事、一枚零碎的硬币或纪念章、一张祖父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以及两块小毯子。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有祖母面容的照片。但是当父亲逐渐年老，他开始使用旧式耶路撒冷人的措辞方式，我听不懂也从来没有在年轻时听说过它们。

* * *

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能，他们或多或少经常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人们不仅视我们为恐怖分子，而且否认或者质疑我们作为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阿拉伯居民的身份，在巴勒斯坦（而非其他地方）拥有基本的权利。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反过来把我们的存在和对以色列民主、成就及活力的赞美联系起来；在西方的大量修辞中，我们悄悄混进被纳粹和反犹分子^[12]占领的地方；我们全体除了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悄无声息和重新安置，不可能再奢望更多。除了扰乱中东和平的厚颜无耻的行为以外，我们以缺乏实际成就和没有让人尊重的特性而著称。一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说：“巴勒斯坦人可以待在这里，但是不能拥有任何权力，只能作为定居的外国人。”其他以色列人甚至更不仁慈。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夏加尔^[13]、弗洛伊德和鲁宾斯坦^[14]，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曾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屠杀的大灾难^[15]，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



> 拉马拉，1979年。

是重新安置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伤害，减缓了寻找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

巴勒斯坦内只有少数几个地方，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人们可以重新回忆起过去的快乐。偶然不经意的一瞥，那些兜售蛋糕和蜀黍的小贩们仍然在那里，仍然挑起人们的胃口。他们似乎不仅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也从过去穿越时光

来到了现在，带来和过去同样的顾客——年轻的女孩男孩，正在回家路上的骑自行车的人，到处闲逛的学生和职员。和过去一样，我们用偷偷发现的零钱（谁能记得是什么货币单位？是比索^[16]？费斯^[17]？先令？），从小贩那里买来既非优质也非经过精心烹饪的食物。蘸着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和漆树草混合调料的圆形芝麻蛋糕，或是撒着盐的煮蜀黍，品尝小贩出售的这些食品是一种奢侈的愉悦，它超越了进食这一纯粹的行为，为我们展现了食物全然令人愉悦的滋味，这种滋味和进食、汲取营养以及例行常规毫无关系。然而如今，我和那种生活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如此巨大。照片似乎多么轻易地传播，而把我阻挡在照片中场景之外的障碍又有多少可能去清除。

因为这片土地比从前更加遥远。我1935年年末出生于耶路撒冷，1947年年底我永远地离开了托管下的巴勒斯坦^[18]。1948年春，我最后一个堂兄弟也从我们家族在西耶路撒冷^[19]的房子里撤出。听说，马丁·布伯^[20]后来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过世。我在埃及长大，之后来到美国求学。1966年我来到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参加一个家族婚礼。我的父亲也陪着姐姐和我去了那里，在那次婚礼的5年后，父亲离开了人世。自从那次旅行以来，我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搬迁到了新的地方，搬去约旦、黎巴嫩、美国和欧洲。据我所知，我的亲戚当中已经没有人还居住在曾经的巴勒斯坦。战争、革命、国内斗争，把我曾经居住过的国家——黎巴嫩、约旦、埃及——变得面目全非。直到35年以前，我还能够走陆路从开罗前往贝鲁特，穿越被敌对殖民势力占领或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的区域。如今，虽然我母亲还住在贝鲁特，但自从1982年以色列入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她：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已经不

再受欢迎。事实是，如今我既不能够返回我少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也不能够在那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自由旅行。在这些我过去经常出入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和政策最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使得我们随时可能遭受逮捕或暴行。现在，再也没有比进入一个阿拉伯国家时遇到的海关和警察检查更让我不愉快的事了。

想想自1948年以来发生的巨变，每一次都有效地毁灭了我们过去生存的环境。当我出生时，我们在巴勒斯坦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小社会团体，由主流团体和这个或那个控制该区域的外部势力管理。比方讲，父亲和我都是一个很小的基督教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属于一个大许多的希腊东正教^[21]少数派，而它之外则是更大的伊斯兰逊尼派^[22]多数派；重要的外部势力则是英国，以及仅次于它敌对的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它们的统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直接面对殖民的遗产——无能的统治者、四分五裂的种族，以及殖民者对拥有相反主张的阿拉伯居民和大部分欧洲犹太人所许下的相互冲突的诺言。1948年，以色列成立；巴勒斯坦遭到摧毁，^[23]巴勒斯坦人遭受剥夺的悲惨经历从此开始。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24]导致在那里剩下的大批黎凡特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美国人、叙利亚人）被迫离开。阿卜杜尔·纳赛尔^[25]的崛起点燃了所有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复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希望，然而当1961年叙利亚和埃及的短暂联盟失败^[26]后，所谓的阿拉伯冷战真正开始；沙特阿拉伯对抗埃及，约旦对抗叙利亚，叙利亚对抗伊拉克……新的难民、流动工人和到处旅行的政党在阿拉伯世界中交叉往来。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则沉浸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27]、埃及的纳赛尔主义^[28]以及黎巴

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29]等各种政治活动中。

1967年战争之后不久就是阿拉伯石油的迅速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兴起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支独立的力量。我们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充满希望。然而，到最后，我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表现若不是直接导致，至少也是推动产生了大量不健康的现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30]、马龙教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教坚贞主义^[31]。新消费文化和电子化的经济，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中令人吃惊的贫富不均、新旧不等，以及特权阶层和权利被剥夺人群之间的差距。接着，从1975年开始，黎巴嫩内战^[32]使得黎巴嫩国内的不同教派、巴勒斯坦人以及大量阿拉伯和外国势力陷入了彼此的争斗。贝鲁特作为阿拉伯生活的知识和政治中枢被摧毁。对于我们而言，这是我们唯一重要、相对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心的终结，其核心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33]。安瓦尔·萨达特^[34]承认以色列，而戴维营^[35]则进一步瓦解这个地区的联盟，扰乱了它的平衡。1979年伊朗革命^[36]之后，两伊战争^[37]随之而来。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38]使得更多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而在萨布拉—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发生的大屠杀进一步减少了巴勒斯坦人群的数量。到1983年年底，巴勒斯坦人内部发生战斗，叙利亚和利比亚被直接卷入，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派抵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39]然而，如同我们政治命运一贯的讽刺意味，1985年，我们又在萨布拉—夏蒂拉团结起来，以抵抗由叙利亚资助的敌对的什叶派民兵。

地形的稳定和国土的延续，这些都已经从我和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中彻底消失。我们在边境被拦挡，被成群地赶进难民营，被禁止重新入境和定居，被阻止从一处到另一处旅游，我们的土

地被夺走更多，我们的生活被蛮横干预，我们的声音不能传达给彼此，我们的身份被局限在令人恐慌的小岛上，周围则是由更强大的军事势力组成的冷漠环境，用客观的术语（clinical jargon）来讲就是“完全的控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犹太复国运动的“总体规划”，据耶路撒冷的前副市长梅伦·本维尼斯特说，这是“明确无疑的宗派主义的”。他接着说：

决定定居点区域优先权的标准是连接——“连接已经存在的犹太人定居点，以创造犹太人定居点的延续性”，和分隔——“限制那些不受控制的阿拉伯定居点，并防止阿拉伯定居点的互相连接”；缺乏，“指的是没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区”。在这些标准中“包括了纯理论性规划和政治性规划的双重元素”。

——《约旦河西岸数据项目：一项关于以色列政策的调查》^[40]

延续是给他们的，那些占有统治地位的人们；而中断则是给我们的，被剥夺和被驱散的人们。

然而，当我们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伯人和其他大量巴勒斯坦群体定居者的国家都坚持基本相同的论点时，这个圈子就形成了。在那些地方，我们也同样居住在散布的难民营、区域、驻扎地和地块；但是不同于以色列的类似地点，这些地方并不是“纯理论性规划”或“政治性规划”的科学产品。安曼的巴喀难民营^[41]、科威特哈瓦利的巴勒斯坦区都只是简单地在那里存在。

巴勒斯坦人各种形式的行动、各种企图联合团结的努力，都

引来人们的猜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发展”（巴勒斯坦人经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加强）被禁止，而“改善”则被容忍，只要实际上没有太多真正的改善；只要这种改善不会变成发展。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被以色列的军事法律判定为非法；加沙的艺术家法斯·加宾因为在一幅画作中使用了黑色、绿色、红色和白色而被判入狱6个月；纳布卢斯^[42]的纳贾赫大学^[43]因为举行了一次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展览而被关闭4个月。由于我们的历史是禁忌的，对它的记述十分稀少；有关起源、家和国家的故事都只能秘密地流传。一旦公开，必然是些不完整的故事，经常极度地反复不定和曲折，总是如同用密码写成似的令人迷惑不解，并且通常使用一些令人无法容忍的形式——嘲弄式地模仿英雄史诗、讽刺文学、挖苦的寓言、荒谬可笑的宗教仪式——完全让外人无法理解。因此，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离散而断断续续的，那些被打扰和限制的空间上，是人造的和虚假的改编，这成为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标志，而那些混乱和被扰乱节拍也成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标志。在我们孩子的生活中，在他们玩耍的空地上，遍布着战争的废墟，模仿的或进口的工业技术的残骸，以及废弃的制度的遗迹。这样的结合是多么奇怪，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又是多么合适！当没有一条直线可以贯穿家和出生地、学校以及长大成人的地方，所有的事件都是偶然事故，所有的发展都是偏离主题，所有的住处都是流离失所。我们在不可名状的地方逗留，既非此处，也非彼处；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向外窥视，“驾驶”着不能移动或没有动力的车辆。随机应变和接受一切成为最合适的态度。

新一代巴勒斯坦人和1948年那一代之间的差别令人震惊。我们父母的脸上铭刻着无法理解的灾难的印记。顷刻之间，他们的

过去被干预，他们的社会被湮没，他们的生活彻底地穷困潦倒。所有人沦为难民。而我们的后代却对过去一无所知。汽车既可以被驾驶、毁坏，也可以被当作玩耍的地方。他们周围所有的事物似乎都是可消耗的、不长久的、不牢固的，尤其是在那些地方——比如黎巴嫩——巴勒斯坦人群体悲惨地被削弱或毁灭，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大部分未被记载，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无法弄清。

巴勒斯坦人没有人口普查。而如果要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和另一个联系起来，似乎必然会干涉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谋划。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普通”人当中，但这些人拥有完整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国家、延续的家族和完整无缺的社会，因此显得不可救药地遥远，令我们无法触及。巴勒斯坦的父亲应当如何



> 提尔^[44]，黎巴嫩南部，1983年。布尔杰-舍马里难民营。这辆汽车见证了一场冲突，详细情况不明。鲜花：5月，春意遍地。儿童：穿着时髦，几乎肯定是来自慈善捐赠。他们是难民——难民的孩子。

告诉他的儿女，黎巴嫩（或是埃及、叙利亚、约旦、纽约）虽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却不是我们的家乡？而当一切事实、地方甚至名字都被禁止存在，巴勒斯坦的母亲又应当如何向她的孩子证实自己内心关于巴勒斯坦的童年的亲密回忆曾经真的发生过？

* * *

所以我们就向人借用并自己拼补。巴勒斯坦人保留了雅法^[45]、耶路撒冷和其他被他们留在身后的城市的音调，尽管他们所说的语言已经变成了贝鲁特、底特律或巴黎的方言。我现在对巴勒斯坦有了大量了解，并且见到许多巴勒斯坦人，远远超过我在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了解和见到的，以及可以了解和见到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这是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受到大人的庇护，属于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但是我的经历被我相交最久也最亲近的巴勒斯坦朋友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46]所证实。虽然他对1948年以前的巴勒斯坦了解更多——因为当时他比我年长，感知能力更强也更积极——他也说和过去在巴勒斯坦相比，如今他和巴勒斯坦人有更多的接触。他写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巴勒斯坦家庭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能够建立起大量人际、社会和政治的纽带。登上飞机，我就可以见到大部分朋友。也是因为这样，我的家庭始终是一体的。每年我至少去看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一两次。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还住在雅法，我是绝不可能前去探访住在加沙的亲戚。”但是，易卜拉欣并不赞美这样的社交：“我时常有种感觉，似乎我的生活有什么东西缺失了。为了弥补这种缺失，我成倍地加强与人的交往。”



> 加沙，1979年。难民营，一个不知年龄的男孩。



> 泰勒什瓦，1979年。合影，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拍摄。

在“有所缺失”之上，是新添的现实。飞机旅行与电话交谈滋养并连接着那些幸运的人们，而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则遮蔽了那些脆弱者。

* * *

时间的发展可以不按秩序。我们的孩子就是如此，他们似乎跳过了某个成长阶段，或者更令人担忧地，他们身体或思想的某个部分达到了不合乎年龄的成熟，而其他部分却依然天真烂漫。我们没有人能够忘记那些窃窃私语，以及在某些特殊场合的宣告，说我们的孩子是使人畏惧因而要被驱逐，或者作为屠杀目标的“人口因素”。在黎巴嫩，有人说巴勒斯坦的孩子尤其应当被杀死，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应当在被他们杀死之前先杀死他们。

我们是如此易变，如此轻易地从此到彼地改变（和被改变），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如此不稳定——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基础，我们的起源遗失了根据，我们的土地和过去之间的连接断裂。这世界上没有巴勒斯坦人。谁是巴勒斯坦人？“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居民”。非犹太人。恐怖分子。捣乱者。由于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难民。证件上的名字。名单上的数目。在演讲中被称赞——巴勒斯坦民族、巴勒斯坦民族、巴勒斯坦民族^[47]——但在现实中却当作障碍和断断续续的生活。1970年被从约旦赶走，如今又从黎巴嫩消失。

这些离开和抵达没有一次是清晰和明确的。我们中的有些人离开，其他人留下。留下的，新抵达的，老的居民。有两幅画

面极好地浓缩了我们未决的生活。一是身份证件（护照、旅行文件、通行证），上面的国籍从来都不是巴勒斯坦，而总是其他的国别；而这正是我们的民族诗歌——马哈茂德·达维什的《身份证》^[48]——的主题，诗中写道：“记录！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 没有姓名——没有头衔 / 在某个国家中忍耐 / 把人们激怒。”另一个则是埃米尔·哈比比^[49]创造的佩索蒂米斯特（乐悲观主义者）^[50]，一部卡夫卡式的不囿于常规又别具一格的小说的主角，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巴勒斯坦民族史诗式的作品。佩索蒂米斯特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是虚构的，一半是历史人物，另一半则是神话创造，既充满希望又绝望无助，是每个人最钟爱的困扰和替罪羊。哈比比小说中的人物是纯粹的虚构还是在用他那极度的幻想接近真实？他是一个凭空创造出来的人物，还是还原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本质？哈比比把字词混合使用的习惯——把“乐观的”（mutafa'il）和“悲观的”（mutasha'im）相加成为“乐悲观的”（mutasha'il），再现了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表示相反含义的词语结合使用的习惯，比如把“不”（la）和“是”（na'am）结合使用成为“la'am”——这是否是一种消除区别的方法，虽然这些区别不适合我们，却必须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

* * *

埃米尔·哈比比是一个来自海法的粗犷、绝不妥协又极度喜欢嘲讽的人，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长期担任以色列议会议员，以及记者和编辑。他写的关于佩索蒂米斯特（顺别提一下，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萨义德）的小说条理



> 贝尔谢巴，1979年。贝都因^[51]营地附近，一个小菜园及其中破碎的稻草人。

混乱，因为混合了时间、人物和地点；既有虚构，又有寓言，同时也包含历史和平直的综述，其间没有任何线索来引导读者弄清复杂的内容。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巴勒斯坦文学作品，原因正是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紊乱和嘲讽。在书中，我们读到不少人物，这些人物拥有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姓名：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尤阿德”（Yuaad），这个词的意思是“应当被重复”，这是指在我们历史中留下痕迹的一连串失败，以及修饰我们叙述的宿命论公式。小说中的另一个角色是“伊斯姆·阿尔-贝瑟恩贾内”——也就是“伊斯姆·茄子”，伊斯姆是个律师，他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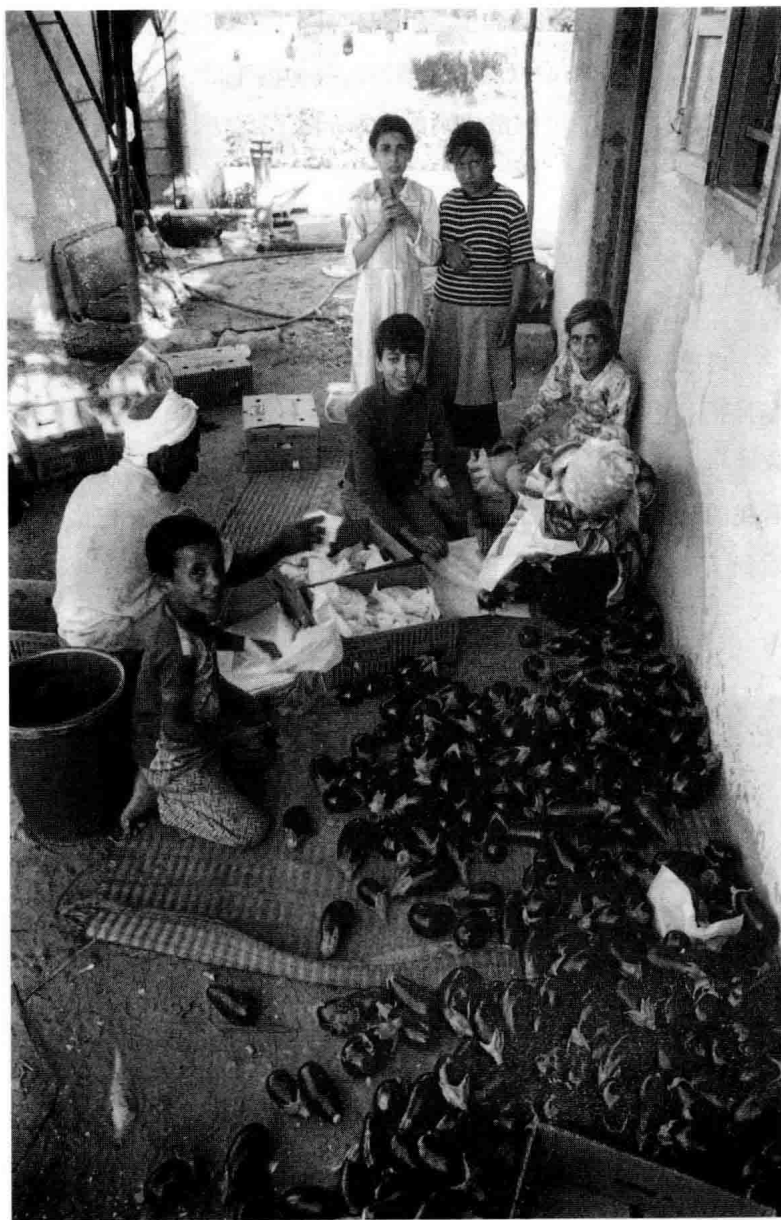
然帮不了萨义德，却照样不断出现在故事中。这就和巴勒斯坦的茄子联系起来了。我家——尤其是我父亲——一直很喜欢拜提尔^[52]的茄子，我们之中任何尝过拜提尔的茄子的人，很多年来只要再吃到好茄子，给的赞许都是“这茄子几乎和拜提尔的一样好”。

今天，当我回忆起对拜提尔的令人厌烦的赞美，或者当我在伦敦和巴黎看到与我少年时果园、农田里生长的一样的迦法柑桔^[53]和加沙蔬菜，如今却由以色列的出口公司来销售时，我们曾经了解但现在却无法言喻的富饶丰足，和如今为填充欧洲饥饿的胃口而系统地出口农产品，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蕴含着无情的政治讯息，令我震惊。土地和农民总是通过耕作劳动结合在一起，而他们收获的产品却似乎总是为其他人所享用，总是注定要在其他地方被消费。这种观察很有说服力，不仅因为印有卡梅尔山^[54]的盒子和精心包装的茄子象征着一种势力，它统治着巴勒斯坦四处延伸的肥沃丰饶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而且这也让此地的我和彼方现实之间的断裂，比起我逐渐模糊的关于巴勒斯坦的回忆和经历，要有说服力得多。

另一样更不寻常的关于蔬菜的事物出现在一篇由阿维格多·费尔德曼^[55]写的文章《军事政府的新规定：以色列政府反对茄子》里，这篇文章于1983年8月24日刊载于《首要标题》^[56]杂志上。费尔德曼在文章中说，法规第1015和1039条规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任何拥有土地的阿拉伯人必须得到军事政府的书面允许，才可以种植一种新的蔬菜——比如说，茄子——或果树。如果未经允许私自种植，那么他可能面临树木和蔬菜被毁，外加入狱一年的惩罚。

再回到背井离乡。有关我出生的详情已是如此遥远和陌生，仿佛发生在某个我听说而并不真正认识的人身上。拿撒勒^[57]是我母亲的故乡，耶路撒冷是我父亲的故乡。我所见过的照片展示着相同的农产品，以同样的一种漫不经心摆放出丰足的样子，装在同样粗糙的木箱子里。相同的人们路过，他们看着同样的海报和装饰物，心里隐藏着相同的秘密，追寻同样的利益、快乐和目标。这些都和什么相同呢？我几乎无法真正记得任何关于耶路撒冷和拿萨勒的事情，没有什么具体的，也没有什么触觉、视觉或听觉的记忆，能够经久不衰到抵抗时间，没有什么——这就是我先前所指的“相同”——不会和我曾在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照片或瞥到的场景混淆起来。

巴勒斯坦意味着离散，剥夺，对某处的错误回忆滑进对另一处的模糊记忆，对普通陶器的令人困惑的修复，以及在阿拉伯环境里分散的被动存在。人们无法平坦流畅地讲述巴勒斯坦的故事。相反，过去以及现在充满着一桩桩事件和巧合，也充满着随意。一个男人走进一条安静的小巷，经过右边的黄瓜和左边的西红柿；一个牧师走下楼梯，一个男孩猛冲下来，手臂下夹着书包，其他的男孩则在徘徊，小贩们照顾生意；一个拿着行李袋的男人向前走走过挂满装饰品的墙面；一个年轻人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两个男孩毫无目的地闲逛。西红柿、西瓜、街道、黄瓜、海报、人、茄子——并非单纯地在那里，而是由照片表现为在那里存在——渗透着含义和记忆，但仍然十分遥远。凑近一些看，并且想想这些可能性：海报是关于埃及的。装饰品产自韩国或香港。这个场景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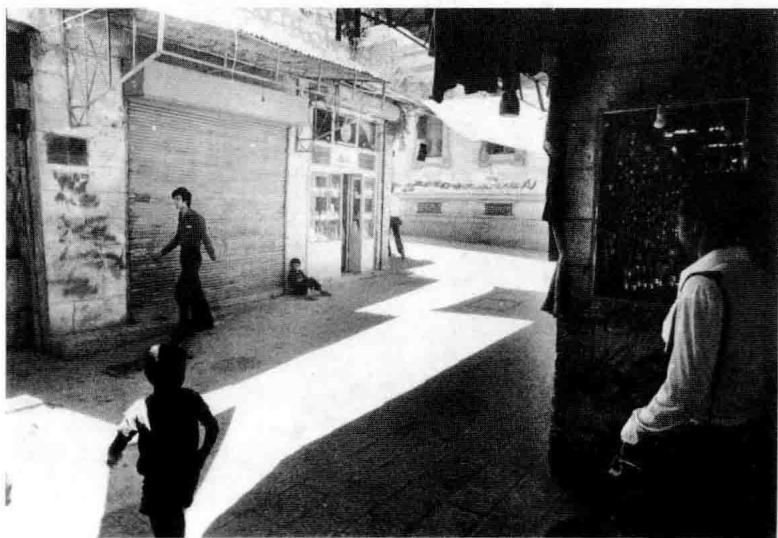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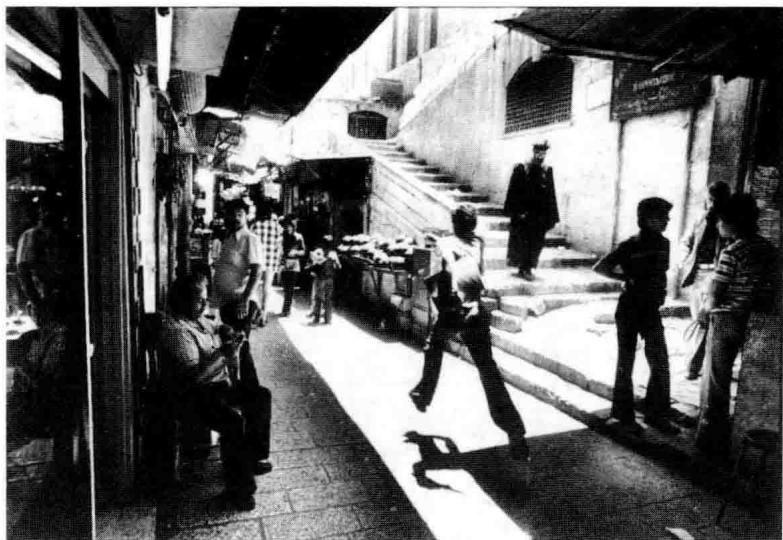
> 加沙, 1979 年。难民耕种的农场。

以色列人观察、封闭和包围。欧洲和日本的游客比我有更多出入耶路撒冷和拿撒勒的权利。逐渐地，我们的生活——就像巴勒斯坦本身一样——崩溃解散成别的东西。我们无法长久地坚持这个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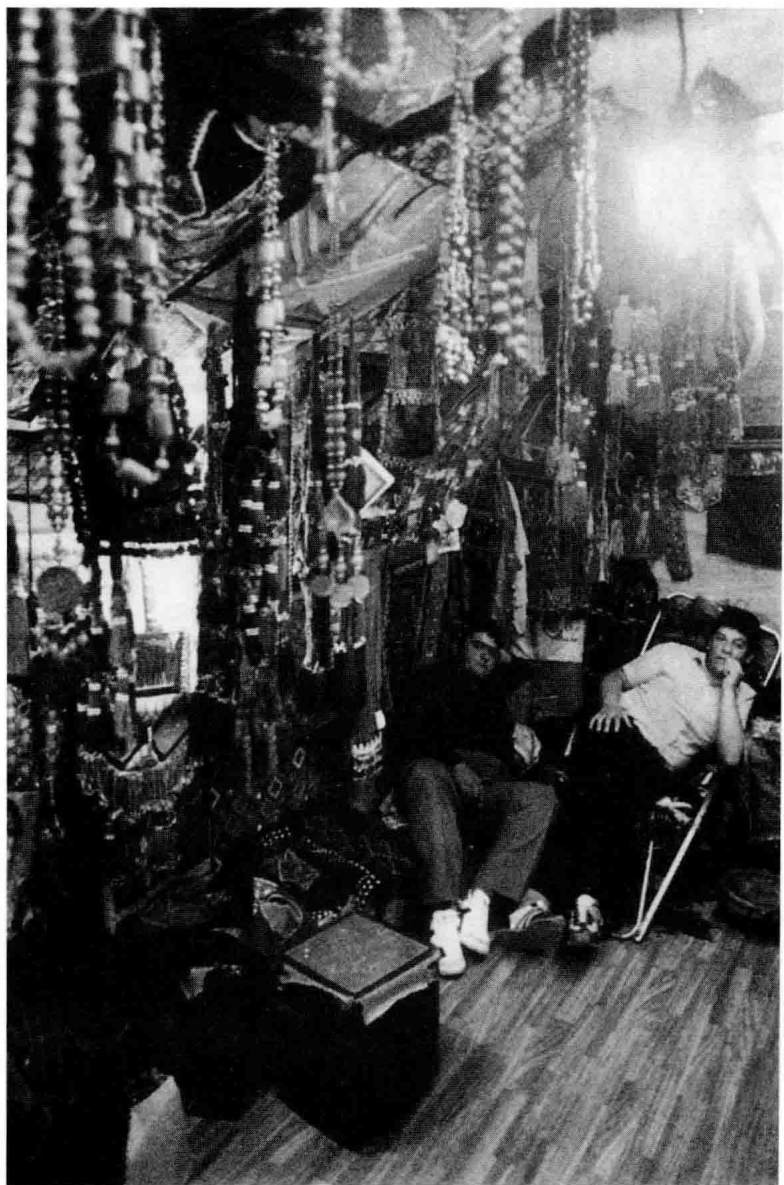
离散。最近在美国举行了一次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对话”为主题的会议，把巴以和解作为十分重要的议程内容。会议期间，观众中一人起身提问：“我是巴勒斯坦人，一个农民。看看我的双手。1948年我被人从巴勒斯坦逐出，就去了黎巴嫩。然后我又被人从黎巴嫩赶出来，就去了非洲。然后是欧洲，再然后



> 拿撒勒，1979年。奥姆·卡尔索姆^[58]的肖像。



> 耶路撒冷，1979年。街头快照。



> 耶路撒冷旧城，1984年。一家旅游商店，顾客稀少。前来的游客是美国人、瑞士人或者以色列人？

是这里。今天（他拿出一个信封）我收到了一份文件，叫我离开这个国家。能不能请你们这些学者中的哪一位告诉我：现在我应该去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他是整个会议的尴尬，我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这是我的遗憾。

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宣称主权，基本上不被人承认，更少有人会把这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联系起来。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巴勒斯坦的主张是充满矛盾的，阿拉伯国家用数不尽的语言、姿态、威胁和诺言来认可巴勒斯坦的主张。毕竟，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不把巴勒斯坦当作本国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象征。然而，尽管有这些公开声明，我们仍然无法真正知道他们——所有的“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的每一个朋友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切已经持续了太久。

就让加森·卡纳法尼^[59]的中篇小说《太阳里的人们》来说明我们的恐惧，我们害怕除非我们向“他们”施压，不然他们就会允许我们消失，但我们也同样担心如果我们逼迫他们，他们要么谴责我们威吓了他们，然后在他们的境内镇压我们，要么就把我们变成代表他们民族主义的简单符号。《太阳里的人们》写到，三个藏身于油罐卡车内的难民被非法运入科威特，当司机和卫兵们交谈时，这三个人（巴勒斯坦人）在车内死于窒息——就在阳光底下，被人遗忘。司机的健忘并不值得谴责，该指责的是他们的沉默。“你们为什么不敲打车壁？为什么不猛敲车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害怕施压。

巴勒斯坦人如同商品。制造我们，就像生产灯、挂毯、篮子、刺绣和珍珠母装饰品一样。我们把自己变成并非出售而是接受审查的物品。人们向我们提问，如同是在调查一件公开的案件，“你们巴勒斯坦人究竟要什么？”——问得就好像我们能够把要求用一个简洁的词组来表达似的。我们所有人都谈到“归还”，但我们表达的真是字面上的含义？还是“我们必须回复自我”？我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要点，尽管我知道很多巴勒斯坦人完好地要回他们的房子和生活方式。但是真的有地方适合我们，适合我们不断积累的回忆和经历吗？

我们真的存在吗？我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存在？

当我们距离属于我们过去的巴勒斯坦越遥远，我们的身份就越不稳定，我们的生活就越受到打扰，我们的存在就越断断续续。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一个民族”？抑或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民族”？这些庞大的问题又和我们彼此间、我们与他人间的亲密关系有什么相关？我们时常在书信的最后写上“巴勒斯坦的爱”或“巴勒斯坦的吻”之类的短语。但真的有巴勒斯坦的亲密和拥抱这样的东西吗？还是说它们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单纯的亲密和拥抱，既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为某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

这个问题十分接近我们面临的核心的两难选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阿拉伯人，且不说目前的实际状况，阿拉伯主义的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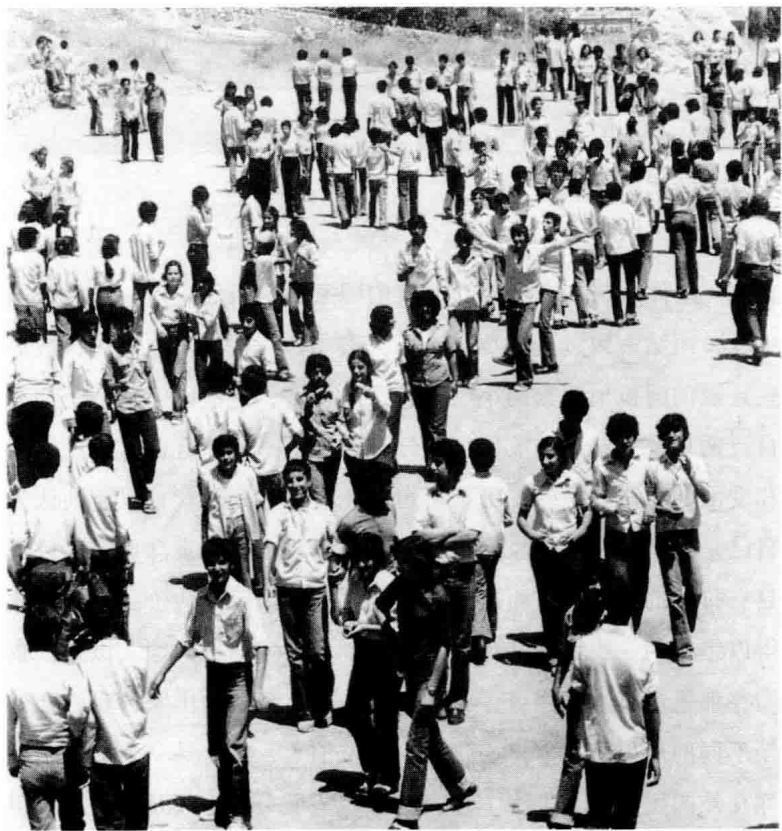


> 耶路撒冷，1979年。

念——这曾经是一个自豪的阿拉伯国家的信条和论点，摆脱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受人尊敬，强大有力——正在快速消失，被那些狭隘的阿拉伯国家的小心防备逐渐瓦解，这些国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传统——部分虚构，部分真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和受限的身份。另外，巴勒斯坦已经被以色列取代，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国家，这种带着极强攻击性的观念导致以色列具有排他的民族性，而这是在我们民族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才得以维持的。我们不是犹太人，除了作为定居的外国人以外，我们在那里没有纳身之处，我们是外人。在阿拉伯国家，我们则处于不同的地位。在那里，我们是阿拉伯人，但这是一个把我们排除在外的民族主义进程：埃及为埃及人服务，由埃及人领导，伊拉克为伊拉克人服务，由伊拉克人领导，这些过程不能包括我们，

因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激烈的民族复兴是一个单独孤立的现象。所以我们和其他阿拉伯人相同，但又是区别的。我们只能以阿拉伯人的身份存在，虽然黎巴嫩人、约旦人、摩洛哥人、科威特人等等也作为“阿拉伯人”而存在。

再加上我们在维系自己为一个集体中所遇到的困难，你就可



> 加利利^[60]，拉马村，1979年。一所非宗教高中，学生来自附近的36个村庄。

以有一些理解，我们往往是感到多么茫然、孤独和独一无二。

如果剥去巴勒斯坦人姿态中偶尔的过分自信和尖刻，你也许能够看到一种难以捕捉、微妙但又被完美表现出来的身份感。巴勒斯坦人还没有正式形成表述这种身份感的语言，也没有完全搭起表述的环境，就像那抓着父亲膝盖的小女孩，用羞涩的目光，好奇而试探地打量着给她拍照的陌生人。她的目光让人回忆起那不受欢迎的出生，那在黎凡特农田里，突如其来地降生的一个小生命，紧跟而来的就是剥夺、军事和政治暴力、与一神论宗教在最深处的持续而神秘的纠缠——耶稣的化人、复活、肉体升天，



> 安曼，1984年。儿科诊所。



> 西顿^[61]，黎巴嫩南部，1983年。一个难民妇女正在给她的丈夫写信，她的丈夫目前正被关押在安萨的难民营中。

先知穆罕默德^[62]的天堂，还有耶和华对他子民的圣约——这一切都在耶路撒冷纠结在一起，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天堂的最高地点^[63]。

这是一个世俗的世界，充满了疲惫和奇迹般复兴的能量，到处是美国人制造的香烟，从各种笔记本和“行动记录”里撕下的小纸片四处飘动，上面用一次性的笔，记录着我们渴求的东西、失踪的人们，以及对官僚机构的要求。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困境：要在一个没有余地留给你的系统里寻找一个“官方”的位置，这就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解决手中文件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寻找失踪的爱人、准备一次旅行或进入一所学校就读。结构与解构，我们与人商议谈判的只是短暂如蜉蝣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拥有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且只对越来越小的部分还有影响力。

* * *

令人惊讶的是巴勒斯坦散文和散文体小说在形式上的不稳定性：从某种狭隘的意义上讲，我们的文学总是尝试着要表现难懂且复杂的现实。以色列和西方的大部分文学评论家关注巴勒斯坦文学作品记述了什么事情，表达了什么人物，传递了什么情节和内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但是，巴勒斯坦文学的形式才是应当被关注的。尤其是在小说中，为了完成某种形式，作者们努力去创造一个连贯的场景，这种叙述可能会战胜表现当前现状的理论上的不可能。一部典型的巴勒斯坦文学作品总是会有这个特殊问题，它既是情节上的问题也是作者进取心所固有的。在卡法尼的《太阳里的男人》中，大部分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伊

拉克城镇的满是灰尘的街道上，在那里，三个巴勒斯坦人必须向“专家们”恳求和讨价还价，把他们偷偷带过边境进入科威特。迫于生活的离散和混乱，这些巴勒斯坦人需要为自己在生活中凿开一条道路，因为生活对他们而言绝不是别人赠予或稳定的。就像是他们被迫离开的那些土地的历史一样，他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在改善或称心之前被人干扰；因此每个人都丢下家庭和责任，去满足——不成功地——当前的紧急需要。卡法尼的句子表现了这种不稳定和波动起伏——现在时态服从于过去的回声，视觉动词让步于听觉或嗅觉的动词，一种感觉与另一种互相交织——努力抵抗着严苛的现实，保卫那些尤其珍贵的过去的片段。这样，太阳里的男人的不稳定现状再现了作者自身不稳定的状态，两者彼此共鸣。

因而，我们所特有的模式就不是那种场景逐一发生的叙述，而是破碎的记叙、断断续续的结构以及自觉上演的证词，这叙述不断被它自己、它的责任以及它的局限所阻碍。

* * *

所有的巴勒斯坦的建筑都把自己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废墟。过去让人们引以为荣的家族房屋（村庄、城市、营地）如今已经遭到破坏，被人抛弃，或者为别人所拥有，这样的主题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中随处可见。每一栋新的房子都是一个替代品，而且依次被另一个替代品所取代。这些地方的名字从私人的（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塔布什^[64]曾经华丽地描述过拜特纳提夫的美丽，那是一个靠近伯利恒^[65]的村庄。1948年，拜特纳提夫被以色列的推土机彻底毁灭；塔布什寡居的母亲如今住在约旦的杰赖什，

而塔布什自己则住在巴黎)一直延伸到那些官方的或公共机构的废墟地——代尔亚森^[66]、泰勒扎塔、比林姆和伊克里特、埃纳尔希尔维^[67]、萨布拉、夏蒂拉以及其他。甚至“巴勒斯坦”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有趣的是,它已经作为挽歌的主题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新闻、论文及文学作品中。在哈利姆·纳萨、伊扎特·达瓦扎、卡利尔·贝达斯以及阿雷费拉雷夫^[68]的作品中,巴勒斯坦的毁灭早已被事先预言。

* * *

所有的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



> 西顿, 黎巴嫩南部, 1983年。埃纳尔希尔维难民营。时间流逝: 毁灭, 重建, 再毁灭。

可能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从这个辩证关系衍生出一系列的英雄和恶人、开国者和野蛮人、受人尊重的名著和被人轻视的对立面，这表达了一种文化，从它最根本的民族自我意识，到它纯净的爱国主义，最后到它粗鄙的侵略主义、仇外以及排他主义的偏见。对于巴勒斯坦的文化而言，奇怪的是，它的民族身份更经常地被人感觉是“他者的”。“巴勒斯坦”对于其他人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巴勒斯坦人在感觉巴勒斯坦密切地属于自己的同时，也会同时感到它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同样急迫的重要性。“我们的”但并非完全是“我们的”。在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而言具有核心的争辩意义。1948年以后，巴勒斯坦仍然有阿拉伯人居住着的地方被贴上了额外的标签，成为犹太国家中“非犹太人”的部分。甚至一张阿拉伯小镇的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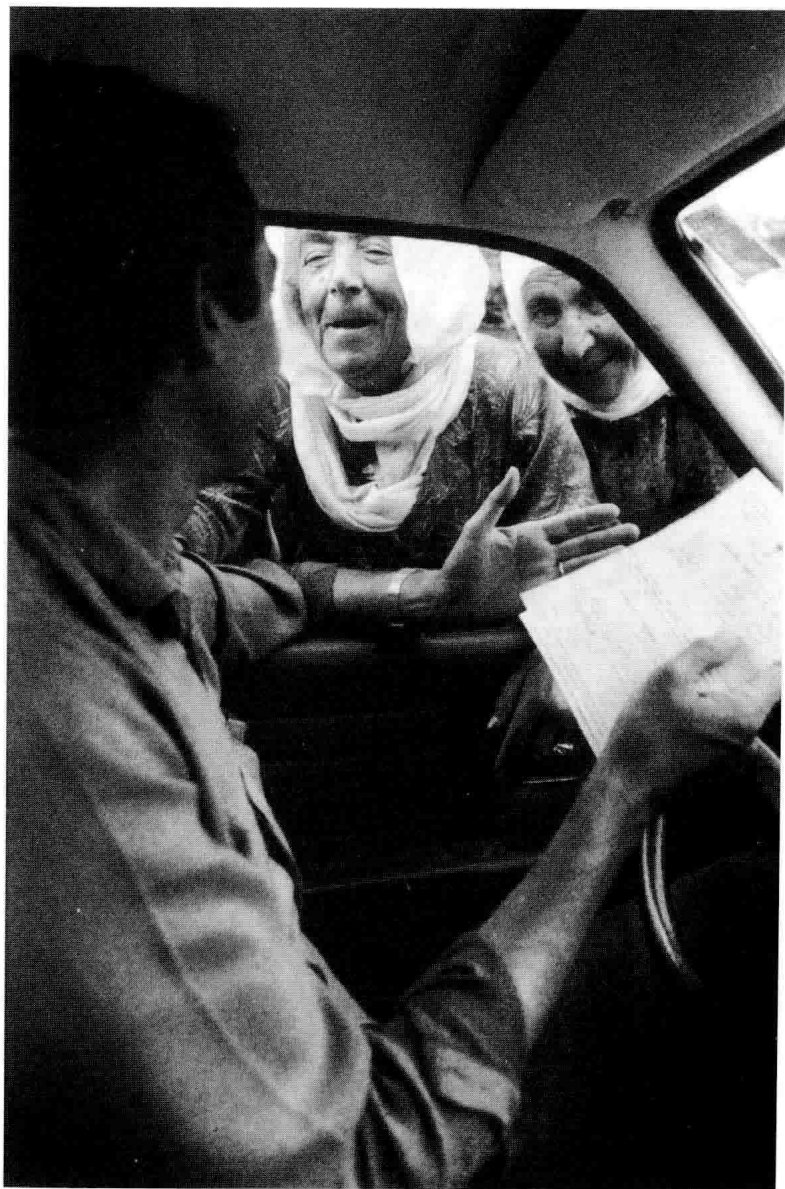


> 阿拉伯的拿撒勒，1979年。拍摄自上拿撒勒。

片——好像我母亲出生和长大的拿撒勒——也能表达这种疏远的观点。由于这张照片摄于拿撒勒城外(事实上,照片拍摄于上拿撒勒,这是附加在拿撒勒城的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地方,建于环山之上),它把巴勒斯坦表现为“他者”。我从来不了解拿撒勒,所以这是我有关拿撒勒的唯一印象,一个“他者”印象,拍摄自“外面”,上拿撒勒。

这样一来,里面的人就成了城外的人。不仅我们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隔离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难以逾越,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彼此隔离的生活。虽然有这些阻碍,我们仍然保持着热络的联系。今天,巴勒斯坦人的天赋表现在跨越隔离和清除障碍,这是些不能减轻疏远、中断和被剥夺的行为,反而只能使这一切更加戏剧化和清晰可见。我们仍然残存着,就像托菲克·扎亚德^[69]那首名诗《二十项不可能》中写的那样,和让我们离开相比,“在银河里捕捉煎鱼”“犁耕大海”“教鳄鱼说话”要简单得多。以色列人无法比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统治着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处在边缘地带,这个画面不会消失。每一项关于我们不存在的声明,每一次要让我们秘密消失的企图,每一回要证明我们从未在那里存在过的新的努力,都只能引出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多否认?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精力?究竟什么没有在那里?会不会就是因为,尽管我们身为外国人,我们却用执拗的道德声明不断追踪着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坚持(就像是公证人巴特尔比^[71]那样)“我们更喜欢不要”,不要离开,不要永远放弃巴勒斯坦?

要证明我们取得的无论多么细小的成功,证据并不是我们已经夺回家园,或者取得了新的土地;而是,一些以色列人已经承



> 提尔，黎巴嫩南部，1983年。拉希戴难民营：一个当地的官员在为国际红十字组织收集难民家属的信件。



> 卡兰迪亚，靠近拉马拉，1967年。“六月战争”^[70]之后的几天：在照片的前景，一个以色列军官在沉思。窗外是一个年幼的村民。



> 耶路撒冷，1979年。左翼以色列知识分子和阿拉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话。

认在巴勒斯坦和我们分享共同空间的可能性。鉴于目前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这一计划无疑是冒险且不切实际的，但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这样的计划却是实际的，而且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对于双方而言——合乎情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举出自己特殊的例子，来说明以色列人跨越阻挠，对我们施以人性的帮助。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例子是无畏的以色列律师为巴勒斯坦的政治犯辩护，或者试图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征收，以及巴勒斯坦人遭受集体处罚；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会马上想起萨拉·塔阿马里^[73]的证词——塔阿马里在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时被捕，随后被关入安萨监狱，成为那里的巴勒斯坦囚犯的领袖——他的证词中说，一个拥有官方地位的以色列人（狱警或军官）阻止残暴的行径，或显示出一些人性的清晰迹象和同伴感情。对我而言，



> 拿撒勒，1979年。一个市立的幼儿园，孩子们由修女们照管着。



> 安曼，1984年。巴喀难民营，这是约旦最早的难民营之一。基督教女青年会^[72]正在照管一些幼儿园里的孩子。

如果远离那些场景的可怕压力，我认为所有以色列（或非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于他们民族施加在巴勒斯坦民族身上的不公正，都有着精确的见证，这就划出了一个共同的领域。结果总是会形成一种友谊，其深度和我对他们在面对最为诽谤的攻击时表现出的坚韧和信念而感到的敬意成正比。的确，很少有人能够拥有像伊斯雷尔·谢哈克^[74]、利娅·兹厄马尔^[75]、费利西娅·兰格^[76]、诺姆·乔姆斯基^[77]、伊兹·斯通^[78]、埃尔默·伯杰^[79]、马蒂·皮莱德^[80]，以及其他很多在黎巴嫩事件中勇敢起来反对的人们那样的勇气和原则。

很少有机会能让我们巴勒斯坦人，或者我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真正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触及，甚至沉浸在我们彼此的敌意。就算没有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运动者之间的斗争，也会有来自宗教的压力，来自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以及来自家庭、同辈和同胞的压力，每一种压力都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逼迫、挤压、刺激着我们从童年到成熟。

在这样的环境中，了解本身也成了一种危险和混合的行为，被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化解的对立所装饰着。孩子充满着好奇的希望和未受指引的能量，引来教会和政府的监管力量。幸运的是，在这里，人类活动中渴望创造的精神坚持着自己的权利——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不能从根本上耗尽或者控制住潜伏在教室、操场和家庭里的各种可能性。整齐排列的桌椅，天主教会学校里在修女的看管下守规矩地围成一圈背诵课文，这些都是可以吸收到比官方所准许的更多知识和经验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孩子们到处探索，他或她的思想和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中到处漫步，尽管这两者在现实中都受到限制。在一所老师是虔诚穆斯林的学校

里,孩子喜欢扰乱或反对纪律和安排的倾向,让他或她离开了课桌,打破模式,寻找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能性。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紧张依然存在,但这种紧张总好过和平的被动,或者对权威毫不抵抗的赞同。

此时此刻的压力是要寻求一个解决巴勒斯坦此时此刻危机的答案。当我们的对话者,我们的“其他人”——阿拉伯国家、美国、苏联、以色列、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们——能够奢侈地拥有一个国家,其中的公共制度正常地运行,不受到生存或灭亡这样的问题所困扰,而我们却还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81]的下方,听着不带任何修辞的质问,“你们巴勒斯坦人什么时候才会接受解决的方案?”——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就将从此消失。于是,我们的午夜时刻就此到来。

很难知道究竟有多少令人厌烦的、一再重复的对我们的担忧是怀有恶意的挑衅,其中包括无止境的说教,说巴勒斯坦人需要提出个清晰的渴望和平的声明(好像我们控制着决定因素似的!),又有多少这样的担忧是真正的——即使带有同情心的——无知。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再像5年前那样不耐烦。的确,我们的集体境况比过去更加不稳定,但我发现巴勒斯坦人中有种普遍的内在改变,我们中很多人觉得有必要去巩固和收集那些仍然存在的并且可以得到的巴勒斯坦生活的碎片。这完全不是清静无为,也不是顺从。相反,它从自然的冲动发展为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纷杂的事件扑面而来,以至于我们无法把生活当作生活来享受,无法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来反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现在身处何方,以至于我们不能重新掌握、修改、再次理解那些喧嚣的经历,未经我们的同意,我们就已经被迫站立在这喧嚣的



> 耶路撒冷，1984 年。



> 新塞尼尔（New Seniel），在拉马拉和纳布卢斯之间的一个村庄，1979 年。

最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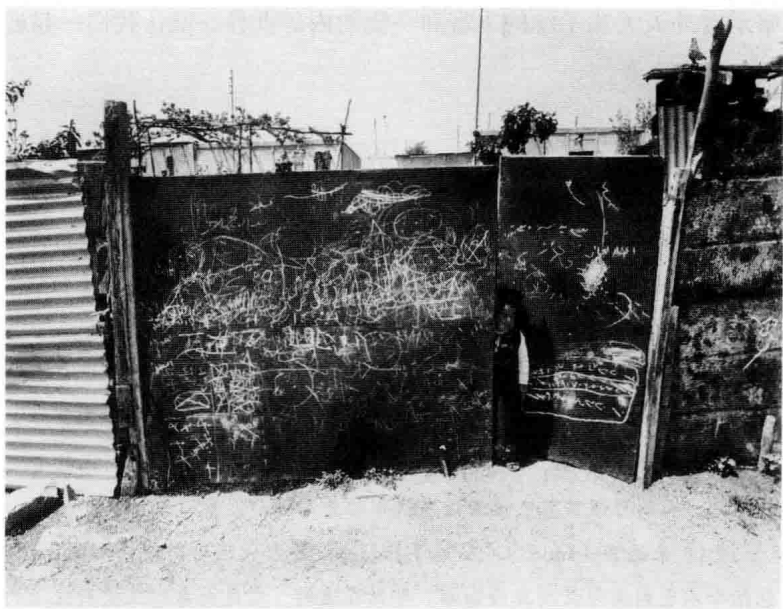
在吉恩·莫尔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密集而分层的现实包围着一个细小但明显成型的人群，很好地表现了我们超然于那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世界的经历。对我而言，这个在距离拉马拉不远处所拍摄的画面——四个人身在其中，但又和周围浓密的植物隔离，台阶，好几层平台和房屋，右边一根单独的电线杆——是一个私人的、明确的、几乎是普鲁斯特^[82]式的对巴勒斯坦的再现。回忆：1942年夏天，那时我6岁，我们在拉马拉租了一栋房子。我记得，我父亲当时患有高血压，正在从神经衰弱中康复。我记得他性格孤僻而且经常抽烟。母亲带我去当地的一所弗兰兹学校观看杂耍表演。演出下半场时，我离开礼堂去上厕所，但是因为什么我不能（直到现在也没有）理解的理由，童子军般的引座员不让我回到礼堂里。我永远心酸地记得，那时我所突然感到的距离感，远离熟悉和愉悦的一切——母亲、朋友、演出；突然，我舒适生活中的这一裂缝，教会了我分离、孤独和苦恼厌倦的含义。除了等待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尽管不久之后，我妈妈就来查看我是否出了什么事。我们立刻离开了那里，但在那之前，我透过门窗偷偷地看了一眼发亮的舞台。那一眼所看到的画面就像是望远镜里看到的隔绝空间里的小人影，这个画面在之后的40多年中，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如今又再现在吉恩1983年所摄照片那经过校准和转化的中心。我此后再也没有在拉马拉附近的任何地方进行过冒险。我对拉马拉的了解，就像是我对这张照片所拍摄的具体位置一样毫无所知；但我肯定拉马拉会像这张照片一样，立即显得非常熟悉。

我个人的过去就印刻在这当代约旦河西岸平静而又充满田园

风光的场景的表面上。我并不是唯一观察这个场景的人。照片的左面有一个孩子也在观察。还有来自瑞士的摄影师，富于同情心、充满好奇而又沉默无声，以及无处不在的以色列安全机构，他们通过占领的钳夹，统治着约旦河西岸和居住在这里的人群。而那些平台和繁复的层次：它们究竟是用于日常生活，还是如同监狱里——比如皮兰纳西监狱——那可怕的阶梯一样没有出路，只是用来监禁囚犯。左右两边浓密的树叶填充着画面，但是它们同样冲击着被包围其中的单薄生活，就像是太过复杂的回忆或一段历史，让人无法整理出头绪，它比主题更加庞大，也比任何人关于它的意识更加丰富。

高压输电网让人想起了的黎波里的梅赛德斯轿车。它没有被吸收同化，其现代性和力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在第三世界中，显得十分突出。另一段童年时代的回忆：从埃及开车穿越西奈山^[83]进入巴勒斯坦，我们会看到成排的电话和高压电线铁塔陪伴着空荡荡的道路，道路用碎石铺成，道路所穿过的则是更加空旷的沙漠。我会问自己，它们是谁？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它们在思考些什么？当我们停车活动腿脚的时候，我会走到一根电线杆前，试图在它那阴暗焦黑的表面寻找到一些生命、身份或意识的痕迹。有一次，我在上面刻上了我名字的缩写 EWS，希望在回程途中能够找到它。当我们疾驰而过时，它们看起来完全一样。我们没有停顿。我之后也再没有从那里驾车经过，如今我也不被允许从那里经过。我想在那个场景中，记录下我的存在，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

私人的回忆和眼前的社会现实，似乎被这孩子和三个大人之间的小径连接起来，孩子沉浸在他私人无声的世界里，而这三个



> 入口，杰赖什难民营，靠近伊尔比德，1983年。

大人则在成年、工作和群体的公共世界中。这是一个空旷得有些贫乏的空间，多沙、多石且杂草丛生。照片中的所有力量都从左边的树，戏剧化地向右边的树移动，从可见的被包围起来的家庭生活（阶梯、房屋、平台），向拥有强大力量和权威的不可见的更加庞大的世界移动。我想知道这四个人究竟是不是有关联的，还是说，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只是凑巧像那不可见的力量一样，对自己所居住的空间漠不关心。于是，这也是一张关于潜在的、即将到来的荒芜的照片。又一次，我为巴勒斯坦人生命的短暂、脆弱和太过轻易的动荡而感到沮丧。但是另一个动作、另一种感觉做出了回应，那是照片中建筑上的两处醒目的入口，这两个入口

暗示着外人无法了解的丰富和一流的内部世界。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看个究竟。

译注

[1] 黎凡特 (Levant)，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 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Sham 或 Semite (指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如今，黎凡特人主要指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和伊拉克人。

[2] 的黎波里 (Tripoli)，黎巴嫩北部港口城市，位于阿里河口，是北黎巴嫩省的首府。的黎波里建于公元前 700 年，现为黎巴嫩全国第二大城市，黎巴嫩的商业、工业和旅游中心，为了区别于同名的利比亚首都 Tripoli，人们习惯将黎巴嫩的这座城市称为东的黎波里。

[3] 朱迪亚 (Judea)，又写作 Judaea，是古代巴勒斯坦南部的山区，包括今以色列南部及约旦西南部。耶稣在世时，它是由希律王室所统治的王国，也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朱迪亚与撒马利亚”一词，现在大多被“约旦河西岸”所取代。

[4] 撒马利亚 (Samaria)，又写作 Samaria、Shamron，在《新约》中指的是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山区，位于古代巴勒斯坦与约旦河间，是古代巴勒斯坦的城市，也曾经是古代以色列王国首都。

[5] 东方诸国 (Orient)，指的是地中海东部的国家。

[6] 贝尔谢巴 (Bersheeba)，又写作 Beersheba，以色列南部城市，是以色列的第五大和内盖夫沙漠上最大的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创世记》，被认为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之间许愿的地方，因此也被称作“许愿之井”。贝尔谢巴的居民以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犹太移民为主。贝尔谢巴周围大多为犹太人的卫星镇，以及七座阿拉伯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小镇。

[7] 海法 (Haifa)，以色列西北部城市，拥有约 30 万人口，是以色列的第三大城市。海法位于地中海的海法湾，以及卡梅尔山脚，可能建于公元 3 世纪，现在是以色列主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

[8] 旧城 (Old City), 耶路撒冷分为旧城和新城。旧城具有典型的东方色彩, 多清真寺、教堂、集市以及古犹太教会堂等, 各种宗教圣地和古迹遍布; 新城则是政治、经济、工业和文化区。

[9] 安曼 (Amman), 约旦首都以及全国最大的城市, 位于该国的中北部。这个地方史前时代就有人居住, 罗马和拜占庭统治时期称为费拉德尔菲亚 (Philadelphia), 公元 635 年阿拉伯人征服此地, 始称安曼。阿以战争后, 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涌入, 人口激增, 难民问题严重。

[10] 拉马拉 (Ramallah), 巴勒斯坦城市, 在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西北 15 公里。

[11] 真十字架 (the True Cross), 又译圣十字架。根据基督教传统, 指的是耶稣被钉死时的十字架。

[12] 反犹分子 (anti-Semites), 指仇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人。Semite, 闪米特人, 古代居住在近东和北非的讲闪语的民族中的一员, 包括阿拉伯人、阿拉姆人、迦太基人、埃塞俄比亚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 今特指犹太人。

[13] 马克·夏加尔 (Marc Chagall, 1887—1985), 超现实主义代表画家, 出生于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后旅居法国。他的绘画初期受立体派影响, 后转向超现实主义。

[14] 安东·鲁宾斯坦 (Anton Gregoryevich Rubinstein, 1829—1894), 俄国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 出生于犹太人家庭。他奠定了俄罗斯钢琴学派, 创作了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 包括歌剧《恶魔》等, 还创立了彼得堡音乐学院。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爱因斯坦、夏加尔、弗洛伊德和鲁宾斯坦都是犹太人。

[15] 大灾难, 大屠杀 (Holocaust), 14 世纪首次出现于中古英语, 表示在祭坛上完整焚烧公兽以示对上帝的虔诚, 其中心含义是完全的毁坏。后来被用于专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现在有时也被扩展到指纳粹对其他民族的大屠杀, 或包括“二战”爆发前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

[16] 比索 (Piaster), 也有翻译成比阿斯特, 是埃及的辅币。

[17] 费斯 (Fils), 伊拉克、约旦、科威特的货币单位。

[18]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 1922 年开始, 直到 1948 年结束。1922 年 7 月, 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划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19] 西耶路撒冷 (West Jerusalem), 耶路撒冷分为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 这并不是个行政区划概念, 而是政治、地理甚至民族的概念。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原本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城市的耶路撒冷被阿以双方的停火线由北向南切割为东、西两部分。东区被约旦 (当时叫外约旦) 占领, 西区被以色列占领。由于停火线在以色列地图上绿色的, 所以又称为“绿线”。以色列建国前, 大量犹太移民居住在新开发的西耶路撒冷, 故西耶路撒冷又称犹太区; 东耶路撒冷过去一直是阿拉伯人占人口的绝对优势, 因此被称为阿拉伯区。1950 年以色列宣布其占领的西耶路撒冷为首都。1967 年以色列夺取东耶路撒冷, 并于 1980 年 7 月通过法案, 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恒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 但这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95 年 12 月 4 日, 联合国通过决议, 将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视为非法。

[20] 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1878—1965), 20 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神学家, 出生于德国, 后定居耶路撒冷, 著有《我与你》等。

[21] 希腊东正教 (Greek Orthodox Christian), 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 由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来。希腊基督教东正教会是有 2000 年历史的最早的教会, 也是当今东正教中心之一。

[22] 伊斯兰逊尼派 (Sunni Islam), 伊斯兰教教派, 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 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 85% 以上。穆罕默德去世后, 因哈里发继承权问题, 伊斯兰教内部开始分裂, 出现哈瓦利吉派、什叶派、穆尔吉埃派等政治宗教派别。大约至 10 世纪下半叶, 穆斯林的主流派开始自称为遵奉逊奈的人们, 即逊尼派, 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派。他们承认最初的四位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 称“正统哈里发”。

[23] 1947年,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反对联合国做出的分治决议,挑起战争。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攻占巴勒斯坦,以色列正式建国,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

[24] 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又被称为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埃及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军队爆发战争,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有着贸易利益,而以色列则需要打开运河,让以色列船只得以通航。最终英法在国际社会谴责下被迫接受停战,以色列得到国际保证的以埃间缓冲地带。

[25] 阿卜杜尔·纳赛尔(Abdel Nasser, 1918—1970),埃及军官和政治家。1954—1956年任埃及总理,1957—1958年任总统,1958—1970年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总统。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且提出不与以色列言和,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他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核心人物,1970年因心脏病去世。

[26] 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和埃及宣布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7] 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Baathism),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立于1947年4月,是一个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党,其后分裂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分支。

[28] 纳赛尔主义(Nasserism),曾是20世纪50、60年代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其实质是阿拉伯化的民族民主主义。纳赛尔主义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1952年革命后,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六条基本原则: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消灭封建主义;剪除外国垄断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一支强大的民族军队;建立社会主义;建立民主生活。实际上这六条基本原则包含了纳赛尔主义的主要内容。

[29]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Arab National Movement),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

[30]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 Islam),西方对近代伊斯兰

教中出现的反对“异端”、提倡回到《古兰经》与圣训的原来教义中去的思潮的称谓，在伊斯兰教内被称为尊古主义。

[31] 犹太教坚贞主义 (Jewish zealotry), Zeolot, 坚贞信徒, 公元1世纪, 在巴勒斯坦反抗罗马统治运动的犹太教派成员。

[32] 黎巴嫩内战 (1975—1990), 1975年4月13日, 黎基督教长枪党马龙派武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区, 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这一流血事件导致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派矛盾激化, 内战爆发。1989年10月, 伊、基两派议员达成《塔伊夫协议》, 重新分配政治权力。1990年, 黎巴嫩内战结束。至1991年5月, 除部分真主党武装外, 黎巴嫩各主要派别武装均撤出贝鲁特, 交出武器宣布解散, 这场长达15年、造成14万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经济损失的黎巴嫩内战基本结束。

[33] 黎巴嫩战争期间, 1982年6月, 以色列军队大举入侵黎巴嫩,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受到重创。8月, 巴解组织及其武装被迫撤离贝鲁特, 将总部迁往突尼斯。

[34] 安瓦尔·萨达特 (Anwar Sadat, 1918—1981), 埃及总统 (1970—1981)。1964—1966年和1969—1970年任埃及副总统, 1970年纳赛尔过世后当选为总统。他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出人意外的步骤, 如摆脱苏联对埃及的控制, 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同以色列和谈。1977年11月, 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 打开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同年12月, 贝京到埃及, 同萨达特举行第二次会晤。1978年9月, 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 萨达特同贝京在美国签订《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 埃、以签订和约; 1980年埃及同以色列正式建交, 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 并收回西奈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1978年, 萨达特获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阅兵时遇刺身亡。

[35] 戴维营 (Camp David), 美国总统的休养地。作者在这里指的是《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1978年9月6日, 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举行三国间的最高级会议。9月17日埃以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

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这就是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协议的签订为实现中东和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使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由对抗向对话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协议未提出解决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和归还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等问题，引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和反对，使阿拉伯联盟发生严重分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安排也未如期实施。

[36] 伊朗革命，即伊朗的伊斯兰革命（1978—1979）。1977年年底，伊朗爆发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国王被迫于1979年1月流亡国外。2月流亡巴黎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接管政权，4月1日，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执政后，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推行全盘伊斯兰化。

[37] 两伊战争（1980—1988），即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自1980年9月爆发，至1988年8月20日落下帷幕，整整持续了8年之久。两伊战争是“二战”后持续时期较长、损失消耗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两伊战火的蔓延，曾导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海湾地区的严重对立，致使海湾局势一度空前紧张，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战争的起因包括长期领土争端，宗教派系对立，以及民族纠纷和领导者个人恩怨。

[38]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82年6—9月），以色列为摧毁驻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武装力量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又称黎巴嫩战争或第五次中东战争。8月，巴解组织及其武装被迫撤离贝鲁特，将总部迁往突尼斯。

[39] 1983年，巴解组织所属武装组织法塔赫内的激进派代表人物阿布·穆萨宣布成立“巴勒斯坦革命运动”，要求开会纠正错误路线，形成反对派。之后，以阿布·穆萨为首的反对派在叙利亚军方支持协助下，向阿拉法特领导的在黎巴嫩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

[40] 《约旦河西岸数据项目：一项关于以色列政策的调查》，麦隆·本文尼斯提（Meron Benvenisti）著，1984年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这是探讨巴以和平问题系列出版物中的第五部。本文尼斯提搜集了大量政府报告和统计数据，并结合自己曾担任耶路撒冷

副市长所掌握的对巴以问题的了解，介绍并分析了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管理，以及前景展望。

[41] 巴喀难民营 (Baqa'a camp)，约旦地区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之一。

[42] 纳布卢斯 (Nablus)，约旦河西岸的主要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以北63公里。纳布卢斯是一个古老的迦南镇，是《圣经》所描述的雅各布的家和撒马利亚的主要城市。目前人口超过10万，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巴勒斯坦人口集中地。

[43] 纳贾赫大学 (al-Najah university，即 An-Najah National University)，巴勒斯坦最著名的大学，位于纳布卢斯。前身是成立于1918的纳贾赫纳布卢斯学校，之后改为专科，1977年发展成综合性大学。

[44] 提尔 (Tyre)，古代腓尼基 (Phoenicia) 著名的港口城市，现属黎巴嫩，Tyre 一词来源于“石头”。

[45] 雅法 (Jaffa)，以色列中西部的古城，拥有4000多年历史，位于地中海沿岸，自1950年起，成为特拉维夫—雅法的一部分。雅法是一座腓尼基古城。根据基督教的传说，Jaffa 一词来源于诺亚 (Noah) 的儿子雅弗 (Japhet)，是他在创世之初的洪水之后建造了这座人类第一城。也有人说，Jaffa 来源于希伯来语的 Yofi，意为“美丽”。如今的雅法，古城面貌保存完好，是以色列重要的旅游地之一。

[46] 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 (Ibrahim Abu-Lughod, 1929—2001)，巴勒斯坦著名的政治学者，曾任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主任，也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是《阿拉伯研究季刊》和阿拉伯—美国大学研究生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出生在雅法，1948年离开巴勒斯坦，1991年回到巴勒斯坦定居。

[47] 这里的原文为 el pueblo palestino, il popolo palestino, le people palestinien，分别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巴勒斯坦民族”。

[48] 原文是“Bitaqit Hawia”，即阿拉伯语中的“身份证”。

[49] 埃米尔·哈比比 (Emil Shukri Habiby, 1921—1966)，作家、政治家。

1921年出生于海法，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成为巴勒斯坦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以问题的分治决议，并在巴以战争爆发后选择继续居住在海法。20世纪60年代，哈比比开始写作小说，随后发表了《萨义德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eed: the Pessoptimist*)。1990年，哈比比接受了巴解组织颁发的Al Ouds Prize；两年后他又接受了以色列文学奖，这表明他坚信巴以可以和平共存。

[50] 哈比比的小说《萨义德的秘密生活》中的人物，哈比比称他为Pessoptimist，即阿拉伯语的almutasha-il，是埃米尔·哈比比自己创造的词语。这部小说写于1974年，讲述巴勒斯坦人萨义德(Saeed)成为以色列公民后的故事，结合事实与幻想，悲剧与戏剧。萨义德是一个喜剧式的英雄、不幸的笨蛋，他所经历的侵略和抵抗、恐怖与英雄主义，代表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艰辛和斗争。

[51] 贝都因人(Bedouin)，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52] 拜提尔(Battir)，位于伯利恒镇以西，曾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过去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铁路从此经过。如今属于约旦河西岸的一个村庄，以色列的“绿线”与之十分接近。

[53] 巴勒斯坦著名的迦法柑桔(Jaffa oranges)。

[54] 卡梅尔山(Carmel)，在以色列内，地中海沿岸，曾在《圣经》中出现，海法以及其他城镇都坐落于卡梅尔山地区。

[55] 阿维格多·费尔德曼(Avigdor Feldman)，以色列人权协会诉讼中心的创始人，同时也参与创立了被占领土以色列人权信息中心。1991年获得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纪念奖。

[56] 《首要标题》(Koteret Rashit)，以色列的阿拉伯语杂志，如今已经停刊。

[57] 拿撒勒(Nazareth)，位于以色列北部，海法东南方向的一个城镇，在远古时代就有人定居，在《圣经·新约》中作为耶稣童年时代的生长地而被初次提及。现代的拿撒勒是一个贸易中心和朝圣地。

[58] 奥姆·卡尔索姆(Om Kalsoum)，埃及著名歌手，被称为“东

方之星”。

[59] 加森·卡纳法尼 (Ghassan Kanafani, 1936—1972), 巴勒斯坦作家,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政治活动家。他的作品基本上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为主题。1972年, 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死于安装在他汽车上的炸弹爆炸, 很多人认为是以色列的暗杀组织安装了该炸弹。

[60] 加利利 (Galilee), 以色列北部的大片地区。Galilee 是环行的意思。加利利地区分为三部分: 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和西加利利。

[61] 西顿 (Sidon), 黎巴嫩西南部的港口城市。曾是腓尼基古城, 建于公元前 3000 多年, 是重要的贸易中心, 因其玻璃制品和紫色染料而闻名。

[62] 先知穆罕默德 (Prophet Mohammed, 约 570—632), 阿拉伯先知, 伊斯兰教创始人。40 岁常到麦加城北希拉山洞静居隐修, 沉思冥想。据传 610 年某天夜晚, 启示突然降临, 宣布他为真主的使者。622 年以后在麦地那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国家, 并使阿拉伯半岛皈依伊斯兰教。

[63] 作者在此使用拉丁语, locus classicus, 即最高级别的地点。

[64] 穆罕默德·塔布什 (Mohammed Tarbush), 巴勒斯坦作家, 著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回忆》。

[65] 伯利恒 (Bethlehem), 耶路撒冷南方 10 公里的一个市镇, 耶稣的诞生地。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 3000 年吉卜赛人、赫梯人就在此定居。该地最初取名贝特拉马, 公元前 1350 年改用现名。此后, 往返古叙利亚和埃及的商旅多在此中转休憩, 以至于渐成通衢闹市和兵家频争之地。伯利恒具有独一无二的宗教地位, 这里是耶稣的诞生地, 拥有伯利恒之星洞等基督教圣地。同时, 这里也是犹太人始祖雅各之妻拉结的墓地, 以及古希伯来统一王国开国君主大卫王的故乡。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 以色列占领了伯利恒。1995 年圣诞节前夕, 根据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达成的过渡自治协议, 伯利恒回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怀抱。

[66] 代尔亚森 (Deir Yassin), 耶路撒冷以西 5.5 公里, 1948 年 4 月 9 日被以色列占领, 大约 200 多名村民被以色列士兵杀死, 被称为代尔亚

森屠杀。

[67] 埃纳尔希尔维 (Ein el-Hilwé), 黎巴嫩最大的难民营。

[68] 这些都是当代巴勒斯坦作家。

[69] 托菲克·扎亚德 (Tawfik Zayyad), 以色列作家和诗人, 曾经代表新以色列共产党 (New Communist List, 即 Rakach) 参加第8届和第13届以色列议会, 同时也是拿撒勒的市长。

[70] 六月战争, 即第三次中东战争, 或“六五”战争, 六日战争。1967年6月5日, 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 至10日相继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耶路撒冷东城区、约旦河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埃及、叙利亚先后被迫停火。结果1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

[71] 《公证人巴特尔比》(*Bartelby the Scrivener*), 作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美国小说家和诗人。在小说中, 巴特尔比给一个华尔街的律师工作, 人们发现他居住在这名律师的办公室里, 而且拒绝离开。

[72] 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 即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73] 萨拉·塔阿马里 (Sarah Ta'amari), 曾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属武装的战士, 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的成员。

[74] 伊斯雷尔·谢哈克 (Israel Shahak, 1933—2001),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化学教授, 经常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社会。

[75] 利娅·兹厄马尔 (Lean Tsemal), 在耶路撒冷工作的以色列律师, 著有《绝望的以色列》(*Israel: Beyond Hope*) 一书。

[76] 费利西娅·兰格 (Felicia Langer, 1930—), 以色列律师、波兰犹太人后裔, 长期在被占领土上为巴勒斯坦的政治犯辩护。

[77]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28—),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除了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外, 乔姆斯基也以激进的政治观点闻名, 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的政策, 以及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著有《宿命的三角》(*The Fateful Triangle*)一书，被认为是有关巴以冲突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78] 伊兹·斯通 (Izzy Stone, 1907—1989), 即 Isidor Feinstein “Izzy” Stone, 美国著名左翼记者。生于美国费城的俄国犹太移民家庭，曾在美国多家报纸任职，并著有《朝鲜战争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79] 埃尔默·伯杰 (Elmer Berger, 1908—1996), 美国哲学家、神学家，发表过多部学术专著，是美国犹太教理事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的创始人，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迫害，主张巴以间无论宗教，应人人平等。

[80] 马蒂·皮莱德 (Matti Peled, 1923—1995), 前以色列将军、以色列议会成员，著名的巴以和平主义分子，曾经参加过 1948 年的巴以战争和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创立了以色列巴以和平理事会 (the Israeli Council for Israeli Palestinian Peace)，号召以色列应当让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巴以间应当和平共处。

[81] 达摩克利斯之剑 (a sword of Damocles)。传说，公元前 4 世纪时，现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有一位名叫达摩克利斯的廷臣。他讨好国王狄奥尼修斯一世，说国王财势双全，洪福齐天。狄奥尼修斯想让达摩克利斯领略一下当国王的滋味，于是举行盛宴，让达摩克利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用一根马鬃拴住一把锋利的宝剑悬挂在他的头顶，并告诉他，统治者的幸福通常是伴随着随时可来的杀身之祸的。这个故事现在常被人用来比喻统治者对可能失去强大权力的不安全感，或者更广泛地，比喻任何对迫近的厄运的感觉。

[82] 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包括《追忆似水年华》等。普鲁斯特革新了小说的题材和写作技巧，运用触发性回忆，打破传统的时空概念，他的回忆是意识不断涌流的表现，把时间作为主宰作品的“精神人物”。

[83] 西奈山 (Sinai)，西奈半岛中南部的一座山峰，海拔约 2288 米，

被认为是《圣经·旧约》中摩西接受上帝十诫的地方。西奈半岛，埃及在亚洲的领土及行政区，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部，东濒亚喀巴湾，南濒红海，西临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湾，北临地中海，以苏伊士地峡与埃及本土相连，面积 6.07 万平方千米。



Chapter 2

INTERIORS

第二章

内部

> 阿卡^[1]，1979年。港口边的露天小餐馆。

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耳朵来说，词语“来自内部”（min al-dakhil）具有特殊的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以色列境内的区域，指的是那些虽然被以色列封禁但仍然属于巴勒斯坦的区域和人民。所以，在1967年以前，它指的是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1967年以后，这个词语的指代范围扩大为包含约旦河西岸、加沙以及戈兰高地的居民，而自1982年以来，它 also 指居住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黎巴嫩人）。有关“al-dakhil”的含义，最惊人的地方在于其内涵价值所发生的变化。我记得，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仍然被视为特殊的种群——如果你是居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离散或成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群中的一员，你可能轻易地就会怀疑这些人。我们总是认为以色列在这些人身上的烙印（他们的护照、他们对希伯来语的掌握、他们对于和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的相对缺乏的自我意识、他们把以色列当作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实体”）改变了他们。他们不同于我们，因为我们是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时常遭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猛烈胜利和催泪哀伤，我们的生活独立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的不同含有某种令人轻蔑的意义。

如今他们还是和我们不同，但却是享有特权的不同。境内的人们被珍视为“已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边缘上、枪管下、围栏和特殊区块（kashahs）里的巴勒斯坦人，因而获得了我们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荣耀。唉，同样的，自从1970年以来，我们的集体历史，在境外的（fil-kharji），或者在流离失所（manfa）和远离家园（ghurba）的，都一直异常失败，日益失去荣耀，不受祝福，越来越古怪、偏离中心和疏远。我们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的地位。当然，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的承认，联合国也做出了一大堆对我们有利的决议，但是没有人看到我们作为被驱逐者外加失败者的真实状况。在我们的收支清单上，一边是屠杀、驱逐和降级，而另一边，对我们有利的那一边，则几乎什么也没有。再打一个比喻，不仅墙上写的是不吉利的预兆，而且我们都无法确定它在试图告诉我们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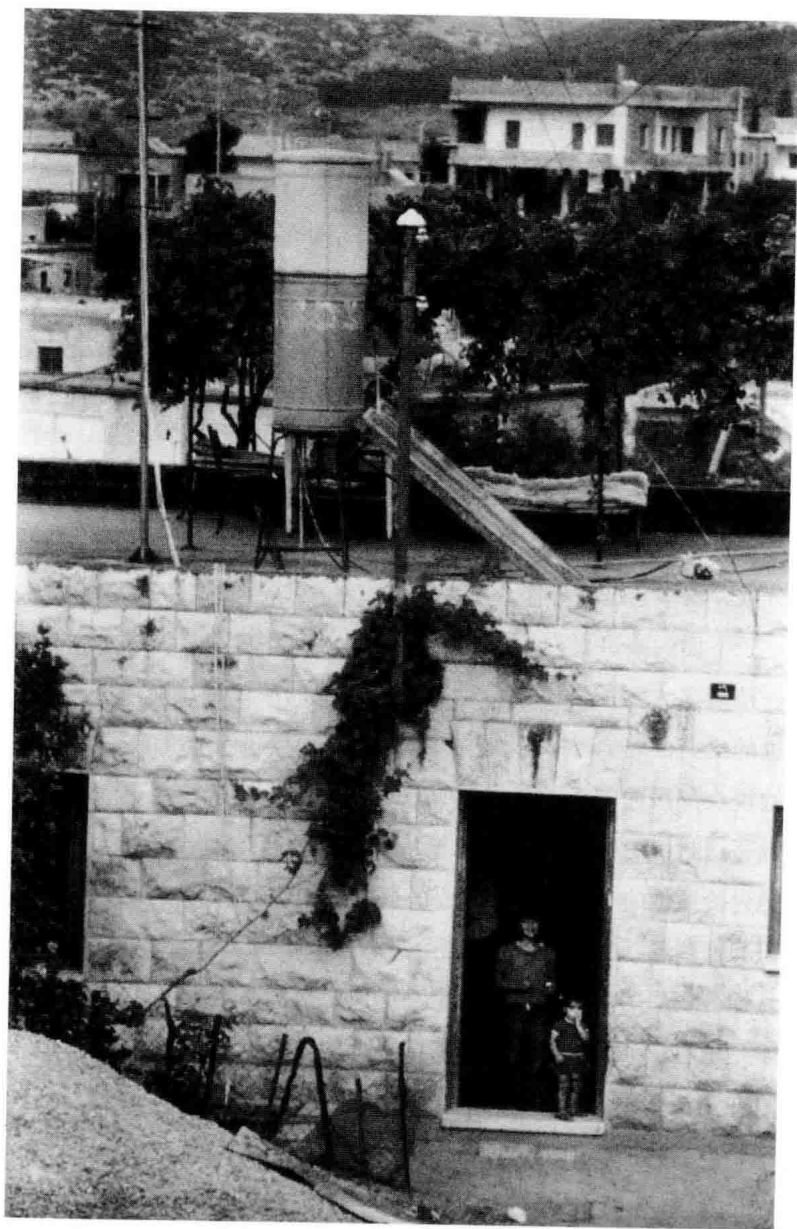
所以，那些在巴勒斯坦的，在境内的，并且直接受以色列人管辖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说，状况要好过我们这些人，我们只能“讲讲”犹太复国主义，同时体验阿拉伯同胞们讨人嫌的表面的关怀。政治上来讲，应当注意到，巴勒斯坦运动目前主要是被导向并且关注于境内，而直到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境外的问题和政治才是最重要的。

“al-dakhil”的第二个含义要复杂一些。它指的是不受干扰，指的是在内部的，被团体成员们的团结之墙保护着，以及我们四周更强大力量所制造的敌意包围着的区域。两个巴勒斯坦人首次见面开始交谈，就比如说是在德里或者伦敦吧。大约一两分钟以后，即便没有明确的问题和答案，他们也能够判断出彼此原先的居住地、工作类型、政治信仰（甚至不论目前已经背离还是仍然坚持着这样的信仰），以及彼此的价值体系——所有这一切信息都在一整套特殊的单词或词组、名字、语音变化以及重读当中传达，只有巴勒斯坦人知道。不过，作为这个团体里的人也意味着在外面不能做你自己：你必须参与外面的世界，并且使用“他们的”语言，这就意味着你必须使用“他们的”代码，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然而有关团体的问题在于它是内部的、私人的，因此永远都无法让别人弄明白，甚至无法让同伴们搞清楚。充满秘密、私人

生活和阴谋的世界，是大多数社会的一项实情。在阿拉伯传统中，它几乎总是染上宗教的色彩，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但是我认为，这种色彩要比大部分东方学者们（或者局外人）所怀疑的，更加微弱，而且有细微差别。尽管看上去，团体里的人或创造这个团体的人似乎知道这些代码，他们从来不能确定，这些代码是否能够真正传达重要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否能够确认事实的稳定性，或者是否能够得到整个团体的赞同。所以，虽然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回归”（awdah）这个词非常重要，是我们要求自决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它对于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回到和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回归到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团体内部，听起来很荒谬，就是身处于一个即便当你已经掌握只有你和你类似的人才能理解的语言时——有时是含糊不清的，但总是怪异的——你也无法控制甚至不能真正确定的世界。这种情况的结构使得身处其中成为一种痛苦的特权，如同感觉被紧关在自己拥有的房子内一样。是的，一扇打开的门对于进出团体内外十分必要，但它也会被其他人当作进入团体的通道。虽然我们身处自己的世界中，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防止别人进入，偷听我们的对话，解析我们的私人通信，侵犯我们的隐私。这就是我们对巴勒斯坦历史的解读，从十字军东征^[2]到贝尔福^[3]和魏茨曼^[4]，外来者不顾我们的意愿进入巴勒斯坦，并且从此占领巴勒斯坦。

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你尝试着习惯于和外来者共存，并且永不停止地试图在内部分清哪些是属于你的。我们是负载信息和符号，以暗示和迂回方式表达的民族。我们互相搜寻着对方。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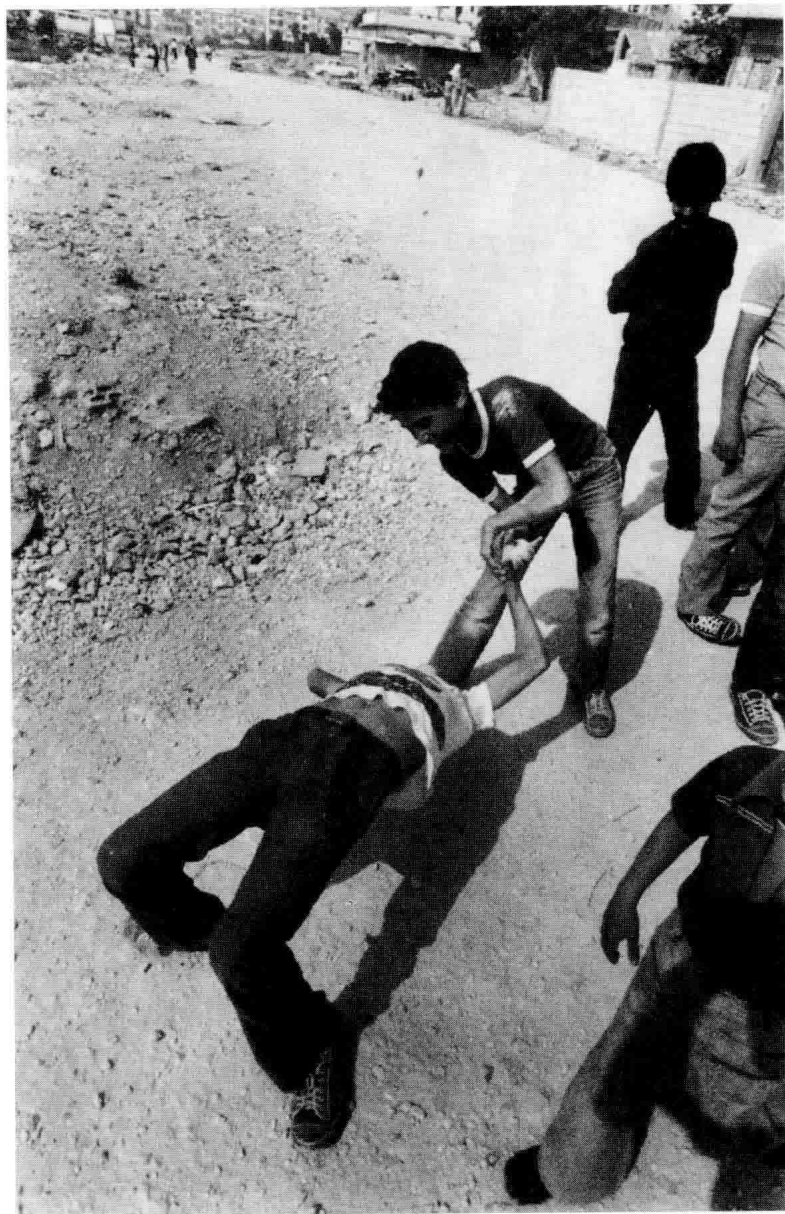


> 门口，沙法阿姆村（Shafa'amr），加利利，1979年。

我们的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被他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占领和干涉，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借助假设和间接的言说技巧，在我看来，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神秘，以至于使我们自己都困惑不已。

比如，对体力的崇拜，对健身、空手道和拳击的着迷，令人吃惊地在巴勒斯坦年轻人中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显然是弱者对于强者、对于明显占据统治地位的另一方的回应。但这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几乎装饰性的图案，交织在寻常的生活经历中，它的含义远远超过“让我们变得强壮”。这是一种坚持己见，一种超越任何理性目的，关于细节的坚持。但是，这种对外人来说可能是全然愚蠢的做法，在内部也只得到很少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分数，就像它过去那样。

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我的意思。一段时间以前，欧洲文学界一位著名人物的妻子写信给我，讲述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经历；她的丈夫在大学教书，我想她也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待了六个星期。她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只见过巴勒斯坦人两次，其中一次正是她写这封信的场合。一个“大卫路上的店主（销售刺绣品）”在和她讨价还价的时候，与她进行了一番对话。似乎这个人是我的“相识和仰慕者”：显然，当她完全自然而又相当无关地向他提起自己认识爱德华·萨义德时，他主动地向她提供了这一信息作为回应。于是她答应“会捎给我……随信附上的便条”，便条是用阿拉伯文写在从活页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张小纸片上。我的朋友还提到，此人希望表达巴勒斯坦人在各方面要优越于阿拉伯人（智慧、武术、做生意），他使用“我们是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这句话来表达这种优越性。所有的这一切，令我这位写信的朋友，精确地感到“修



> 西顿，1983年。埃纳尔希尔维难民营。男孩儿们在卖弄他们的力量、技术和斗志。



> 在马拉以南的一个难民营中，1979年。一个年轻人俱乐部，和监狱一样，在俱乐部里，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十分重要。

辞上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令我（她）无法理解”，尤其当时她身边正有一名以色列朋友陪同着，正是为了这个以色列人，我的朋友任这个男人的表演继续下去。

那么，这一切给我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我坦白，当我打开这张小纸片时，有某种兴奋之情，也有一种自我祝贺的感觉；人们尊敬我，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他们仍然重视我为我们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信的开头用罗马体写着我的名字。接着是5行阿拉伯文，讲述写信人精通空手道，以及他“以巴勒斯坦的名义”参加世界空手道大奖赛。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内容。但是，我想到，这是多么典型的巴勒斯坦团体内人们的交流——那种奇怪的虚张声势，本来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笑话。在我们的处境中，这样的信息交换几乎非常自然地发生在我们双方之间。他是个团体内的人，利用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外人的帮助联系到我，而我同为团体内的人，如今却居住在我们共同的起源地耶路撒冷之外。他用英语写我的名字，代表他也能应对我所生活的世界，同样也代表他注意过我所做的事，或许带着一些骄傲，但也带着一些小心谨慎，因为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记录并不良好的、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的一员。是时候来给出一个健康的信号，爱德华·萨义德最好记住，我们正在被（空手道专家们）注视着，有些赞许地，但也有些谨慎地。最后，他（向我）对体能的滑稽坚持，展现了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通常枯燥的、同样的自我坚持。他已经向我的朋友展现了极其巴勒斯坦式的常规，他多半知道我的这位朋友会告诉我这一切；如今他又一次展现了这一常规，而且知道我会重复这个故事。而我的确重复了。

贯穿我们被驱散的群体的这种证人、证词和权威的网络，强

化了我们的主张，坚决变得完全地令人麻木。对于外面的人来说，这种过分的自信令人灰心，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执拗，而且因为它似乎在不断更新自己，却没有创作出任何新的或者在自身之外有启发性的东西。对我以及其他像我这样生活在离散（manfa）或疏远（ghurba）中的人来说，那些团体内的人们——在巴勒斯坦或者阿拉伯世界，这些地方要比纽约或者柏林来的更接近内部（al-dakhil）——仍然有令人恢复勇气和信心的地方（或许有些空洞），他们不断重复着那些熟悉的模式，以至于重复本身变得比所重复的内容更为重要。在这种重复的严格规定里，就像我那空手道专家很了解的那样，你不能轻易地从中逃开，也不能轻易地将它转化为代表其他含义的符号。空手道并不象征着自我改善，而



> 耶路撒冷，1979年。公交车站。

仅仅代表着成为一名巴勒斯坦空手道专家这一重复的行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就好像这种不断的重复能够阻止我们以及其他的人，不彻底地遗漏或忽视我们。

这种想要重复的强制性冲动在每个阶层的巴勒斯坦人房子的内部都很明显。围绕餐桌或中心空间，同样的食物和饮食习俗，这一切以一种令人发狂的规律性重复出现。我认为，提供食物和招待客人的习俗原意就是要有过量的，放在客人面前的食物要多过实际所需要的，多过实际上能被消耗的，并且多过主人能够负担的量。只要有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同样的待客和供食迹象就会不断出现，同样可以预期的亲密，同样表现出来的友爱，同样的物品摆设——奥马尔清真寺^[5]的复制品、镶嵌着珍珠母的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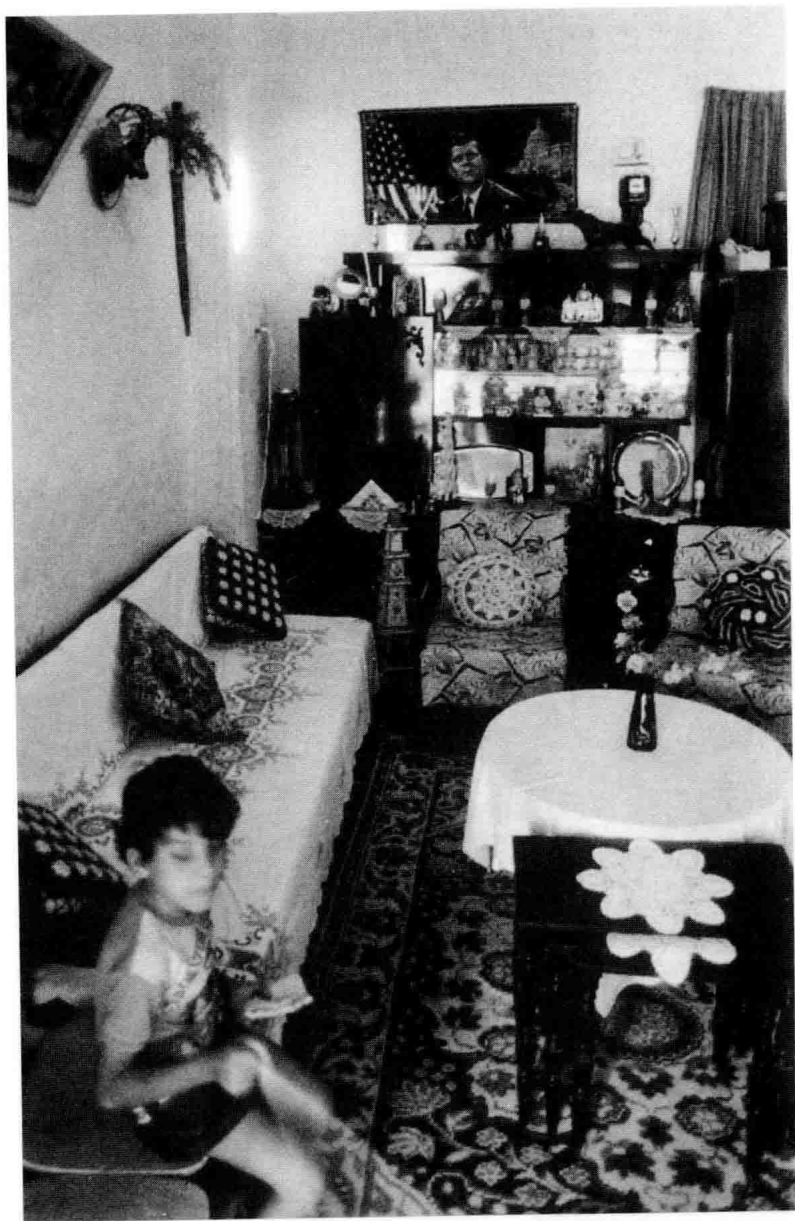
> 杰宁^[6]，1984年。

子、细小的巴勒斯坦旗帜——既作为保护，又用来社交。自然地，这些摆设向你证明，你正在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里。但它们还有其他的含义。这是一个更加广义上的重复模式的一部分，就连我，理应是解放和不受约束的，也加入了这一重复模式。我们不断重复创造着房屋的内部摆设——摆放餐桌、装修客厅、布置小玩意、陈列照片——然而，这一切却在不经意间，强调和保存了我们生活中主要的破裂和缺口。如果你仔细观察面前的物品，你就会发现这一点。总有什么有点儿不对劲，有点儿不协调。巴勒斯坦人家里的照片总是挂得太高，而且总是挂在显得很随意的位置。由于过度，总是少了些什么。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或令人哀伤的，相反，这种生活的破裂总是表现在滑稽地把东西放在不适合的位置，在太小的空间里有太多的装饰，或者是某个时刻太过无趣。太多桌面摆设；太多照片；太多物件；太多食物。这种失衡和重复的倾向，在我身上的缩小版本就是每当我旅行的时候——我经常旅行——我总是携带太多的行李，其中大部分东西我根本用不上。每当这重复发生的时候，它都会引入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变量。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察觉她或他自己，以及其他人身上的重复模式。

巴勒斯坦人团体内的，这种相似的不平衡但总是无限小的互相区别，最终将吸引外部观察者的注意，就像它已经吸引了吉恩·莫尔的视线一样，然而我不确定其中的根本理由能被轻易地解释。是的，这些古怪的过量和失衡，它们本质上反美学的效果，以及互相感染的不安全感，这一切似乎都象征了离散——自一个地方、一段过去和一个有家的现实离散。然而，这种重复的模式还表达了另一个问题。



> 的黎波里，巴达维难民营，1983年。



> 拿撒勒，1979年。在旧城中的一套公寓。



> 安曼，1984年。关于耶路撒冷的回忆：照片，相册，人们翻阅照片。

巴勒斯坦是一个小地方，到处挤满了不同民族的踪迹和主张。巴勒斯坦的遗产不仅仅是征服和迁移，也是对历史的重新挖掘和重新解释。古典历史学家格伦·鲍尔索克^[7]把这段历史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地区被精心地分裂”。鲍尔索克之所以有这一新颖的观点，是因为他的研究尤其关注犹太复国运动之前和伊斯兰教之前的早期巴勒斯坦，因此他能够超越所有的冲撞和推攘，理解从亚历山大大帝^[8]之死到伊斯兰教的到来^[9]这段时期内的“中东地区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加广阔的巴勒斯坦国家”。

唉，当19和20世纪大批外国人向巴勒斯坦提出要求时，巴勒斯坦原先广阔的土地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无论在地形上还是在文献记载中，这个地方变得不可思议地分裂、稠密和混乱。如果在一张巴勒斯坦的地图上，画上曾经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所有民族的传奇、勋章、圣像和变迁，你会发现没有剩余空间表示地形。越是接近现在的民族，他们的主张就越是排他，对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排斥和镇压就越有力。另外，每一个主张都创造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王朝起源，从而造成更多的偏差、互相冲突的导火索，以及混乱：原本就已经过度拥挤的地图，如今因为猛烈冲突的武力而沸腾，愤怒席卷表面。

我们也失去了关于空间的概念。我们不再把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广阔的巴勒斯坦国家”，而是把它当作一块狭小的、异常拥挤的土地，一个我们被不断从那里驱逐开的地方。每一项要保住我们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努力，也同样是要重新回到那张地图上，要帮助那些内部的人保留他们不稳定的立足处。这是一项非宗教的努力——我们最近政治历史中的大部分斗争也是如此——我坚持



> 拉马拉，1984年。悬挂在拥挤墙壁上的一幅人像。

认为，宗教方面的考量应该是第二位的，应该是结果而非原因。然而，这地图，如同这片土地本身或者我们房子的墙壁，已经如此饱和与混乱，以至于我们只能努力去习惯这个已然密集和过分装饰的空间。我们完全不是革新者，相反却是迟到的人，是一个在20世纪末仍然努力要获取其他每个人都已经拥有的自决权利的民族（就连福克兰群岛^[10]上的人，至少在法律上来讲，也拥有了我们还在寻求的东西）。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每个人都已经实践过的行动；我们没有任何创新。我们的努力就像是对已经完成的装饰进行再装饰。

每一条通往境内的直接路径，以及境内本身，都已经被封阻



> 希伯伦^[11], 1979年。亚伯拉罕^[12]墓现在既是清真寺也是犹太教堂, 门口则有武装的守卫。

或霸占了。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在边缘地带——一般都是被忽略的地面，以及相对闭塞、不规则布局的地点——找到可以安身之处。我们只能通过坚定不移和大量重复来实现这样的目的（虽然在我们之前，很多人都这样做过），并且希望着，在经过巨大的努力之后，我们的与众不同最终也能显现出来，表现为一个小小的裂痕、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变量，以及一次细小的晃动。讽刺、强迫、奇怪的行为。

当我们的处境逐渐恶化，我们小心控制下的坚持己见的行为也变得益发奇怪、讽刺和阴暗。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以色列征服者们会定期把一名俘虏的巴勒斯坦人——男性、强壮、潜在的捣乱者——带上广播电台，让他为了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显



> 泰勒什瓦，1979年。

示自己的本领。这是一项宣传操练,在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南部(这些地区的居民是操练的对象),巴勒斯坦人却没有类似的回应或他们自己的宣传工具。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巴勒斯坦人只能通过接受以色列人审问式的对话,来进行回应,就像以下这段对话一样。这段对话译自阿拉伯口语,请注意这名不幸但绝不愚蠢的囚犯,所采取的故意显得愚蠢和假正经的战术:

以色列广播员:你叫什么名字?

被俘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以下简称“巴勒斯坦人”):

我叫阿梅德·阿布德尔·哈密德·阿布·塞特。

以色列广播员:你的代号是什么?

巴勒斯坦人:我的代号是“夜之父”。

以色列广播员:告诉我,“夜之父”先生,你属于哪个恐怖组织?

巴勒斯坦人:我属于解放(tahrir)人民阵线——我是说,巴勒斯坦的恐怖手段(takhrib)^[13]。

以色列广播员:你什么时候加入恐怖组织的?

巴勒斯坦人:当我第一次了解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时候。

以色列广播员:你在黎巴嫩南部的任务是什么?

巴勒斯坦人:我的任务是恐怖行动……换句话说来讲,就是要进入村庄使用恐怖手段。只要有女人和孩子的地方,我们就使用恐怖手段。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恐怖行动。

以色列广播员:你们制造恐怖活动是因为对某项事业的信念,还是仅仅为了钱?

巴勒斯坦人：哦，的的确确，只是为了钱。这算是个什么事业？为的什么？真的还有事业这种东西吗？我们很久以前就背叛所谓的事业了。

以色列广播员：告诉我，恐怖组织是从哪里弄到钱的？

巴勒斯坦人：从任何有多余钱支持恐怖主义的人那里，
换句话说讲，就是从支持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世界。

以色列广播员：你对恐怖分子阿拉法特^[14]的看法是什么？

巴勒斯坦人：我发誓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恐怖分子。他就是那个背叛我们和我们事业的人。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恐怖主义。

以色列广播员：你对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 大马士革，1983年。赛伊达·采那布难民营中的两个男孩。

巴勒斯坦人：以我的荣誉担保，我们感谢以色列国防军给每个恐怖分子的良好待遇。

以色列广播员：你对于其他那些仍然在使用恐怖手段攻击以色列国防军的恐怖分子有什么建议？

巴勒斯坦人：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向以色列国防军举手投降，他们从国防军那里能得到可能是最好的待遇。

以色列广播员：最后，恐怖分子先生，你要不要对你的家庭说些什么？

巴勒斯坦人：我要向我的家庭和朋友们保证，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我也要向敌对的广播机构致谢，感谢他们允许我这样大胆地发言。

以色列广播员：你是说“以色列之声”^[15]？

巴勒斯坦人：是的，先生，谢谢，先生，当然了，先生。

假定所有在黎巴嫩反对以色列入侵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那么如果你想找一个恐怖分子，任何你能找到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想要复仇的“恐怖分子”。“以色列之声”的这个质问者，头脑中意识形态的消声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令他完全没有警惕这个巴勒斯坦人对恐怖主义的拙劣模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修辞性地重复和夸大审讯者想要他说的话。在他黑色喜剧式的表演中，隐藏的是他不能直接说出口的信息，只能等待别人自己去理解。这个故事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故事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如同英雄史诗般地流传；甚至还有这段节目的录音磁带，供巴勒斯坦人在夜晚娱乐。

我也想起了新近诗人穆因·巴西苏^[17]的自传性作品《落入水



> 加利利的德鲁兹^[16]家庭，1979年。

中》，这部作品描写了 50 年代埃及统治下的加沙地带的生活。巴西苏当时是巴勒斯坦共产党的一名年轻斗士，他在多个埃及监狱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一切艰辛都发生在阿拉伯的（而非以色列的）环境中，这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虐待显得讽刺可笑，而且越发明显，因为后者的事业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关切的核心。让巴西苏感到更加讽刺的是，他的监狱守卫是巴勒斯坦人。当他和同伴们来到开罗监狱时，“秘密警察们看到我们表示非常开心。五年中可能只有一秒的时间，这些巴勒斯坦秘密警察们停下来，想起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他马上提笔，继续写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告。”

巴勒斯坦人所扮演的角色由其他阿拉伯人安排。巴西苏的狱警们扮演的是“小丑”，只有在某个罕见的一秒钟里，他们的角色才可以有个暂停，离开那个他们已经十分适应和习惯的可怕常规。

* * *

对朝代的概念，对过去的感情，努力把自己放置在一个现实的连续体中：这样的事情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当前的封闭和混乱迫使我们去关注平常生活的细节。每次我看着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总是惊讶于一切是如此正常地在运行，就如同我一直期待“他们”，境内的人们，不同于我们，但却发现“他们”仍然做着和我们相似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在经营自己的生活时，总是积极地意识到，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反常，但我们还有家务活儿要干，有孩子要抚养，有房子要居住。

我困惑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变成今天的状况。1982



> 拉马拉，1984年。照片被自豪地悬挂在墙上，照片中的男人先被判终身监禁，后来被驱逐到阿尔及利亚，再然后到约旦。

年初，我和一支英国的拍摄队伍相处了几个星期，拍摄黎巴嫩南部一所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生活。这些片断是一部名为“西方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West）的电视纪录片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主要探讨英国、法国和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关系。这部片子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关注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副产品：巴勒斯坦问题。在黎巴嫩南部，很多与我交谈的并且被拍摄的巴勒斯坦人都比我年轻；他们实际上只了解黎巴嫩，因此遇到历史问题他们就去询问年长的人们。有两次，我为我们历史的不充分和我们使用历史的方法感到忧虑。一次，一位老人在一群他的年轻男性亲戚的提醒下，回忆起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生活。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长大的村庄、家庭聚会、宴会和值得纪念的场合，以及身处家乡的快乐。但是当我问他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他是如何沦为难民的时候，他突然停下，然后起身离开。

另一次，一名老妇和一群她的侄女、女儿们正在高兴地向我建议，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我应当如何生活。其中一人说，发动一场革命；另一个说，多生一些孩子，并且暗示我目前已有的两个孩子，最多不过证明了我被削弱的男子气概和爱国热情。然后我们聊到了我们所在的盖斯米耶难民营的生活。这些妇女没人认为她们会在那里待很久，因为毕竟她们不属于那个地方。于是，我转向那位老妇乌玛梅德，问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她停顿了片刻，就好像这样的问题非常出人意料，然后她相当随意地回答说：“我也不太知道，我只是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

然而，对于那些住在或靠近境内的人来说，在那些地方他们无法否认自己巴勒斯坦的根源，因此他们至少还有执拗的特权。

我们就在这里，不为你的势力所驱赶，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并且繁衍后代。这种现实存在的声明虽然是基本无声的，但它们却带着不可否认的力量。当你把他们和西方社会里巴勒斯坦人小心而担忧的目光相比，你就会更加珍惜他们。最近，我沿着新泽西的1号公路开车回纽约，途中停靠在一个加油站。加油站工作人员那带着口音的英语让我知道——估计那天没有其他人能够发现——他是巴勒斯坦人，中年，可怕地忙碌，以至于从来不从他的油泵或笔记本上抬起头来。“你是个阿拉伯人？”我用阿拉伯语问道。“是的，是的。”他突然抬起低着的头。“从哪里来的？哪个地方？哪个村庄？”我接着问他。“约旦。”他很快回答道。“但你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吗？”“纳布卢斯人。”他回答道，然后他就从我身边走开，继续忙碌着。他的这种明显不情愿表明自己是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刺伤了我，我想要继续和他对话，告诉他不当羞于承认我们的民族背景……但是可能他怀疑我是某种间谍，无论如何，他离我太远而且也太专注于完成手中的工作，因而没有给我更多的关注。

当我13岁大的儿子沃迪和我在安曼的时候，他会问每一个遇到的人，他或她是约旦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一个有胡子的出租车司机用浓重的巴勒斯坦口音回答说：“约旦人。”沃迪很不耐烦地回答道：“约旦的什么地方？”就像预料中的那样，答案是图勒卡姆^[18]，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镇，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如今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区别的冗长演讲，那时正值1984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在安曼举行著名会议，侯赛因国王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沃迪可能察觉到我对这名司机胡扯的愠怒和不赞成，面对我不愿意强调观点的反常态度，沃迪坚持说道：“这两者之间是有区

别的。”只是由于他年龄太小，沃迪不能清楚地解释其中的不同。让我们苦恼的是，这个司机把我们载到距离目的地至少还有5英里远，然后把我们扔在城市的边缘。“找别人把你们送回去。”

我认为，考虑到两种力量的缘故，这些关于过去的失误并没有错。首先是使人困惑和迷乱的现实。看看巴勒斯坦境内，巴勒斯坦人生活不确定的迷乱、互相冲突的困境，以及凌乱的重叠。一边看着一边想想处理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你会立即在加沙甚至安曼这些充满争议的地方的任何全景中，看到它所象征的事物；在这些地方，过度修建和毫无结构的住所拼凑在一起，没有立体感和方向感。所有一切似乎都堆积在一起，全然不讲对称、形状或式样。其次是，我们所有阿拉伯人的过去是如此耻辱，以至于被人遗忘、被人诅咒，并且只有在与现在以及一个并不十分可靠的未来做对比时，才会被人回想起来。或许一切还是一样，除了我们总是过于乐意地给未来（最多是暧昧不明的）一个合理的光环。毕竟，如同黎巴嫩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伊莱亚斯·库利^[20]说的那样，未来的合理性总是几乎完全建立在过去的不合理之上——似乎永无止境的失败、侵略、阴谋、破坏和背叛。当你列举完这一切，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可说的了，所以你从此保持沉默。这样，就反过来让整个现代阿拉伯国家机构，同样的专政和乏味，推荐自己来充当巴勒斯坦未来的法定保卫者，以及更加重要的，巴勒斯坦现在的法定统治者。以色列也试图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犹太国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理性。阿拉伯国家不断保证，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确会有一些，但这样的未来正在飞快地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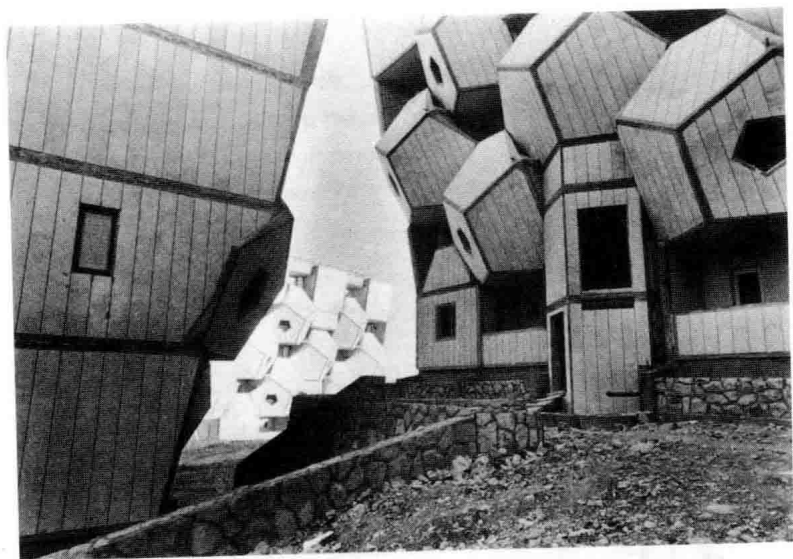


> 加沙，1979年，难民营：帐篷逐渐被波纹铁皮屋顶的砖瓦房屋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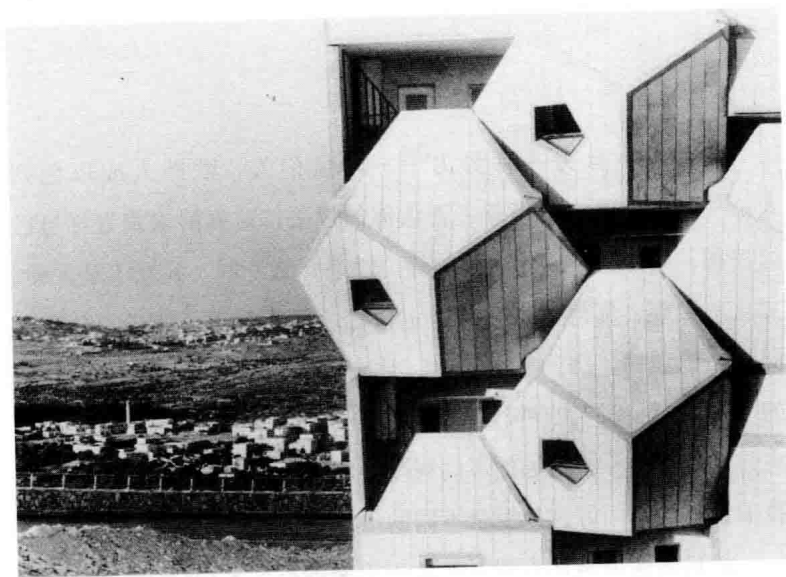
* * *

然而，一旦另一种势力——阿拉伯人、欧洲人或以色列人——侵犯你的内部事务、否认你的过去、对你的未来宣称自己的权利，或许是谁或什么样的势力没有什么不同。我并不是人种、文化、民族、部落、家族的坚定信徒，但我觉得，我必须分辨不同种类的侵略。因为它关系到，比方说，以色列人不允许我们做的事情，而对我们拥有极度复杂看法的阿拉伯人，却允许我们去做。也许这仅仅是一个疏远的不同程度的问题，或者是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不同方言与完全不同的语言相比较的问题。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无法错认。我听说，



> 拉莫特^[21]定居点，靠近耶路撒冷，1979年。当房屋将要竣工时，却没有足够的租户。



> 同一栋建筑的细节，背景是几公里外的一个阿拉伯村庄。

这些建筑在视觉上的野蛮干涉力量，甚至让以色列人都感到吃惊。人们不仅会想到一群漫不经心和粗野的十字军战士，而且也会想到——考虑到这些房屋的部分结构本身—— 一列行军前进的毒瘤。至于说到它们对巴勒斯坦风景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其冒犯性是深远和持久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身份——我非常愿意承认它也拥有其他的身份——已经而且正在被改写和丑化，就像是你在一张清晰可见的纸上胡乱涂写，把它变得难看和令人讨厌。这个过程不断继续，且带来后果，影响甚至达到距离巴勒斯坦很远的地方，令人深深刺痛。举一个例子：《纽约》（*New York*）杂志在它的“情报员”专栏（由一个叫莎伦·丘砌的人撰写）里，聪明地报道了一场民



> 除去了前景，只留下阿拉伯村庄，以及村庄中的清真寺和房屋，被水果树、橄榄树和石墙包围着。

族服装表演，这场表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巴黎总部举行，共有 40 个民族参加。其中也展示了巴勒斯坦的刺绣女裙，这是一种总是由巴勒斯坦妇女制作和穿着的服饰。然而，丘砌这篇文章的标题却是“恐怖分子的服装”，估计是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负责提供所展示的巴勒斯坦裙子。丘砌暗示巴解组织在劫持巴勒斯坦的文化，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上了巴解组织的当。她引用欧文·哈里斯（这个澳大利亚人成功地组织了遗产基金会^[22]运动，使得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控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民族服装这一策略，“试图说服美国，他们（巴解组织）正在变化”——估计是从一个共产主义阵线，变成一个合法的文化机构。然后，丘砌又利用了她对“致命一击”^[23]的丰富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许不太在行给恐怖分子服装做一个好的定位，据一位中东专家观察，它展示的是一位中上阶层伯利恒女士的‘节日盛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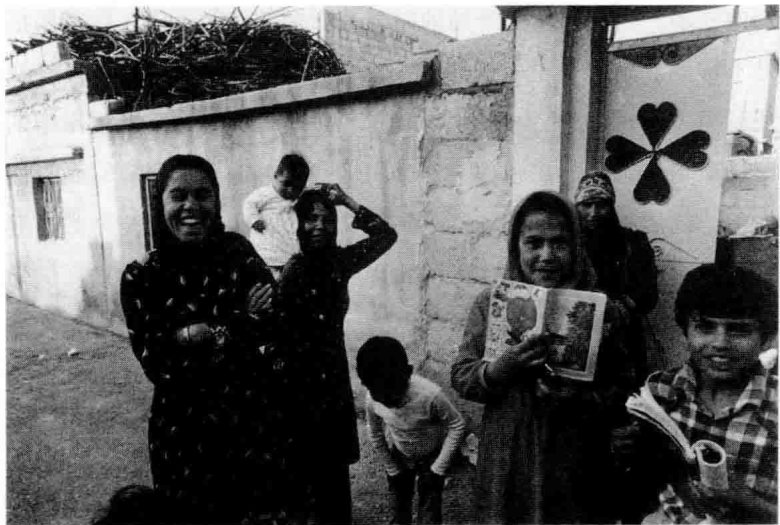
如果你能够从中找出“让你不得好报”的方面，你就会发现其中暗示了好几样事情。首先，我们被引导去相信，巴勒斯坦人从来没有民间的、大众的或者真正本土的服装；这里被展示的只是中上阶层的节日盛装。其次，巴解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是无赖，而且两者结盟，前者就自己的民族撒谎，后者或者是同谋或者是无知，要么就两者都是。最后，展示服装的细微画面被禁止为自己辩解，而是被一名不具名的“专家”描述成“中上阶层”的服装，免得人们忽略了巴解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撒谎这一点，整个讨论则被冠以红字印刷的标题——“恐怖分子的服装”。

事实是，画面里确实是一件巴勒斯坦妇女的裙子，是那种各阶层都制作和穿着的裙子。而且，这样的裙子上有大量人类学和

民俗学的学问，其中的每一项都能证实巴解组织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服装必须是民族的、大众的和纯正的。小规模地来讲，人们也可以发现一种不怀好意地进行诽谤的做法（属于一个更加复杂和广泛的模式）。关于阿拉伯巴勒斯坦的一切都被改写。把它写成是极度需要怀疑的东西，显示它和恐怖主义有关，或者嬉笑嘲弄它。再也没有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这片土地也不再作为巴勒斯坦存在，甚至或许这个民族也不再存在。“我们巴勒斯坦人”已经几乎不被察觉地变成了“他们”，一个非常可疑的种类。

这样的故事总是唤起我心中一种疲惫的痛苦。在这伟大的阴谋中，谁是莎伦·丘砌？她在一本轻佻的杂志中写几行字的专栏，而我却被迫找出逻辑、历史和修辞来帮忙，并且不惜篇幅地进行反驳。我们必须，或许觉得有必要，每次都从零开始重新讲述我们的故事。当我们从头开始的时候，所剩的已经不多，仅靠回忆是不够的。这似乎正是杰布拉·杰布拉^[24]强有力的小说《寻找瓦利德·马苏德》^[25]一开始的观点——这是一部表现新近激增的巴勒斯坦人感性的出色作品——回忆是不够的。杰布拉写到，回忆的“纯洁和含糊不清”要求句子文句必须和回忆完全一致。但是，没有这样的文句存在，因此需要很多年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句子，并且带来可疑的结果。阿多诺^[26]说：“中肯的想法一定在其他地方被其他人思索着。即使是最孤独和最无力的想法也有这种信心。”这是描述巴勒斯坦人梦想的另一种方法：渴望在回忆、现实和语言中找到完美的一致。一切都优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但是，前方的道路依然封锁，当前的手段依然不足，我们依然不能回到过去。

与此同时，我仍然对一些被用来复兴巴勒斯坦的方法印象深刻。有稳定不断的备忘录：日记本、杂志、照相簿，以及不同巴勒斯坦人的回忆。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对叙说的理解——基于个人威望的阐述——并为了弄清公认的证据而努力着。关于阿克兰姆·祖艾特^[27]的杂志；赫沙姆·沙拉比^[28]忧郁的自传《灰烬》（*Al Jamr wa'l Rumad*）；扎卡利亚·阿尔-谢克关于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的证词，作为居住帐篷的难民，他目睹了1982年的那场人间地狱，之后发表了关于抵抗萨布拉—夏蒂拉屠杀的报告^[29]。其他我读过的并且留下深刻印象的都起源于巴勒斯坦普通生活的场景——巴勒斯坦盲人诗人和学者拉贾伊·布西拉用悲痛和片断式的叙述，记录了1948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被迫离开利达^[30]



> 大马士革，1983年。赛伊达·采那布难民营：由于1948年、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而造成的难民。

的经历^[31]（这要归功于时任哈格纳^[32]指挥官的伊扎克·拉宾^[33]的驱赶）；瓦利德·卡利迪^[34]在1876年到1948年间拍摄的大量私人照片，构成了极受好评的摄影集《在他们的离散之前》（*Before Their Diaspora*）；沙菲克·阿尔-霍特^[35]写下了关于雅法的回忆录《巴勒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Palestine*）；沙菲克的岳父埃贾加·诺韦希德在去世几年前编纂了小型百科全书《巴勒斯坦的男人们》（*Rijal min Filastin*），这部深情的作品令人想起阿巴斯时代^[36]的传记字典，我在其中找到了关于我父亲家族的条目。

* * *

然而，在这一切之中，我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女人们至关重要的缺席。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女人似乎只在扮演连字符的角色，连接、过渡，纯粹的附带。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在我们生活的内部，女人们所做出的声明——具体、警觉、充满同情心、无比激烈、奇异地无懈可击——我们将永远不能彻底理解我们被剥夺的经历。

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个地方看到女人，她们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之间，一边是我们指定给她们的蜜糖般的感性主义（母亲、处女、殉教者），另一边则是在我们谨慎地政治化的、无意识的男性世界中，她们未被同化的力量挑起的烦恼，甚至嫌恶。

当我母亲说起她早年在拿撒勒的生活——她那极度严厉的父亲对待她的特殊亲切，她和她母亲的亲密无间以及之后的疏远，以及拿撒勒的农村生活，这种农村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真实——我总是能够察觉到，她为自己和那种生活间遗

憾的和不可逾越的距离感到忧虑。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在 1948 年被人从拿撒勒赶出来的——她不是。她是在 1932 年随我父亲离开了那里。但她总是讲述这个故事。当她和父亲在委任政府的登记处结婚后，一名英国官员立即撕毁了她的护照。他说：“今后你旅行时就用你丈夫的护照。”实际上，当她提出抗议和质问时，这名官员回答道：“取消你的单独身份是为了能够多提供一个空缺给欧洲来的犹太移民。”

这恐怕是殖民地妇女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一个太具象征性、太准确无疑的故事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频繁，我也不知道在我母亲个人法律身份的消失，和又一个犹太人定居者的出现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护照被人撕毁这样的经历本身太过痛苦和强烈，因此始终生动鲜明地留在我母亲之后 55 年的生活中，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很不情愿，甚至带着羞耻。作为她的儿子，我满怀同情地保留了这段情节；由于她的新身份，父亲的妻子、我的母亲以及我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她承受着一种温柔的伤痛。所以，我把她的伤痛解释为象征着她从一个完整的人——完整地作为她本身、作为一个巴勒斯坦年轻女人——转变成一个中介的甚至附属的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

后来，我认识到，成为一个中介的人，并被分配饰演一系列重要但次等的角色，这是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妇女的命运；这是我如何与她们遭遇，以及她们如何生存在我们各种社会中的形式。当然这些都是一般的社会和历史事实，但是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特殊处境中，这些事实的含义就异常深刻。问题就成为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妇女的困境：她低人一等并被称为牺牲品，究竟主要是因为她是一个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中的女性，还是



> 希布伦，1979年。旧城市市场里的一个杂货店。



> 安家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难民营，拉马村外，加利利，1979年。

因为她是巴勒斯坦人？然而，这个问题已有答案，我们迫切需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观察妇女们被否定身份，以及巴勒斯坦人遭受剥夺，因为这两者构成了我们当前的处境。

我母亲的故事只是众多巴勒斯坦妇女遭受困苦的一个代表，当我正在观看一部由巴勒斯坦年轻导演迈克尔·克莱菲^[37]执导的纪录片时，这一认识极度地震动了我。和我母亲一样，克莱菲也出生并成长于拿撒勒。现在，他定居布鲁塞尔，持有以色列护照，也是背井离乡，也是个流亡者；他的影片《丰富的回忆》^[38]通过好几种途径，呼应了我想到母亲的经历和它所意味着的一切时，

感觉到的复原和认可这一切的必要。

克莱菲为我们讲述了两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妇女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他的姨妈，法拉·哈图姆，一位年长的寡妇，1948年以后仍然住在拿撒勒。我们看到她在一家以色列浴袍厂工作，搭乘公交车，给她的孙子唱催眠曲，做饭并且洗衣服。有关她劳动的画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并且高度集中地重复，尤其是那些其他家庭成员们通常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务劳动。从这种具体到几乎可怕的精力耗费中，观众得到的印象是，生活仍然在意识的极限内继续维持着。人们对这种延伸的秩序感到特别的尊重，这是一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热情洋溢的男性角色们通常不允许的尊重。女人的孤独、她被指派的仆人身份、她的劳动的照看本质、她完成任务（其中包括缝纫）的精细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更加真实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状况，比我们高谈阔论中通常揭露的更加真实。

影片的核心剧情是这位老妇与土地的关系。通过两个连接的场景，她被塑造成所谓的“境内离散”的一个有力象征，这种情况早在英国人委任统治、我母亲护照被撕时，就已经存在。先是法拉和她成年的孩子对话的场景，两个孩子都试图说服她出售她所拥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已经被以色列人“收复”。虽然她仍然拥有地契，她非常明白这只是一张纸。如今她的孩子们告诉她说，法律专家的意见让他们相信，虽然以色列人征用了土地，她仍然有机会把土地出售给目前的租户：很明显，有人想要通过付钱给她来换取最终的权利，把对她的剥夺变得合法化。

她将会一无所有。这个身材高大、下颚宽厚的女人如岩石一般坐在餐桌边，不为这些经济利益和内心平静的逻辑所动。不，

不，不，她说道。我想要保留我的土地。但你并不真地拥有这土地，这反驳让我们这些在离散中默默地生存的人们感到更加同情她，因为她至少继续维护着一些，或者任何与土地之间关联的价值。很快地，这女人的固执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纪念品、回忆、地契、法律声明也都强调了我们离散的处境。在由离散所形成的各种茧中，也许还有空间能够象征性地复原一些我们离散的遗产；然而，象征和实际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当最好的巴勒斯坦裙子被安曼的瓦达德·卡瓦尔^[39]保存、分类整理和复制，在日本出版，却被美国的专栏作家忽略和轻视，并被廉价地写成是“恐怖分子的服装”。当然，这土地真的已经不属于我们。

法拉思虑并充满感情地继续着她的声明：“我现在不拥有土地，但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先来到这里，然后犹太人才来的，在他们之后也会有别人到来。我拥有这土地。我会死去。尽管人们来来去去，但土地仍然在那里。”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不服从理解力的一种逻辑；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这的确令她深深相信。于是，我们也想起了这种不断重复着的固执的很多例子，这些固执无法理喻，比如说宣称“我在这里站立”，周围却都是代表我们伟大失败的记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阿卜杜尔·纳赛尔）——或者这些固执的含义仅够分辨出界线这边的我们和那边的他们之间的区别。

随后在《丰富的回忆》中，法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带去看到了自己的土地。这或许是件古怪的事情，但是就像克莱菲曾经向我解释过的那样，这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并不那么罕见，她的丈夫生前拥有和照管着这块土地，并在死后将土地遗传给她。当她继承这块土地的时候，她的土地已经被剥夺，她的地契已经



> 难民营，西顿，1983年。



> 希布伦外的难民营，1979年。一家子，母亲身着传统服装。

失效，要不然她或许已经在叙利亚展示巴比伦空中花园的照片了。

不知怎么样地，克莱菲能够在他的影片中记录法拉第一次前往探视自己的土地。我们看到她试探地踏上一块地，然后她转过身，缓缓地伸开她的双臂。一种令人疑惑的平静表情展现在她脸上，其中几乎没有一丝对拥有土地感到自豪的迹象。影片毫不唐突地向观众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她正站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而她的土地依然在那里存在；至于间隔于这两个事实之间的情况，却让我们想起那没用的地契和以色列的侵占，虽然这两者在影片中都不是确实可见的。然后，我们立即意识到，任何我们在屏幕或者表现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照片上所看到的，都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画面，试图在巴勒斯坦的个人和巴勒斯坦的土地之间建立任何可能的关系。虽然法拉和她的土地重新建立起的关系仅仅是仪式上的，但这还是唤起甚至平息了有关我母亲和她 1932 年被夺去身份痛苦的回忆。下一代人的富有艺术感的经历，部分地治愈了伤口。

《丰富的回忆》中另一个主人公是萨哈尔·卡利菲^[40]，纳布卢斯的一名成功的年轻小说家和教师。她在这部影片中的存在绝不是怀旧或无关紧要的。作为比法拉年轻的一代，她拥有更强的作为女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自我意识。她带点儿嘲讽地形容自己是名斗士。虽然萨哈尔的生活要比法拉不凡得多，她也是被剥夺的，她的身份是被削弱的：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被以色列势力统治约旦河西岸的政治结构所剥夺；作为一名离了婚的职业妇女，被占有统治地位的穆斯林习俗和纳布卢斯社会的传统所剥夺。她表示，感到自己远离政治上的满足感，以及从某种程度来说性别上的满足感；两者都否定了她的权利，前者是因为她是巴勒斯坦人，后者则是因为她是一名阿拉伯妇女。然而，萨哈尔无法摆脱她的

处境。有人同情她，但其他纳布卢斯人——以色列的占领，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也都无法摆脱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生活被引向应该属于的地方。

克莱菲成功地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勒斯坦妇女生活的这些方面。他小心地让法拉和萨拉尔的特质缓慢地显现，尽管这种速度会让影片承担失去它应该得到的更多观众的风险。他故意令我们被商业电影形成的期待（情节、悬疑、冲突）落空，而让影片的风格呈现得更加新奇，也——因为这与影片所表现的反常古怪的素材一致——更加可信。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担负着破碎的记忆，一代人在1948年惨遭剥夺的极度的悲剧。法拉·哈图姆的故事能够说明这些经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到，在分割这两个世界的阴暗界线上，还有着微妙的剥夺。对于这些，萨哈尔·卡利菲能够讲述她的感受。

但是克莱菲没有用他自己的编辑意见来操纵影片，比如说，法拉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作为她的同胞的处境——可能会激起的那些意见。在表现她的日常生活时，他并没有拍摄那些表现以色列占领的标准场景。影片中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以色列士兵，或者巴勒斯坦人被警察围捕。他甚至抵抗住诱惑，不去表现萨哈尔更加好斗的即便是被抑制着的立场。他也没有添加任何巴勒斯坦运动、燃烧轮胎，或者扔掷石头的镜头。

相反，克莱菲让这两个女人的生活具有一种美感的澄清，这让我，一个巴勒斯坦男性，对我们被剥夺的经历有了新的认识。然而，由于我在时间、性别和空间上远离这些经历——它们毕竟是一个我无法居住的境内的经历——我作为外部人的角色又被再次确认。这反过来引导我，或许防卫性地，来保护离散的完整



> 安曼，1984年。法拉吉太太。

性——通过留意巴勒斯坦境内生活的妥协，这种健忘和粗心已经历史性地成为我们战败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特征，还有那封闭的前景，让思想无人思考，叹息没人记录，人们被遗忘，时光被丢弃。

这是另一张女人的脸部肖像，她的脸庞带着对岁月的熟悉，藏着一生的传奇故事，精彩地被一个细心的摄影师捕捉到。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觉得这是一张熟悉的代表我们生活的脸。6个月后，我很随意地把照片拿给我妹妹看，她说：“那是法拉吉太太。”真的，那的确是法拉吉太太。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1946年，当时我的表兄娶了她女儿，那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第一个美丽女人。接着我在 50 年代又看到了她，然后就是现在，在吉恩·莫尔拍摄的照片里。法拉吉太太和我、我妹妹、我朋友、她的亲戚、她的相识，以及她到过的地方都有关联，所以她的照片就像是一张地图，把我们都拉到一起，甚至她的发网、棱纹毛衣、不好看的眼镜、安定的微笑和强壮的手。但是，可以说，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在我已经看过照片，我们决定使用这些照片，并且把它们按照顺序排列之后，才被发现。当我认出法拉吉太太后，照片表面所暗含的私密，立即变成了少数秘密的澄明。她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巴勒斯坦人——拥有生活在我们的境内的真实历史。但是我不知道这照片是否能够，或者有没有，表述一切事实。一部分事实已经遗失，而陈述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译注

[1] 阿卡 (Acre)，即 Akka, Akko，以色列北区的一个城市，位于西加利利，是位于阿卡海湾的港口城市。

[2] 十字军东征 (Crusades)，公元 1096—1291 年，西欧天主教会、世俗封建主和意大利富商对地中海东岸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由于侵略军身缀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3] 贝尔福 (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第 33 任英国首相。这里作者指的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即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1897 年 8 月，以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复国纲领。英国对巴勒斯坦垂涎已久，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攫取巴勒斯坦，进而控制中东地区。1917 年 11 月 2 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哈伊姆·魏茨曼 (Chaim Weizmann, 1874—1952)，世界犹太复国运动组织主席，于1948年5月当选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化学家，被称作“工业发酵之父”，并创立了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

[5] 奥马尔清真寺 (Mosque of Omar)，即 Dome of the Rock，圣石圆顶。位于耶路撒冷，是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圣迹。其所在的岩石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奉为神圣，相传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由此处登霄。按照犹太教的传说，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在这里准备将其子当作牺牲献给神。奥马尔清真寺建于公元685—691年，供朝圣之用，八角形的建筑内有许多马赛克镶嵌、彩陶和大理石装饰，其中很多是后来若干世纪中增建的。

[6] 杰宁 (Jenin)，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根据奥斯陆协定，一分为二分别归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虽然杰宁人口不多，但却是约旦河西岸最主要的难民集中地之一，拥有一座由联合国官方设立的难民营，难民主要是巴以战争中被迫远离家园的阿拉伯人。

[7] 格伦·鲍尔索克 (Glenn Bowersock)，古典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殉道和罗马》(Martyrdom and Rome) 和《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 等。

[8]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6—前323)，马其顿国王和军事统帅。公元前334年率3万步兵、5000水兵，发动侵略亚洲和非洲的远征，历时10年。公元前323年6月染疾死于巴比伦。

[9] 约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宣布奉到真主的启示，号召族人皈依正道，以免末日的惩罚。经过10年斗争，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在穆罕默德去世后开始向外扩张和征服。100年后，阿拉伯人建立的世界帝国横跨亚、非、欧三洲，伊斯兰教成为统治者的宗教。

至10世纪,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大体确立。

[10] 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又叫作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大西洋南部,在麦哲伦海峡以东。自1830年起由英国控制,阿根廷也宣称其对福克兰群岛的所有权,并于1982年短暂占领;该岛目前仍然由英国控制。虽然英国和阿根廷至今仍然就福克兰群岛争论不休,但英国强调,福克兰群岛上的居民自认是英国人,并且拥有自决权利。

[11] 希伯伦(Hebron),约旦河西岸的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以南30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曾是大卫王的都城。据《旧约》记载,这里也是埋葬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地方。希伯伦于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12] 亚伯拉罕(Abraham),根据《旧约》,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第一个族长和先祖,以撒的父亲。

[13] “tahrir”(解放)和“takhrīb”(恐怖手段)发音很接近。

[14]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 1929—2004),逊尼派穆斯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起人,巴勒斯坦民族领袖。1959年,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及其武装“法塔赫”。1969年,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1980年当选为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3年9月,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相互致函,宣布相互承认。双方签署了巴以协议,即巴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1994年,阿拉法特和拉宾同获诺贝尔和平奖。1996年1月,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首次选举中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法国巴黎郊区的贝尔西军医院病逝。

[15] 以色列之声(Kol Israel)。以色列广播局播出的节目,成立于1948年,总部设在耶路撒冷,每天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等17种语言对国内外广播“以色列之声”。

[16] 穆因·巴西苏(Mu in Basisu),即Mu in Tawfiq Bisisu,巴勒斯坦诗人。

[17] 德鲁兹(Druze),阿拉伯人的一支,信伊斯兰教,属于什叶派

中伊斯玛仪派的德鲁兹支派。德鲁兹人原为宗教共同体，他们团结紧密，纪律严格，遂发展为独特的民族共同体。

[18] 图勒卡姆 (Tul Karm)，又写作 Tulkarm 或 Tulkarem，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巴勒斯坦城市，坐落于巴勒斯坦滨海平原之上。

[19]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巴勒斯坦的流亡国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第一届于 1964 年 5 月在耶路撒冷举行，之后先后在开罗 (1965)、加沙 (1966)、开罗 (1968—1977)、大马士革 (1979—1981)、阿尔及尔 (1983)、安曼 (1984)、阿尔及尔 (1988—1991) 和加沙 (1996、1998)。

[20] 伊莱亚斯·库利 (Elias Khoury, 1948—)，黎巴嫩作家和评论家，1948 年出生于贝鲁特，曾经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贝鲁特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曾和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合作，编辑《巴勒斯坦时事》，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黎巴嫩大学、纽约大学等地任教。

[21] 拉莫特 (Ramot)，耶路撒冷地区最大的人口集中地，大约有 5 万多居民，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向，共分为 6 个区，Ramot01 最早建造，Ramot06 最新建造。Ramot 的建造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前仍然在继续。

[22] 遗产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73 年。欧文·哈里斯 (Owen Harries)，曾是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1983 年他成为遗产基金会的特别学术会员。据说，他写的一份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直接导致了美国以及之后的英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3] 原文是 “coup de grâce”，法语，字面意思是“慈悲的一击”，比喻为使重伤者免受痛苦而给予的一击，即致命的一击。

[24] 杰布拉·杰布拉 (Jabra Jabra, 1911—1994)，即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 (Jabra Ibrahim Jabra)。著名的巴勒斯坦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和画家，作品包括《伯利恒的少年时代》(The First Well: A Bethlehem Boyhood)，《寻找瓦利德·马苏德》(In Search of Walid

MaSoud)等。

[25]《寻找瓦利德·马苏德》，小说围绕寻找失踪的基督徒巴勒斯坦作家和活动家瓦利德展开，探索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后殖民时代的中东骚乱的反应。

[26]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精通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著有《启蒙的辩证法》《权威主义人格》《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等。

[27]阿克兰姆·祖艾特(Akram Zuayter)，约旦的议员和律师。

[28]赫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abi, 1927—2005)，巴勒斯坦著名作家、阿拉伯文化学者，发表过多部著作，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阿拉伯文化，并创立了阿拉伯—美国文化基金会。

[29]扎卡利亚的目击报告《1982年的萨布拉—夏蒂拉：抵抗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1982: Resisting the Massacre)发表在1984年的《巴勒斯坦研究》上。

[30]利达(Lyddā)，即Lod，以色列中部城市。

[31]这篇《1948年秋天的利达：印象与回忆》(The Fall of Lydda 1948: Impressions and Reminiscences)发表在1981年春天的《阿拉伯研究季刊》上。

[32]哈格纳(Hagannah)，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境内的一个犹太准军事机构，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

[33]拉宾在1941年加入哈格纳，并于1947年升为哈格纳的指挥官。

[34]瓦利德·卡利迪(Walid Khalidi)，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著有《黎巴嫩的冲突与暴力：中东的对抗》(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Lebanon: Confron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等书。

[35]沙菲克·阿尔-霍特(Shafik al Hout, 1932—)，曾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1932年出生于雅法。

[36]阿巴斯时代，即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750—1258)。

[37]米歇尔·克莱菲(Michel Khleifi, 1950—)，巴勒斯坦导演，

出生于拿撒勒，后前往比利时学习电视和戏剧导演，他的作品《加利利的婚礼》(*Wedding in Galilee*) 荣获 1987 年度戛纳影展的国际评论家奖。

[38] 《丰富的回忆》(*The Fertile Memory*), 1980 年出品。

[39] 瓦达德·卡瓦尔 (Wadad Kavar), 即 Widad Kavar, 阿拉伯手工艺的保护者和收藏家。

[40] 萨哈尔·卡利菲 (Sahar Khalife), 小说家，其作品大多关于提高阿拉伯世界的妇女地位。



Chapter 3

EMERGENCE

第三章

涌现

> 埃尔比雷^[1]，1984年。手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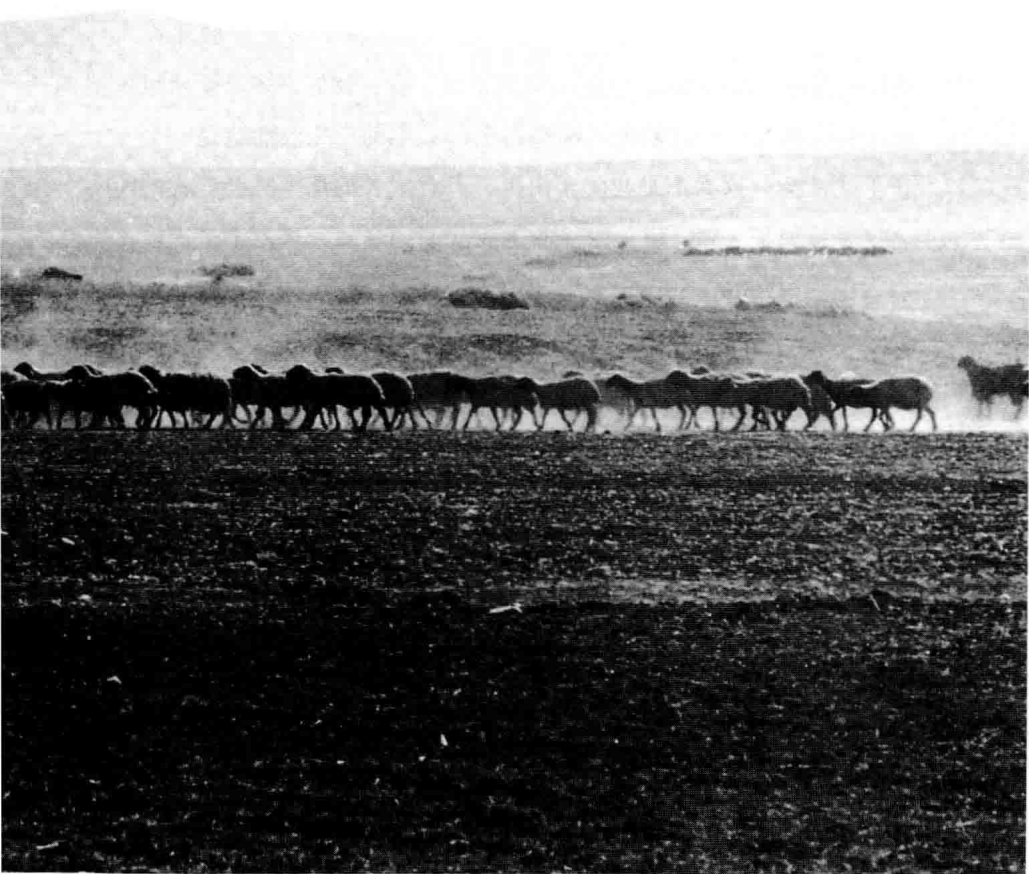
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由农夫耕作和农业生活组成。19 世纪，农业区域至少占到巴勒斯坦土地面积的 65%。村庄当然是生活的中心，尽管对于巴勒斯坦为数不多的阿拉伯游牧民来说，部落是最重要的。游牧和农村形式主宰了我们的社会。今天你所见到的每两个巴勒斯坦人中，就有一个的祖先是农夫或牧羊人，他们深深扎根在由小型农业社会耕作的土地中。

所以，把这种生活当成本质上永恒的、共同一体的想法是很

> 最后的游牧民，在沙漠的边缘，靠近贝尔谢巴，1979 年。



诱人的。我恐怕是城市巴勒斯坦人的极端例子，我和土地的关系基本上比喻式的；我从很远的距离之外来观察巴勒斯坦的农业社会。我知道我父亲的家族是耶路撒冷人，起源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个拿撒勒基督教部族，祖先也许曾和土地十分亲近。我母亲最早来自一个萨法德^[2]家族——比舒提斯家——虽然无法肯定这个家族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职业背景，但我认为更可能是工匠和专业人员，而非土地耕作者。无论如何，我对我直系亲戚、朋



友和相识的了解总是充满着医生、生意人和专业人员（老师、教授、律师、作家和传教士），以至于使得任何我与巴勒斯坦主要的农村人口的关系显得黯然失色。如果再加上，我常年居住在美国，以前是学生现在则是名学者，我越来越不经常前往中东地区，任何童年时我曾经有过的和巴勒斯坦村庄或者农村生活的纤细关系都已经基本消散了。所以，虽然我仍然知道我们社会大体上的农业根基，但我与其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个人关系。我仍然认为，这个贫穷、受苦、偶尔充满色彩的农民群体，是从未改变，且共同一体的。

但是我的这种感知是虚构的，并且因为我们历史的显著扭曲和特殊境况——我的民族身份就是从这些特殊情况中脱胎而来——而进一步形成（变形）。举例来说，我，就像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一个以欧洲标准来命名的社会的产物。而这是一个新生的社会：这并不是我父亲出生，并且成长的那个社会。我的名字是爱德华·W·萨义德，W是我父亲的名字瓦迪，不过当他加入美国国籍时，父亲把名字改成了威廉。据我所知，他的名字曾经是瓦迪·易卜拉欣·萨义德；然而，当我在圣乔治学院上学时——这是一所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公会^[3]传教学校，我也是在英国圣公会郊区接受的洗礼——我能看到父亲作为1910年学校足球队和板球队的队员，他的名字被简单地以瓦迪·易卜拉欣记载在荣誉簿上。后来我意识到，名字在传统使用中仅限于表示家族来源，比如阿布·瓦迪是“瓦迪之父”，伊姆·阿卜杜拉是“阿卜杜拉之母”；或者表示父母的身份，比如瓦迪·易卜拉欣中，易卜拉欣是我祖父的名字；或者表示氏族和部落，比如克莱法维、塔阿马里；或者村庄，如拉姆拉维、纳布尔斯。姓名把我们限制在这些圈子



> 农耕劳作，在海法和拉马之间，1979 年。

里，使得我们的身份或者是如此的本地化，以至于只能为很小一群人理解；或者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只能显示某人所居住的地区或省份。就像我的姓氏萨义德，我父亲在美国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巴勒斯坦时，选用了萨义德这个名字，这些存在于今天的姓氏是英国委任统治（1922 年）、犹太复国运动、民族主义苏醒的产物——这些力量需要可以计算的统计和具体的（所以可以征税）的人口、区划和类别。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阿布·阿马尔、阿布·吉哈德、阿布·菲拉斯之类姓名的突然复兴是一种对过去的回归，对更加本质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搜寻。与武装抵抗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这些化名象征着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主宰自己，而不是顺从外来



> 安曼，1983年，巴喀难民营。

势力的压力。当然，只有现在，阿布·阿马尔（“阿马尔之父”）之类姓名的相对无个性才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之类姓名的特殊性共存于世。通过当前的部分再造来回复过去显然是一项政治行为：过多的阿布们首先表明，那些选用这个姓名的人与政治组织有关；其次也表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传统主义者。可以说，从属与起源在此结盟。

这种复兴对戴着头巾（Kaffiyah）的、过去曾经而且仍然名叫阿布·穆罕默德或阿布·贾法的农民而言，是福祸兼有。他要选择是继续当一个无名的人物，只有他的直系亲属、朋友和同村的乡亲们知道他，还是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可能招募的潜在成员。

任何人对过去的知晓、对历史变化的了解，以及自己经历的

意识，一定都会影响到他对农民照片的解读。你现在看见的这一张看着世界的脸庞上，流露着的与其说是对被动忍耐压迫的顺从，还不如说是在这张脸庞可以直译的内容背后所保留着的东西。这个人住在可怕的安曼巴喀难民营。你能肯定他能够做些什么——他是个工人或者农民——以及他从哪里来（他的村庄、家庭、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但是他并不是不带任何政治或历史细节和发展地，去简单表达作为典型农民的痛苦、沉默以及长久的悲哀。在这样一张脸上，我们现在能够看清一些不同的东西：在漫长和紧张的历史中，建立储备起来的力量，为现在感到灰心 and 愤怒，为未来感到不可救药的担忧。

再来看看那些牧羊人、田间的妇女、戴着头巾的男子，再加上莫尔早先在 1950 年拍摄的单独一卷伊尔比德农妇的照片。从一种混浊的感觉上来讲，他们都没有代表一个明确历史时期的标记。因此，他们可以是在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拍摄到的场景。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然而，所有照片拍摄的都是劳动着的人们，辛苦生活的农民，耕作着贫瘠的土地，气候恶劣，需要无止境的努力。我们——你们——知道这些是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因为我已经认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我知道他们是巴勒斯坦农民，而非黎巴嫩或叙利亚人，因为吉恩是我的证人。但是就这些照片本身而言，它们是沉默无声的；它们似乎渗透着一种呆滞，胜过它们所表达的任何意思，因此需要解释性说明来加以修饰。

另外，传奇在我们的脑中自动形成，使得这些照片更加模糊不清。这些照片表现农民阶层劳动人民的这一朴素的事实，却经常妥协于浮动在照片表面的一些零散的文字。一张标签这样写道：“田野里的牧羊人”，你可以在这后面加上“看管他们的羊群，



> 伊尔贝德的农妇，1950年。

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或者，这两张妇女的照片会引来这样的短评，如“永恒的东方”和“伊斯兰女人的悲惨命运”。或许，最后，你还能想起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于“这种人”而言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一个为无名的巴勒斯坦人的贫穷生活，补上难民身份的政治礼物，另一个则给“巴勒斯坦民族”以身份和指引。然而这些解释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与照片内涵的一种可怕的直接关联：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劳动”，即由不能控制劳动产品或自身劳动力的人们所进行的劳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任何可能被联系到这些照片上的异国情调的浪漫都迅速散尽。作为保存这些场景的方法，用照片来表现成为一连串记录的顶点。劳作着的巴勒斯坦农民是半打其他程序的傀儡，但没有一项程序让这群勤劳的人们和他们

自己的劳动力保持完整无缺。

* * *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书籍中，关于巴勒斯坦最有名的莫过于菲利普·J·鲍尔登斯珀杰的《永恒不变的东方》^[4]。滔滔不绝，充满各种信息——人种学的细节，民间的智慧，农夫的知识——它的内容权威，不存在解释和观察上的问题。鲍尔登斯珀杰是一名阿爾薩斯傳教士的儿子，他是个养蜂人，也是个民俗学者。鲍尔登斯珀杰在这本书中收录的关于巴勒斯坦农民的信息比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的都多，再加上芬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希尔马·格兰奎斯特^[5]关于艾尔塔斯村的研究，我们就得到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关于巴勒斯坦农村研究的档案材料。

然而，读着鲍尔登斯珀杰和格兰奎斯特的文章，看着他们的照片和插图，我却感到自己距离他们所描绘的人们更加遥远。

就像定律那样，巴勒斯坦农民有深棕色的皮肤，黑色头发，以及长又宽阔的胡子，这不同于贝都因人，他们的胡子稀疏，只装饰下巴。当然，在一个如此经常遭到外人侵略的国家，总会有一丝外国的血统。巴勒斯坦各地，尤其是靠近大的中心地区，你也许会感到惊讶，居然能见到金黄色甚至红色头发的人。但是主要的人口还是棕色头发，长着厚而钩状的鼻子，圆头，厚嘴唇，大骨架，宽肩膀，宽大的手掌，以及，如同定律一样，适当的肌肉——既不太胖，也不太瘦。女人的个子要小

一些，精致的身材，强壮的臀部，形状美好的胸部，几乎都是瘦小的脚和手掌，深色的眼睛，以及浓密的黑色长发。男人和女人总是穿着有宽大袖子的朴素长袍，如果不用带子挽起来，都长可及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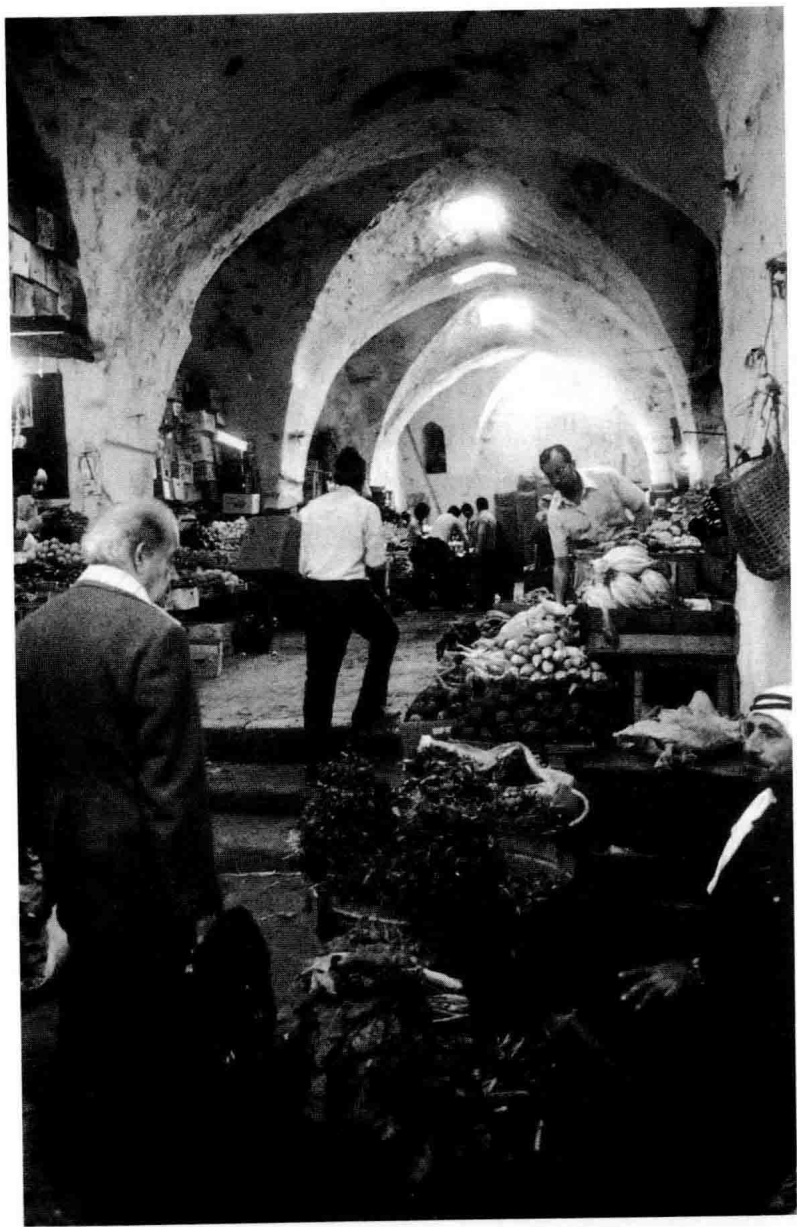
当我在阅读如同上面这段鲍尔登斯珀杰所写的类似篇章时，我想到的是，完全没有巴勒斯坦人写过同样的主题。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够记录下一个重要的农民文化的存在，而且也能记录下这一文化是如何被动摇，并且在向更多地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是如何被连根拔起的一连串过程。我听说有一个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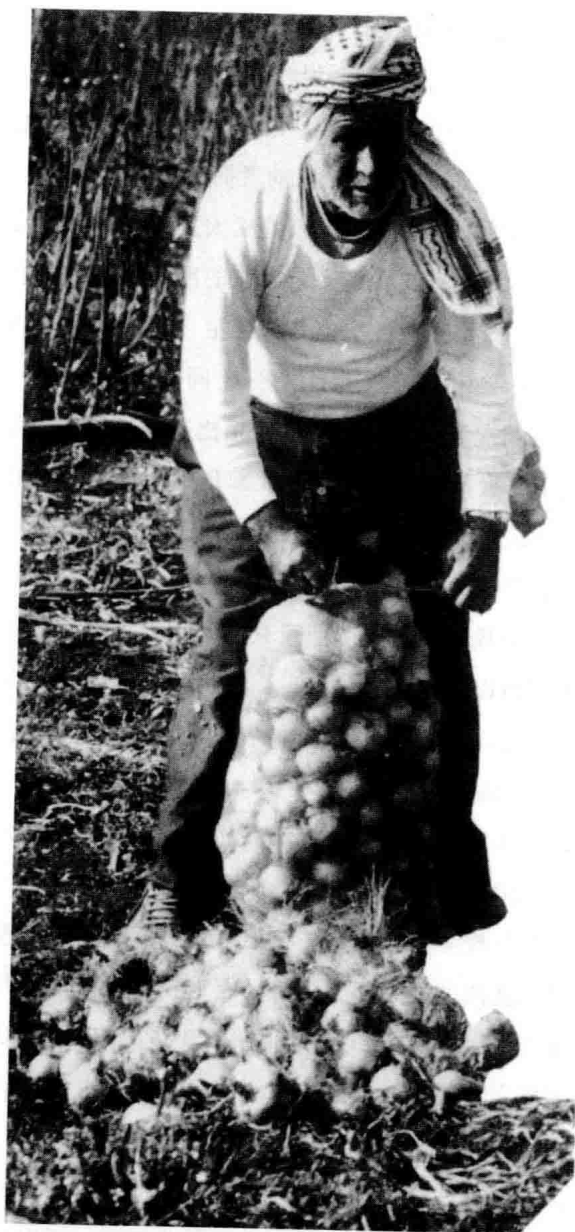
> 靠近卡梅尔山附近，1979年。农妇们拾完木柴回家。

作陶菲克·卡南^[6]的人，常被欧洲人用来当作当地的信息源，他是一位对自己民族很有研究的非凡的民族志学者，但是据我所知，人们无法轻易看到他的研究。为什么有这样的空白？难道我们从来不关心自己？我们如何记录时间的流逝，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历史的变迁？但他们在旅行、观察、撰写研究和小说、关注他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这就好像是，经过了多年辛苦的劳动，大量的痛苦，以及贫穷、疾病和无知的悲惨经历，我们只能把自己从土地送往市场，一个邋遢、混杂和凌乱的仓库，点缀着农产品，希望可以吸引人们的视线——一个路过的商人、一个闲逛的男孩、一个胆小的家庭妇女的目光——让农产品可以在那里被消费，从此消失。然后又开始重新种植，精确地重复着那条相同的短暂路径。

在我们的历史中，他们想要记录和系统化的强烈欲望，与我们被动和分散的不连贯间的对比，一次又一次出现。比方说，巴勒斯坦境内，犹太人定居点的复国运动系统和组织卓越而全面，相比之下，我们在巴勒斯坦内有效维持生存的民族努力，基本上都依赖于个人——这里一个坚定的农夫，那里一个优秀的医生。你可以在个体的具象中，看到我们劳动人民完全悲剧的、几乎彻底失败的历史：种洋葱的农民、修理汽车的机械工、建筑工人、家庭佣人、学校老师、卑微的政府和商业职员、牧羊人、商人、知识分子、小贩或小店主。非常偶然地，这些人能够得到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的其他支持，最显著的就是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自1970年以来，巴解组织就作为一个指引和保护劳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工具而存在，保护巴勒斯坦人不受市场、战争和离散的蹂躏破坏。然而，在大多数时间，他们只能自己面



> 耶路撒冷，1979年。旧城里的一个永久性市场。



> 种洋葱的农民，靠近杰宁，1984年。

对这一切，依赖于那些不受控制的政治和舆论，来换取他们的劳动报酬。有关“二战”前巴勒斯坦经济的标准参考书，萨义德·希马德^[7]的《巴勒斯坦经济构成》，记录了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在构成、报酬和权力之间的明显差别；前者拥有总工会和大量的服务，这些服务由具有欧洲思想的、忠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们维持和指导，然而我们的人民，或者是尚未启蒙的准封建地主阶层，或者就是没有组织的城市工人，只能自我保卫。结果就是阿拉伯人的工资基本上取决于市场供求，而且地区不同差异很大。

1938年的情况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还算美妙。如今在以色列人的统治下，大部分巴勒斯坦工人都集中在工资最为低下的阶层；他们是建筑工人、机械师、家具工匠、木工、家具商，这些都属于所谓的第二等的、劳动密集性的劳动力市场；第一等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战略或军事工业，只向犹太工人开放。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工资由以色列工会决定，而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工资也总是比犹太人低很多。但是，两者在工作条件上的对比——在所有地方——才是最强烈的。

根据社会学家伊莱亚·朱雷克^[8]的研究，大约70%的阿拉伯劳动力前往犹太人的场所工作，而在年龄介于15岁至25岁的工人当中，这个数字接近90%。在很多情况下，前往那些工作场所的交通费用就抹去了大部分工资，因为我们被禁止在大部分犹太人区过夜；实际上，在绿线^[9]范围里（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一些以色列雇主在凌晨2点到6点之间把来自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工人锁起来。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成为一支流浪和贫穷的劳动力。在最贫穷的地方，比如加沙，童工市场非常繁荣，而以色列的经

济萧条已经把阿拉伯人的计日劳工，变成了绝望的可以运输的日用品，他们在市场中闲逛，直到被犹太人企业主挑中，去另一个地方做一天的计件工作。

然而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仍然劳动着，通常没有很多希望或前景，结果对工作的疏离如今已经逐渐被吸收和转型为一种主流的态度。拉贾·舍哈德^[10]是一位约旦河西岸很有天赋的年轻律师和作家，他把这种态度形容和刻画为“原位不动，用各种可行的办法坚守我们的房子和土地”。工作首先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抗拒的形式，一种把存在变成小范围固执的方法。你接受机会的限制是已经设定好的，你认为可预见的改变只能带来更坏的，而不是更好的情况。那样，工作就成了每日衡量把你束缚住的现状的尺度；工作向你讲述你的实际情况，你发现它触发了你去认识关于自己的一切，你今后会去向哪里，以及你周围的机制是多么疯狂地复杂。拉贾·什哈德说，有时在某个非常的时刻，你会发现自己的自由，它既不是投降，也不是“盲目和强烈的恨”，而是一种认识，认识到“你的思想正是你能够阻止压迫者有力量去触及的东西”。

尽管如此，关心和焦虑依然在巴勒斯坦人中蔓延开来。没有防备的沉思也正是最易受攻击的一刻。孩子们会不会因为辱骂定居者而被带走？“他们”会不会又侵占另一块土地？无止境的担忧，却没有真正有效的解毒剂，除了明天继续外出工作，周而复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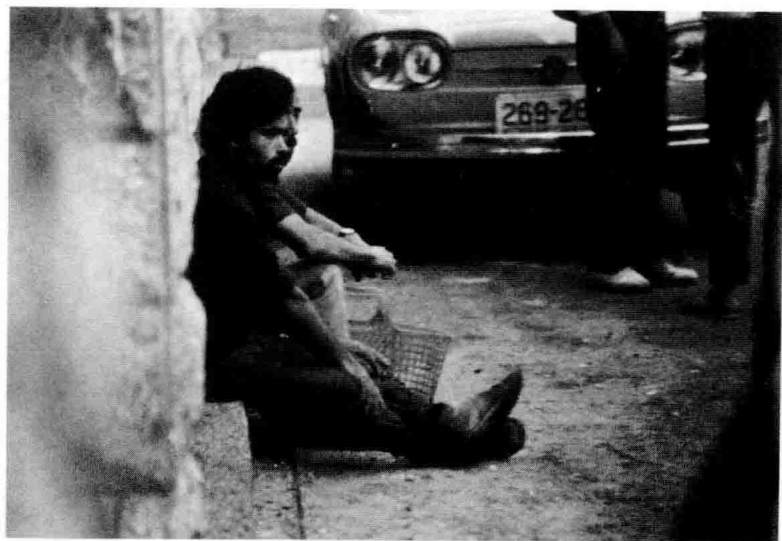
观察犹太复国运动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之间两点令人震惊的不同。在达到目的（主要是获得土地）方面，犹太复国运动实际



> 阿卡，1979年。靠近老港口，人们正在维修一个引擎。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陈旧而不能挽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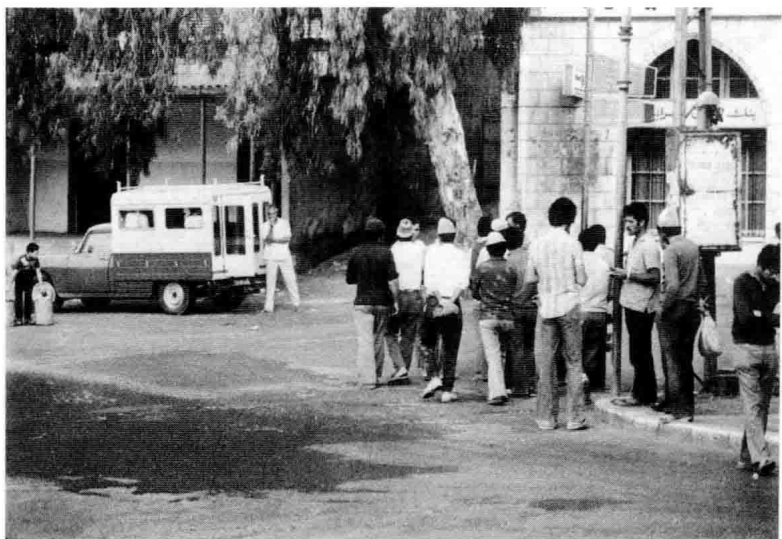
> 拿撒勒，1979年。清晨5点，城市的主要街道。寻找工作的阿拉伯人正等待被人雇去做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去这个国家另一端的一家农场或者工厂。



> 拿撒勒，1979年。等待。

上是具体的功利主义政策，而巴勒斯坦人则倾向于——几乎没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无法攻破的泛原则上表明立场，这些原则永远都无法阻止土地从我们脚下被剥夺。这样的结果就是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拥有了一个国家，而巴勒斯坦人则没有。当然，犹太人复国运动的确在敌对双方中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它也依赖一些宽泛的原则，但是动员的焦点却被限定在一些较小的范围内——就象哈伊姆·魏茨曼说的那样“再一头山羊和再一英亩土地”。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为这样的说法激动——当那一刻来临，英国人的委托统治结束，犹太复国运动者们就会被我们英勇的巴勒斯坦壮士赶走，他们只需要棍子就能够



> 拿撒勒，1979年。讨论一下工资，然后就出发去干活。

把犹太复国运动者们赶回家。然而,我同样记得那永不休止的讨论;证词声明,关于我们事业正义性的宣言,以及那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的视觉证据——一排排犹太人农夫、学童,甚至行人都在着手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与之相反的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继续着他们紧急但没有目的的生活,他们当时所拥有的多得多的土地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阿拉伯人的社会中没有犹太人那样的细节和具体,也没有那种会把电影票价中的一部分上缴给犹太社^[11]的组织。我们曾经拥有并且仍然拥有的是我们的市场和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凌乱、无人记录,并且廉价。

第一个不同有趣地衍生出第二个不同。根据定义,犹太人散居的地方并不是巴勒斯坦,因此,犹太人以复国运动为名义,在应许之地^[12]所做的一切就好像被展现——或许在这里放映是个更好的词语——在一种世界的戏剧舞台上。土地和山羊,医院和学校,定居点本身:所有这些似乎都不是单纯地发生,而是作为一出戏剧的一部分在发生,全世界在见证这出戏剧,它是关于重建——或者就像魏茨曼称呼的“重构”——巴勒斯坦。对于犹太人的离散而言,这出戏剧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总是想要为西方世界关于犹太人的传统观点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说教式的画面。后来,关于重建的信息被改为要适应由“二战”大屠杀的恐惧所造成的情况:巴勒斯坦成为避难所,成为为那些被纳粹德国剥夺但没有被屠杀的犹太人所做出的积极行动。接着开始有观点认为,犹太复国运动者是开创者和先驱,接着是斯巴达式的人,然后是存在主义的英雄。这种自我意识戏剧的部分最近被表现在以色列小说家阿莫斯·奥兹^[13]的作品中,奥兹说道:“穷我一生,我都为那些来到应许之地的人们感到激动,他们把应许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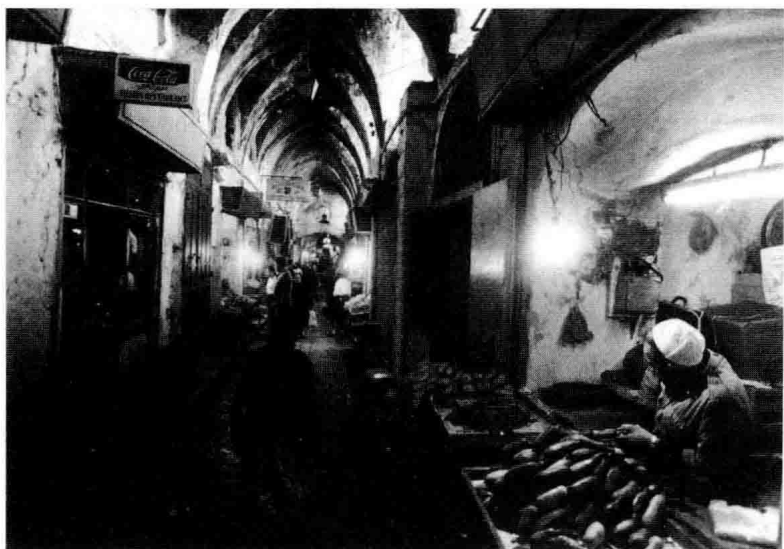
> 阿卡，1979年。木匠。

变成田园般的天堂，或平等主义的托尔斯泰公社，或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中欧领土，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复制品。”犹太复国运动不仅要重建以色列，而且要向世界显示，犹太人 can 成为巴伐利亚人、托尔斯泰的信徒或者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这篇文学作品所写的那样，这一切都要发生在这块被“忽视”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这些使人们想起康拉德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中白衣会计的近乎超现实主义，这个会计显然忘却了最黑暗非洲“土地上的巨大道德败坏”，继续着他作为英国人的常规，“献身给他的井然有序的书本”。

然而，在巴勒斯坦早已有其他民族的存在，在具体政策下的土地缓慢积累，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眼前痛苦形成，这一切或多或少地要抹去这块土地上原先的居民。直到 1948 年，巴勒斯坦少于 7% 的土地由犹太人拥有；在巴勒斯坦的 16 个分区里，只有 8 个分区有超过 1%—2% 的土地由犹太人拥有，而在这 8 个分区中犹太人拥有土地的百分比也从来没有超过 35% 和 39%（分别在雅法和海法），并且通常低于 20%。然而，大约 77% 的巴勒斯坦土地变成了以色列——换句话说，这些土地完全被以色列国家统治，以色列宣称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国家”，却没有官方宣示的边界——1948 年 5 月大卫·本-古里安^[14]宣告国家成立时，故意没有提及（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巴佐哈^[15]）任何关于国际边境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以色列境内的土地都是被立即从阿拉伯人手中剥夺的。大部分是缓慢地、在一个精心设计并被无情实行的《不在地主财产规定》的过程中发生；笔尖一划，40% 的土地就被没收。到 1950 年，一项最终版本的土地法被通过：《不在地主财产法》^[16]，这项法律授权“不在地主财产”的以色列保管人



> 纳布卢斯，1979年。市场。



> 耶路撒冷，1984年。旧城，阿拉伯人区。

可以任意出售这些阿拉伯土地。讽刺的是巴勒斯坦人当然没有，在任何永远的概念上，“不在”：如果允许，那些被赶入周边国家的数目巨大（大约 78 万）的巴勒斯坦人一定会愿意回来。大约 16 万人留下来成为非犹太裔的以色列公民。一方面是难民，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的官方说法，是“在场的不在者”。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被占领土，如今大约已有 50% 的土地被征收。发展被禁止，建造楼房罕有允许，水和电都被以色列控制，因此每年有超过 1.5 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每天迁入以色列境内的大规模的巴勒斯坦非熟练工的人流，估计在 9 万左右，这进一步加剧了被占领土的贫困。约旦河西岸剩下的当地产业往往是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没有多大市场，基本依赖于在其他国家（阿拉伯

世界、欧洲、美国)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汇款。

尽管如此,微笑仍然在逆境中继续。

为什么这些处于凌乱落后中的原住民们无法用他们的存在来触动犹太复国运动者,甚至更少地触动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原因。当然,一个重要的答案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的盲目。比如说,在犹太复国运动者和美国清教徒^[17]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或者在犹太复国运动者和19世纪欧洲认为亚洲和非洲是“空白领土”的理论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同样的盲目怎么会重复出现在那些现代犹太复国运动的历史学家身上,他们在复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后见之明,而是带着和早期犹太复国运动者们如出一辙的盲目。这种观点的最新版本是一些美国犹太复国运动者——琼·彼得斯^[18]及其支持者,比如索尔·贝娄和巴巴拉·塔奇曼——所认为的,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是在1946到1948年间,被犹太殖民地的富裕所吸引,而从临近的阿拉伯国家进入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

但是,还有其他更加直接牵扯到我们的因素。很自然地,犹太复国运动以犹太人的名义所取得的真实成功,负面地反映出阿拉伯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缺乏卓越的历史。这就好像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细致的阴谋和它的戏剧效果,加之我们自己无能也不愿意去戏剧化地表现和谈论我们自己,于是这一切在世界和我们自己面前遮蔽了巴勒斯坦人。确实,就像政治学者伊卜拉欣·阿布-卢格德所写的那样,1948年之后的整整10年中,巴勒斯坦人采取了一种让自己适应周围阿拉伯和以色列现实的政策;他们变成了埃及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他



> 提尔，黎巴嫩南部，1983年。拉希戴难民营的难民。

们的这种生活被记载于萨布里·吉里斯^[19]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1976)中。这本书举例说明了这个过程——这本书最早是由这位信仰基督教的希伯来大学的巴勒斯坦法律专业毕业生,参照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并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在纳赛尔时代,巴勒斯坦人被一场阿拉伯民主主义情感的大众浪潮所吸引,这被阿布·卢格德称为“拒绝的政治”。那些年的拒绝的热情不断回响着1967年的喀土穆^[20]首脑会议上的“不”: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向以色列屈服。在1967年后,由于阿拉伯人战败所打开的缺口,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主张成为一个单独的现象。在一场新的被称为“革命与希望的政治”的运动中,大规模的自助运动就此开始:巴勒斯坦人甩开他们的保护人,武装起自己,宣布他们自决和自我复兴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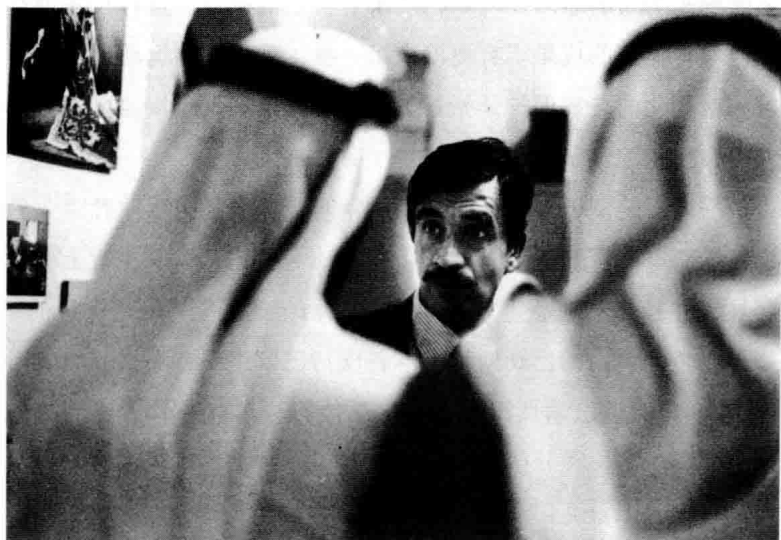
不过,在所有这些阶段中,除了少数文学作品(包括马哈茂德·达维什、萨米·阿尔-卡森姆^[21]和托菲克·扎亚德的诗歌,加森·卡纳法尼写的少数故事和一部中篇小说,埃米尔·哈比比的讽刺小说,法瓦兹·图尔基^[22]的自传回忆录,以及穆因·巴西苏的加沙日记),巴勒斯坦社会具体的人性细节为了大而泛的概念而被牺牲掉了。比如说,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我们对于“武装斗争”的坚持——这个词最早象征着巴勒斯坦人要靠自己、永不放弃地争取政治权利的意愿——很快转变为对战争形势、枪械和口号的盲目崇拜,而这一切都是从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人民战争理论中借用来的。这种对武装仪式化的和明显的强调,导致我们忽略了斗争中异常复杂和重要得多的政治文化因素,这一切反而对以色列人有利;以色列用它强大的宣传工具,把我们所有反对他们占领我们土地、毁坏我们村庄、镇压我们人民的举动,

变成了“恐怖主义”。

不过，这些悲观和批判的事情绝不能说明完整的情况，那就是巴勒斯坦民族在穷困中非凡地崛起。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排他措施的全面反对已经成为一个有力的象征，象征着挑战中东各地的混乱现状意味着什么。1978年和1979年中，巴勒斯坦人被伊朗人欢呼为楷模和英雄，在之前则是被埃及的学生、知识分子、叙利亚工人和第三世界的解放组织欢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出现——总是徘徊在革命理想和更加实际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目标之间——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大批巴勒斯坦的机构（学校、工厂、医院、研究和出版网络），它们对于今天巴勒斯坦人离散的生活敏感地做出反应。当然，核心的事实尚未改变：我们是一个没有自己土地的民族。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把巴勒斯坦人看作正在创造自我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一个巴勒斯坦自我意识影响到每个人的崭新环境中，从事着自己的事业。这种自我创造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有史以来第一次，犹太复国运动的细致政策和戏剧化的自我保护开始摇晃，显得完全不足以掩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举下面的例子来做证明。在早年间，犹太复国运动者完全忽视巴勒斯坦人，但是自从1967年以来，他们在语调和主旨上变得刺耳，并且公开地恶毒。1978年，摩西·达扬^[23]是这样说的：如果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准备支持巴解组织，那么我们应当像1948年驱逐巴勒斯坦人那样驱逐他们。艾坦将军^[24]（当时的以色列国防军长官）在接受《新消息报》^[25]的一次采访时（1979年1月19日），说到以色列的计划：“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前，我们来到这里（征服）这个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国家才

被建立。”在被问到加利利的巴勒斯坦人时，他回答说：“在我看来，如今阿拉伯人正在从事征服土地、征服工作、非法移民和制造恐怖的过程。”顺便提一下，加利利是巴勒斯坦人目前——以及一直以来——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声明当然成为迈尔·卡亨^[26]恐怖号召的背景，卡亨号召要把阿拉伯人从所有以色列的土地和被占领土上赶走。《晚报》^[27]上的一幅漫画：一只油桶里冒出一团黑色鬼怪，带着一张怀有恶意的脸，长相类似阿亚图拉·霍梅尼^[28]，这个鬼怪邪恶的面貌反映了所有关于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东方人的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这个公然的（而且荒谬的）反犹的怪物被称为“伊斯兰—反应”。旁边站着的是一个代表着西方的正派模样但有些忧虑的绅士，和一个戴着圆顶小帽^[29]的小男孩。



> 耶路撒冷，1984年。一场关于土地的令人焦虑的会议。

小男孩对他身边的年长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搬走？”

尽管我们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到处背井离乡，我们的环境不断恶化，我们的军事实力和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异常地软弱，为什么我们仍然显得对所有人都具有势不可挡的威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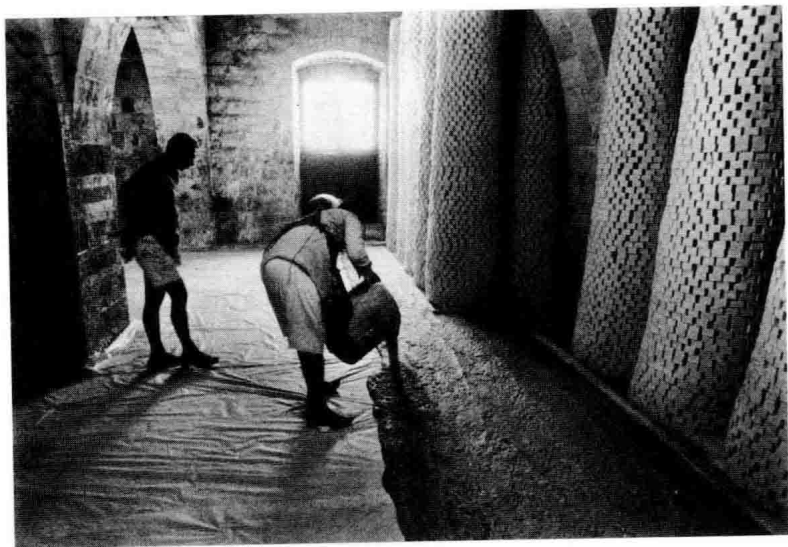
* * *

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这名学者实际上构建了初生的巴勒斯坦社会学——是伊莱亚·朱雷克，目前他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巴勒斯坦教会教徒，但是和我不同的是，他基本都是在以色列接受的教育。他能熟练使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1980年他建立了关于巴勒斯坦生产力—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模式，那时他和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珍妮特·阿布—卢格德^[30]，以及其他几个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课题组的成员，主要负责基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需求和当前现状，规划建立一所巴勒斯坦大学。他们的研究被接受，计划随即在贝鲁特开始实施（雇用员工、购买土地、规划课程），讽刺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1982年那个混乱的春天。这个项目如今什么也没有剩下，只除了一些珍贵的文件；它们被用于其他的项目中，但是没有一份文件能够真正解决其他所有研究都提出的两个问题：要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生活，缺乏安全的场所，以及民族权力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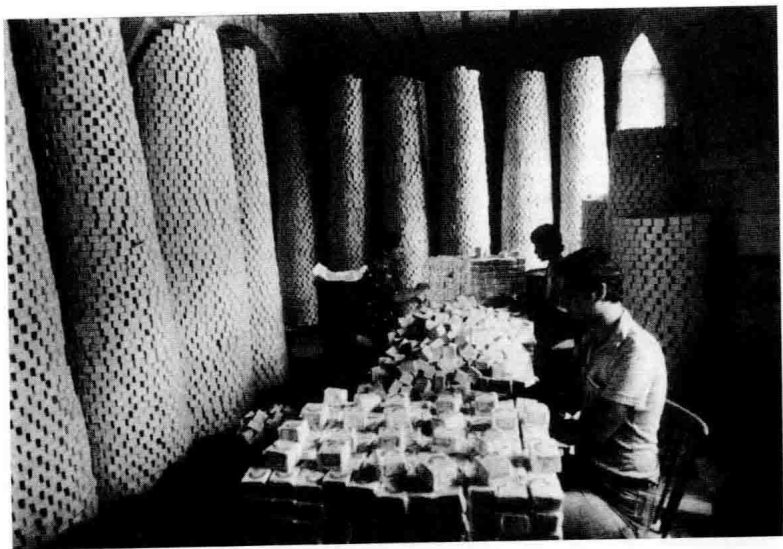
朱雷克的图表列出了巴勒斯坦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概括地说明了从1948年至今，我们的流散和境内的殖民化是如何进一步恶化的。

发展阶段	时期	显著特征
双重社会 （犹太复国运动者建立殖民统治）	1948 年以前	不均匀的力量关系由英国势力调停，排他主义的犹太复国运动机构创立；阿拉伯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犹太复国运动者实施霸权以及最后巴勒斯坦人被驱散。
境内殖民地化 （1967 年以前的以色列）	1948—1967	巴勒斯坦农民被边缘化；土地被征收；政治操纵；经济发展停滞；居住者和占领者种族隔离；双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对约旦和埃及的依赖	1948—1967	经济和政治依赖于约旦和埃及；占领和政治压制。
以色列境内的殖民化进一步加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对以色列的殖民依赖	1967 年至今	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进一步无产阶级化；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经济渗透，伴随着土地征用和鼓励巴勒斯坦人移民；政治压制，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彻底为以色列控制	未来趋势	通过驱逐和移民，巴勒斯坦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终极目的是在历史的巴勒斯坦国上完全实现犹太人复国，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迁移到阿拉伯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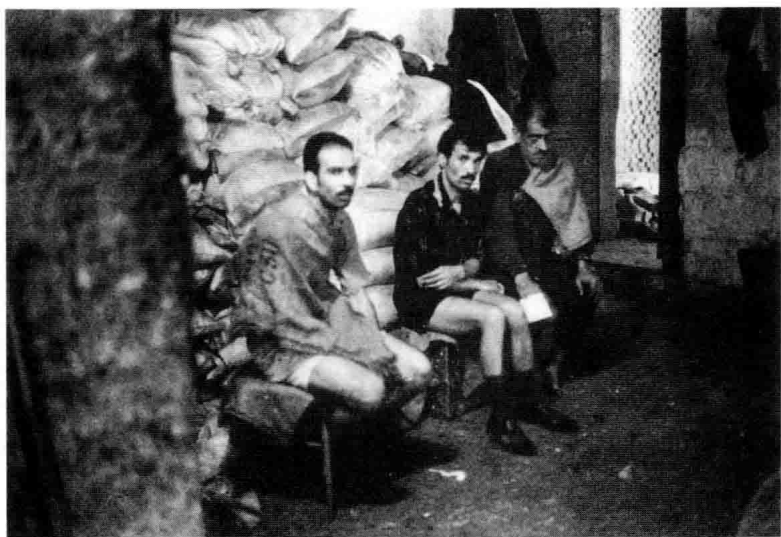
然而又一次，这些事实所传达的令人沮丧的画面并没有道出完整的故事。是的，我们次于以色列的地位并没有改善。但是两者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曾经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不成形的统治，如今变成一系列较小的、各式各样的结构。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的占领在我们民族当中创造了新的组织，它们强调、



> 纳布卢斯，1979年。肥皂厂，当地的传统工业。



> 纳布卢斯肥皂厂。



> 纳布卢斯肥皂厂，一天结束。

扰乱或者中断了覆盖在我们身上的势力。这些新组织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是民族主义的，它们带来了比在约旦人和埃及人统治下更加完整的计划：更强大的力量制造更有力的抵抗。大部分组织都涉及建造——这些人或团体真正建立起巴勒斯坦的公共机构——或者思想，有关团结的思想，有关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传统（turath）的思想，有关自决和全体命运的思想。

我对这些新组织的印象是复杂的。一方面，我认为它是最令人沮丧的现象之一，因为它把巴勒斯坦两极化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阵营，每一边都防范着对方不妥协的、仪式主义的，因而潜在空洞的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间的辩证关系上升一等，变得更加狭隘。仅仅因为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的行径把我

们降到第三等的地位，而为了自己去主张巴勒斯坦主义已经不够。的确，在一些情形中，这种反应的结果是在政治上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发展，以至于我们往往用绝对的观点来严格区分敌人和朋友——或者更糟糕，怀疑彼此妥协、投降和通敌……一种新的词汇就此发展出来，却不是为了增进理解，而是为了削弱这个世界。

然而，我想要去相信，大体上这些新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真正有益的。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已经显而易见，这个领导阶层并非完全基于部落根源或者氏族关系网。这些都已经变得次要。这些新的男男女女们自信且有教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接受以色列的现实，他们散发着一股充满希望的安心，令像我这样的离散者们嫉妒。他们的坚持（sumud）是真实的、具体的、实在的：他们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之于他们并不像对我们而言那样的只是个概念，而是一个实在的地方。在这个自从1967年开始建立主人与奴隶关系的紧绷而狭小的世界中，他们努力地打开缺口，创造了供巴勒斯坦人选择的非主流机构，比如巴勒斯坦文化中心等，把学校、专业协会、女性团体联系到一起，和以色列当局掌控下的生活共存。

除此以外，通敌阶层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以色列试图使用六七十年代的部落族长、七八十年代的所谓乡村联盟^[31]作为工具，来创造巴勒斯坦卖国贼的政治组织，这些企图都失败了。相反，以色列的这些策略——由以色列警方残暴的方式支持着，毁坏了成千上万栋房子，超过25万人遭到逮捕、经受折磨，并被谋杀——似乎加强了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控制，他们领导的组织让被占领土的以色列统治出现短路。然而，一些可怕的伤亡也随之发生。像纳布卢斯前市长巴萨姆·阿尔-沙喀^[32]这样受

欢迎的领导人，为自己人民的困境作证，却为这样的证词留下无法挽救的创伤。

坚持不懈的奋斗，从分娩、建造，到作证和斗争，仍在继续。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民族主义的计划，以及自己的法定代表巴解组织，为以色列犹太人重新打开了在1948年巴勒斯坦社会被摧毁时关闭的卷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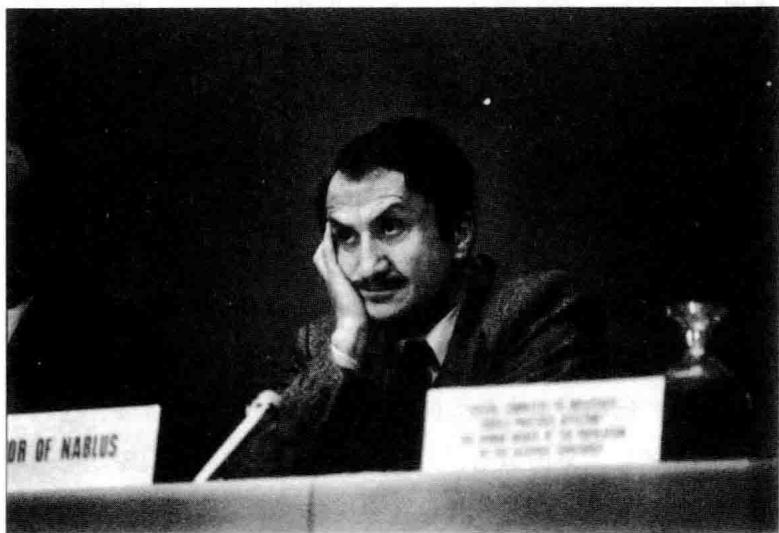
在这些档案中埋藏着的是一个真实的民族曾经存在的记录，如今却在各个方面被一个新的国家所取代。然而，可以说，自从1967年以来，典型的巴勒斯坦人的出现打开了一些以色列人的视野，但也加固了其他更多以色列人的否定。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人直率的特征，以色列开始宣扬一个相当虚构的组织，即“恐怖分子”，不仅自动包含着一种身份，而且还有一整套邪恶手段的纪律。这是一个真正的产业——由特拉维夫到华盛顿的研究恐怖主义的机构运作，配备着专家、研讨会和无止境的文件——搅和出一门叫作反恐怖主义的“科学”；这个骇人听闻的学说成果，被应用到已经被诽谤成没有人性的巴勒斯坦人身上；这使得以色列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变得正当，甚至包括对仅仅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想所采取的恐怖活动；空军、海军、行政的雄辩，以及学术研究都参与了这一切恐怖活动，其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滑稽地夸张了我们的实际力量。这种扭曲令人想起斯威夫特^[33]在《格列佛游记》的第一、第二次旅行中生硬地把大和小并列。一方面，可以忽略不计的恐怖分子是小人国的侏儒；另一方面，他们如此着迷于要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和渺小化，以至于把威胁膨胀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巴勒斯坦人正是大人国里的巨人。

我不喜欢把这称作巴勒斯坦人的“离散”^[34]：在我们和他们的离散中，只有一个明显的对称性。此外，犹太人的离散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已经不复存在，不同于过去，它曾经存在于中欧，其核心的悲剧人物包括卡夫卡、舍恩伯格和本雅明。今天犹太人的离散主要以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为代表，是完全不同的现象。令人惊愕的敌意、遣散和轻蔑的油滑语言、令人震惊的无知和罪过——这些都是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们的特性，他们的力量确实强大，他们被集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所采取的语言上的斗争方式只有很少以色列人才会采用。因此，我发现和以色列人辩论，要比和一个美国犹太人辩论容易得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远离家园（ghurba）和流离失所（manfa）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最简单地来讲，我们现在与巴勒斯坦在人口统计上的关系要比1948年以前犹太人的关系牢固得多。今天，在大约45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183万人（40.7%）仍然居住在历史上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266.5万人（59.3%）住在其他地方。在这些其他地方当中，108万人在约旦（24%）；40万人在黎巴嫩（大约8%）；25万人（5.5%）在叙利亚；差不多80万人（17.8%）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还有18万人（4%）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所以，巴勒斯坦人最大的集中地还是在阿拉伯世界，这不同于离散的犹太复国运动，大体上仍是一个欧洲的现象。巴勒斯坦人勤劳、专注，以及异常足智多谋的工人的名声——就像犹太人在西方的名声那样——已经成为传奇的一部分，且并非完全夸

张。这一切显然是真实的，比方说，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中拥有最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同样的，在海湾地区、约旦，以及直到1982年为止的黎巴嫩，巴勒斯坦人都表现突出，是教师、医生、工程师、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大胆，闪耀的才华，有点儿不稳定和没有安全感的野心，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东道社会中所具有的品性。我经常听说，人们偷偷地把大灾难责怪到巴勒斯坦人身上。

巴勒斯坦人离散的当前“成功”——虽然可能是去中心化、深奥和难懂的——和1948年刚过时我们处境之坏相比较，真是令人吃惊。关于那个时期开始的日子，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大部分都



> 日内瓦，1980年。联合国召开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会议，纳布卢斯前市长巴萨姆·阿尔-沙喀坐在演讲台上。



> 日内瓦，1980年。沙喀先生，在一次袭击中失去了他的双腿。

是模糊不清的少年时代的回忆，其中都是经过延迟曝光了的苦难经历，遭受这些经历的人们基本上都和我没有直接的接触。我的直系家庭因为富有，以及当时的居住地开罗的安全，而与这一切绝缘。接着，在1948年的春天，代尔亚森屠杀刚刚发生，我的姑姑和她的家人就从耶路撒冷而来，显然因为对那些被他们置于身后的东西感到愤怒和困扰，对未来无法确定；我母亲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从雅法和萨法德等地搬去约旦河西岸；之后他们还会迁往安曼。我基本不知道在巴勒斯坦发生了什么，除了从开罗的犹太人同学艾伯特·科罗纳尔那里听到的一些内容，他曾经带着苦楚间接提到5个阿拉伯国家正在攻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5对1，他说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或者指的究竟是什么，尽管在同一时间，我的姑姑和表兄们——属于上一代的——用可怕的具体词语说起过代尔亚森屠杀。

这些自传式的片断对我而言就像是个索引，记录了我那时对于灾难（nakba）了解得多么少，以及我即将开始在巴勒斯坦人中发现通过工作而进行恢复的力量。由于我姑姑纳比哈是一位拥有超人精力和慈悲的女性，她立即开始投身到涌入埃及的难民安置工作中。她是个富有的女人，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资源，但是当她在每周五午餐时间给我们讲述她的经历时，她总是为阿拉伯国家机构的无情感到沮丧，更不用说埃及的官僚主义了。巴勒斯坦人不能获得居住许可、工作许可或旅行证件。大部分人都成为穷困潦倒的难民，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任何依靠。纳比哈为了这项事业，资助每一个能想到的朋友和相识——当然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她迫使学校接受孩子，企业接受学历不高的雇员，车间、饭店、宾馆和工厂雇佣不熟练的员工。我记得，

她甚至为一小群男人在塞得港^[35]找到了搬运工的工作，尽管她为在工作日把男人和他们的妻儿分开而感到不安。每周一次，她待在家里接待任何想见她的人：她的公寓外面总是有相当大的人群。其余大部分时间，她和司机在开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处，从黎明开始直到日落结束。她去住宅、办公室、政府中心、医院、诊所和学校，调解、恳求、安排、斥责、分配。她是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妇女，寡居，自从十几岁忍受分娩痛苦以来就健康不佳，她饱经忧患的程度令我无法忘怀，然而她只是带着坚定和直率的高效，承担起一切。

偶尔，她会让我一起去，而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她快速的步伐。她在访问那些糟糕和破旧的贫民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说服那些守着尖叫着的、营养不良的孩子的女人们，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药物。药方，以及更确切地说，用来买专利药物的钱，对于这些可怜的女人来讲，可以创造治愈的奇迹。直到几年以前，一个从那些年的遭遇中幸存下来的相识告诉我，那时候每个穷困和无助的人都在寻找的，是某种能够造成遗忘、沉睡和麻木的药物。而纳比哈从一开始就知道缘由，她拥有一种无限的能力，能够理解和迎战所有可以想象的复杂情况。她把那些处境较好的和较为不幸的巴勒斯坦人联系起来时，她的大部分努力都有所回报：比如说，我父亲的生意就满是巴勒斯坦雇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们都牢记我姑姑——把她称为“巴勒斯坦的母亲”——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母亲。据我所知，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她的任何要求。父亲和姑姑非常亲近，我母亲经常会带点儿嫉妒地说，他们两人就像是被一切为二的豌豆。他们都是真诚的人，为无言的忠诚所驱动着，“忠诚是最好的方针”

这样的陈词滥调虽然陈腐，但在他们的例子中却达到了理想化的清澈和清廉坚定的出色。

姑姑和我父亲一样，对于官僚作风没有什么信心。自从我来到纽约以后，我不断碰到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或四方援助救济社^[36]工作的、知道并且仰慕我姑姑的人。她传播着这项事业的创始者——移民研究中心^[37]、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四方援助救济社——以及人员的姓名，尽管她知道在她难以言喻的艰难情况下，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无法依靠的。而这正是她所领会的要点：既然每个社会都准备像恪守天条一样地反对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就必须所处的这个系统内努力，同时也努力反对这个系统，争取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创造一个并行的或者非主流的体系，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需求。

在同一时间既要融为一体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在第一代离散者当中，这些人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去摆脱令人厌恶（且痛苦）的身份，试图融入新的社会。在50年代初，我在一个被姑姑带到父亲办公室来的男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矛盾的令人烦扰的迹象。他的名字叫作穆斯塔法，从海法来，过去曾是一个警官。他被雇为某种临时的保安，大体负责楼内的安全，同时他被当作送信人和多功能的杂活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颓丧和伤心。他拥有一副强壮和肌肉发达的体格，然而移动起来却显得不寻常地缓慢，似乎这具身体是属于别人的。他干活时非常关注细节，而且在任何一个级别高过他的人路过时，这种态度都会变得更加明显。那时，他就会又鞠躬，又姿态卑微，又搬运货物、打扫和开门。有一两次，趁他没有注意我（超级大老



> 安曼, 1984年。奈德尔·M·苏克蒂安先生, 工业家, 他出生在纳布卢斯, 1967年以后一直居住在安曼。



> 巴黎, 1984年。大卫·阿方斯先生, 银行家。他出生在耶路撒冷, 在科威特居住了15年, 1974年以后一直住在巴黎。

板的儿子)的时候,我留意观察他。他谦卑的缓慢移动变成了侦探式地偷偷踮脚尖走路,而他瘦削的身体马上呈现出警察的危险变形。在穆斯塔法身上存在着埃米尔·哈比比笔下的乐悲观主义者,那个双重特性的佩索蒂米斯特的原型:这样说吧,在穆斯塔法身上,人们可以同时看到一个在家里的巴勒斯坦人和一个试图精神自杀的难民共存。

他的孩子们,就像众多其他人的子女那样,决心要完成国立教育体系,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些制度都在屈服于——即使是缓慢的——沉默但有进取心的巴勒斯坦人的精力。穆



> 安曼，1984年。巴萨姆·阿布-加扎勒博士，他生于雅法，现在是约旦大学工程与技术系的主任。



> 安曼，1984年。瓦达德·卡瓦尔夫人，她是一位巴勒斯坦手工艺品的收藏家和专家，1948年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安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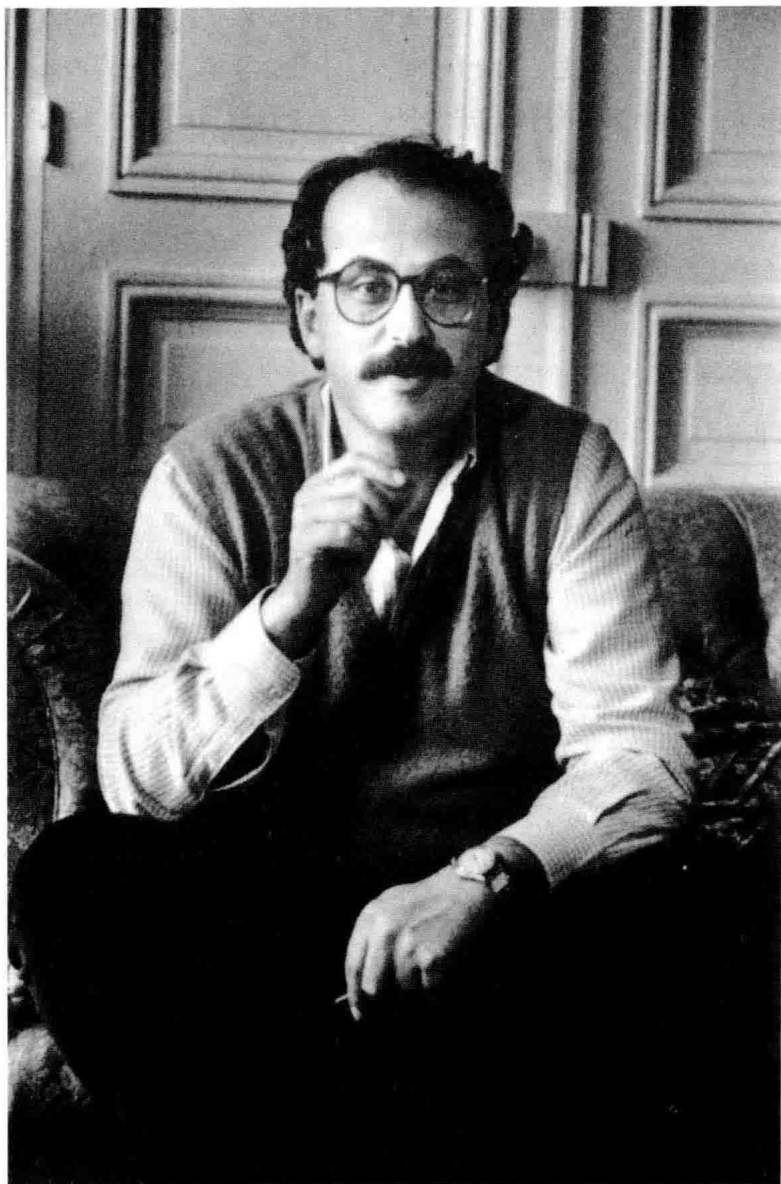
斯塔法为我父亲工作10年之后，他已经有至少3个孩子就读于开罗大学，他们学的都是“艰难的”的专业——医科、工程学和商科。

最大的讽刺在于，通过这种努力的愿望，我们巴勒斯坦人实际上砌起了一个社会，但是并非在巴勒斯坦。魏茨曼在巴勒斯坦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过程——再一英亩，再一头山羊——或多或少成全了在其他地方的我们，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取得过任何土地。不论是在建筑界、医学界、教育领域、工程领域、银行界、美术界，或者学术研究领域，巴勒斯坦人都是卓越的，尽管在安曼、巴黎、华盛顿、科威特和利雅得之类的地方，人们视他

们为异类。这个离散社会最令人吃惊的特征在于它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在 1948 年之后的 40 年间，这个社会穿越了欧洲资产阶级用一个半世纪度过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启蒙运动，到早期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然而，削弱我们社会的缺陷在于它的中心、它的场所、它的定点总是在别处，总是在一个我们曾经认为是自己固有的，但现在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地方：耶路撒冷、安曼、贝鲁特。在本来可以大胆进取的演讲中的少许停顿，或者是在非凡成功的装甲上微小脆弱的缺口，或者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州的罐子^[38]，即便是我们最高贵的公民也把我们每个场景中的非中心化强拉进中心焦点：这一切或许都是在微观层面上重复那个缺陷。

* * *

当然，广布和非中心化的巴勒斯坦离散给新阶级的成员们带来了重要性，而这反过来又对那些总是不为人所见所闻的，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劳工、农民和难民营居民的命运，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被埋藏在波斯湾，或者西顿附近的埃纳尔希尔维难民营，或者利比亚的黎波里郊区和工人定居点的人们，他们构成了我们人口的主要部分。没有人研究过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人尝试过把巴勒斯坦的机构团体看作一个正在运行着的，尽管已经移居国外的社会的表征。但是，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本质，一直荒谬地是遭受剥夺和失去的经历，每个人都经受过，但却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传达。我们这些居住在西方世界的人，受制于教育和文化，把离散看作一种文艺的、彻底资产阶级的状态：



> 巴黎，1984年。伊利·桑巴先生，《巴勒斯坦研究》的编辑，1948年他离开巴勒斯坦前往贝鲁特，之后又前往巴黎。

我们想到伟大的典型人物，比如奥维德^[39]、但丁^[40]、雨果^[41]或者乔伊斯^[42]；我们想到许多德国和意大利现代作家内心的离散；通过这些，我们用类推法，对自己较小范围的离散做出阐明。但是我认为，正是在整个近东受到驱散的巴勒斯坦大众，真正地离散的生活设定了条件；根据定义，这些条件几乎就是沉默、难以形容和极度令人痛苦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那些能够而且可能会阅读这本书，或者看到其中照片的人们——遗忘了其他条件，但是有关它的证据还在那里，完全不是图书馆、美发店，或者银行之类令人愉快的事物。我们的劳动人口在苦难中生存，他们受制于官僚和士兵的指令，时常遭受灾难和羞辱，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他们东道国家的心血来潮和内部政治。

他们的历史和现状永远都无法收回，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可以被人代表，可以和更加幸运的同胞们联系起来。阿拉法特就做了这项事业。至于他是如何做的，没有数据且鲜有事实是有用的。简而言之，我认为他让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他使得在看待中东特别是以色列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看到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仲裁调停的天才，也擅长把巴勒斯坦人生活各异的片断连接起来，他和巴解组织为自己赢得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关注。这对于他的敌人来讲，具有不相称的负面效果，因为他们把他看作首要的叛国者和恐怖分子，但这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却真正具有极佳的正面效果。他的任务首先是把巴勒斯坦的碎片聚集起来，并且给这个整体它从未拥有过的一个形式和凝聚力。在我们看来，他似乎在说，我们的情况是可以系统表达的；可以在世界论坛上被表现；也可以在战场上起来维护自己。第二，他把我们社会各种分散的领域介绍给彼此：难民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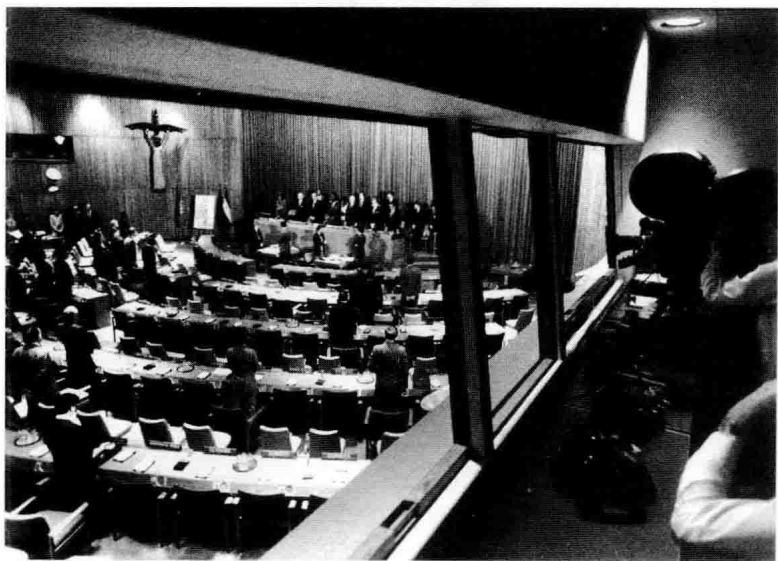


> 日内瓦，1983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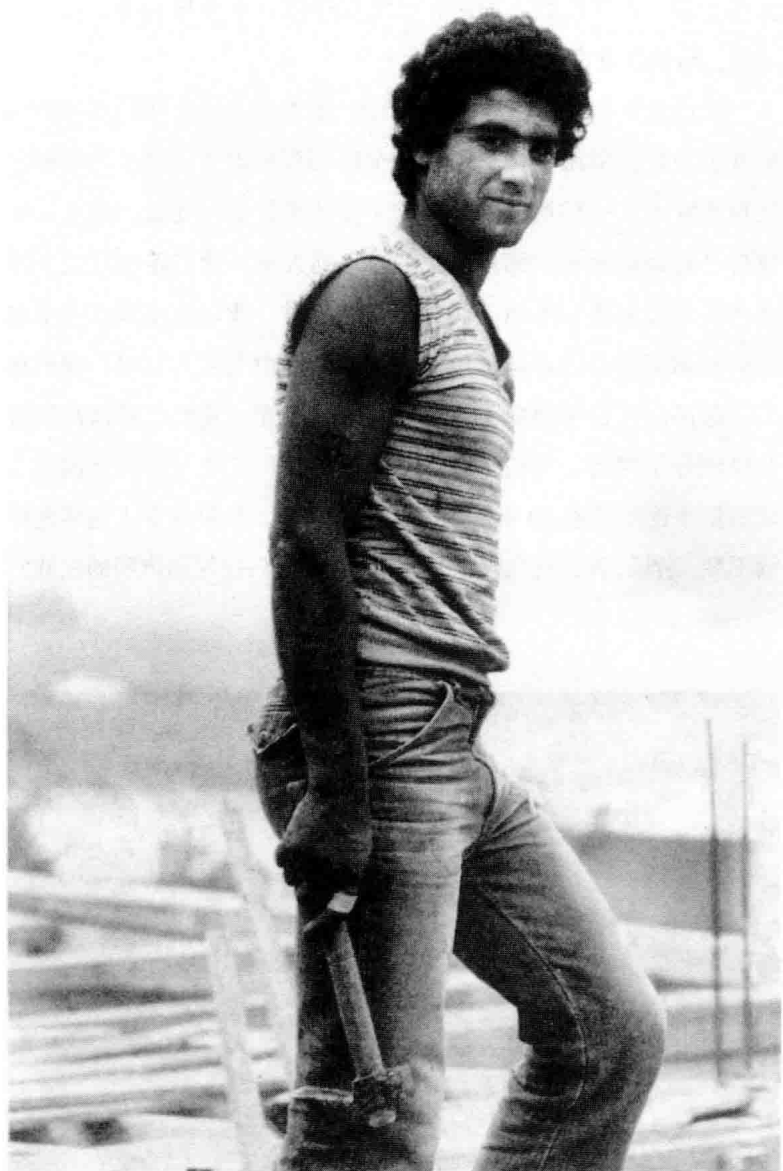
的居民和知识分子互相了解，百万富翁和穷学生互相了解，医生和病人、工人和银行家互相了解。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他设定了——我不会说他完全清楚表达了——巴勒斯坦的概念，这正是我们很多人一直在为之努力的目标。历史上，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受到犹太民族主义的对抗并为之击败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幸，这就使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一直处于类似永恒的“大拒绝”^[43]中——拒绝的政策，而阿拉法特指挥者的影响力则把这阴郁和失望的残余变成了一个无宗派社会的概念——希望的政策。中东地区还没有任何组织的领导人如此明确地倡议过，这样一个非宗教但又真正解放的概念：巴勒斯坦可以成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分享的家园，没有一方拥

有高于另一方的特权。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这样，仿佛如此悲惨地卷入挫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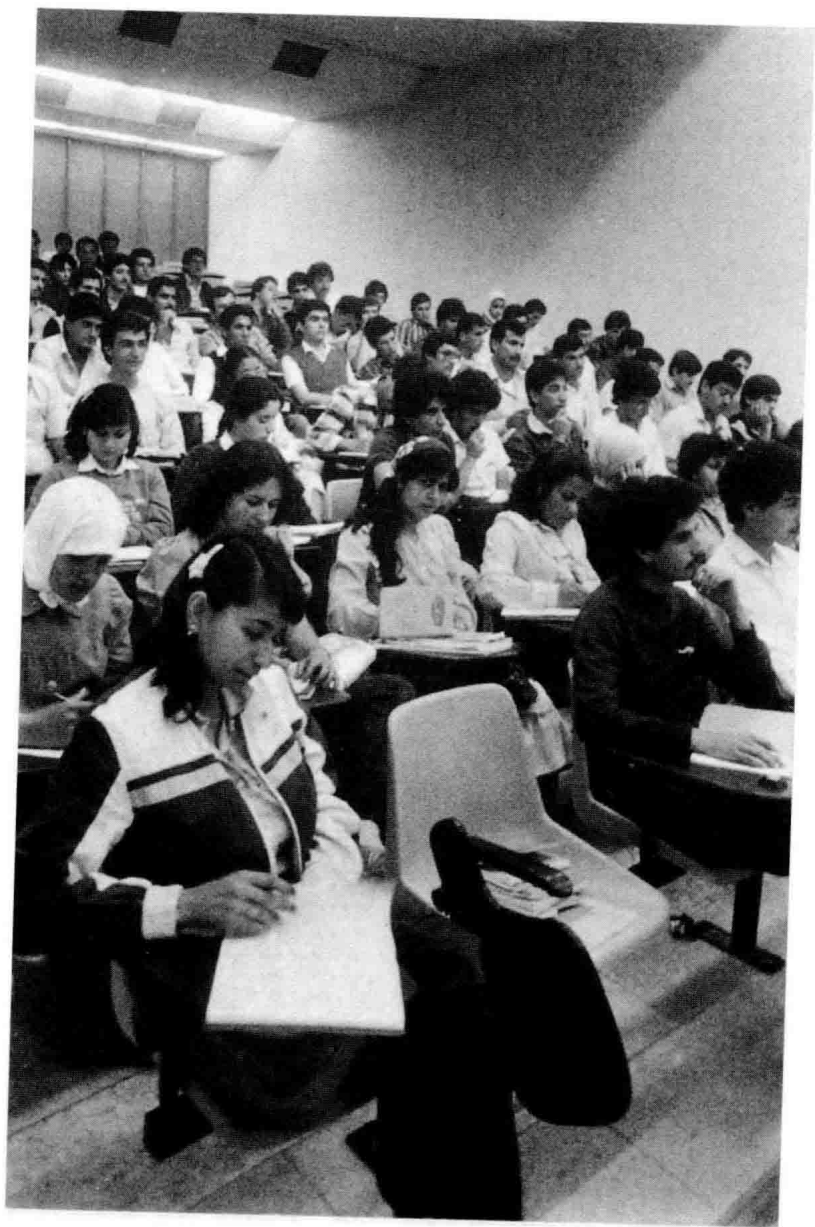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暴力和错综复杂的自我防御接管了一切。宗派主义和国家安全心理统治了一切。马龙派教徒想和犹太人一样拥有一个国家；什叶派教徒想要统治他人，就像自己曾经被人统治那样；很多以色列人说，他们希望犹太人能够永恒地统治整个圣地。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距离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却丝毫没有接近。我们中太多人觉得，我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来换取陈述说明和媒体曝光。我们变得以劫机者和恐怖分子闻名，我们自夸的“武装斗争”让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室里争论了整整10年，出席者越来越少，结果却令人遗憾地持续不变。所以，我们现在仅仅是一个发表宣言、决议和声明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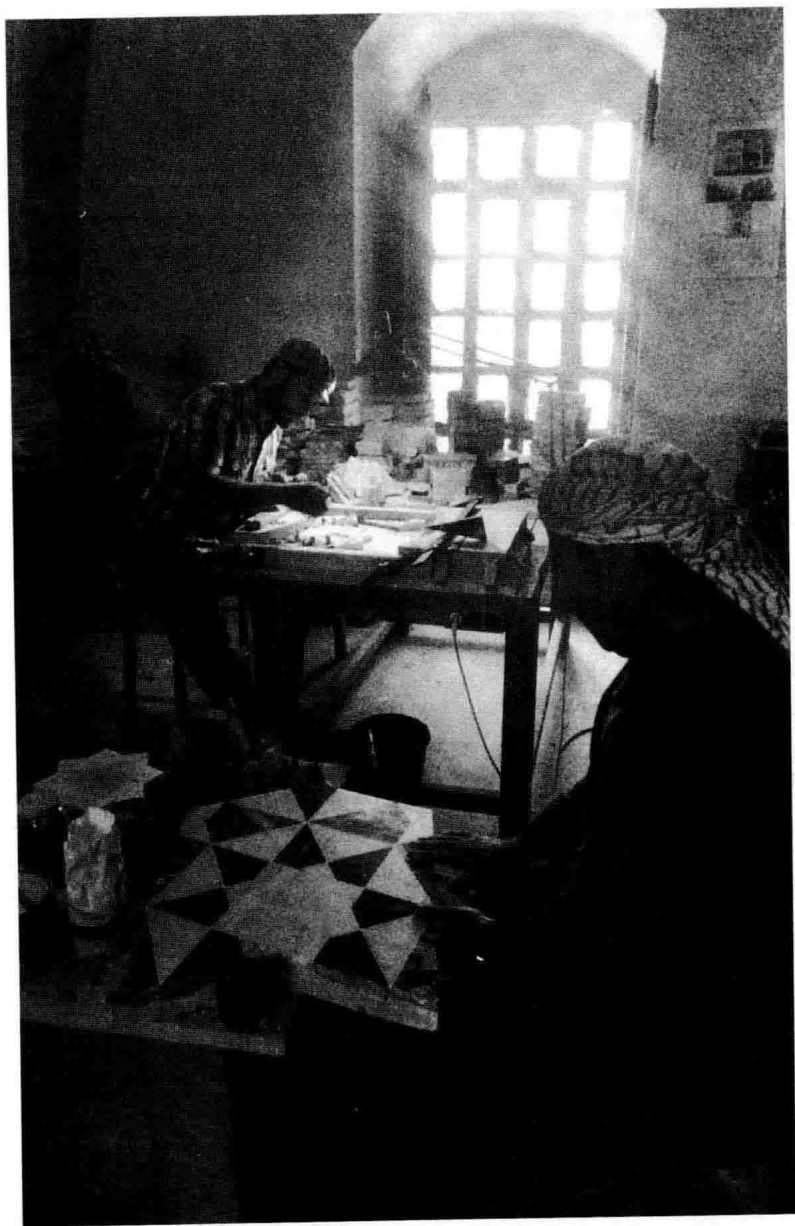
> 纽约，1983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日，几乎空荡荡的房间。



> 提尔，黎巴嫩南部，1983年。正在建造一栋房子，拉希戴难民营。帐篷变成了棚屋，棚屋变成了真正的房子。破坏之后是重建，离散变成了融合。



> 比尔泽特大学^[44]，1984年。



> 耶路撒冷，1984年。奥马尔清真寺，修复工作，镶嵌。

所以，我们只能成为亲切友善的国际舆论的囚犯，任其告知我们，是的，我们应当拥有自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依赖别人，仍然需要继续等待直到我们最终得到自决？我们自己、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以及我们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朋友们，从我们身上索要的代价已经太高，让我们用妥协、耐心、改变方向，以及有些人会说的，腐败、迁就和投降来进行偿还。很多人问，我们当前混杂的姿态——既不能制造和平也不能挑起战争——能否被净化，回复成黎巴嫩南部什叶派或者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游击队员（mujahidin）所采取的方法。

我想到了回复过去的形态。我们并不想要一个阿亚图拉^[45]的统治，也不想要一个无情理论家的统治。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说明我们的不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使用和过去一样的办法来看待自己，那时我们把自己视作早期成功抵抗运动的成果，如果不是模仿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不难认为我们与阿尔及利亚人或古巴人有些相像。如今，这些模式不再真正适合我们，而我们也至今没有想出自己的模式。对于那些把我们捆绑为一个民族的复杂且十分混杂的情形，我们没有进行完全的评估。始终没有这样的时间。身上的压力巨大，我们的任务空前。而且这项工作不同于修理汽车或者实施调查，它没有清晰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

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身上所拥有的，使我们成为一个勤劳民族的各种力量，而不要依赖于历史或社会之外的某个阿基米德的魔法定理。无论我们的生活是在巴勒斯坦境内还是流离失所，我们都不缺乏冒险的传奇和渴望的激情。其次，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年轻人，由于他们出生

在 1948 年之后，那时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无论多么奇怪，他们总是站在新与旧、阿拉伯和非阿拉伯、传统与新奇相交的某一点上。于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民族身份和历史中的哪些部分应当被保留，哪些应当被抛弃，以利于一个更加可行的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这样的认识能否积极且创造性地连接我们的过去和将来？我们将来会不会宿命式地让世俗和宗教的律条来指引我们的历史？

译注

[1] 埃尔比雷 (El Bireh)，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镇。

[2] 萨法德 (Safad)，即采法特 (Zefat)，以色列北部城市，传说中由诺亚之子建立，实际上该城建立于罗马时代。

[3] 圣公会 (Anglican)，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与路德宗、归正宗合称新教三大主流教派。该宗在英格兰为国教，被称为英国国教会。16 世纪宗教改革时期，英王亨利八世因与罗马教廷的矛盾，而禁止英格兰教会向教廷纳岁贡，后又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格兰教会不再受制于教皇而以国王为英格兰教会最高元首，但在教义、教规上仍保持天主教传统，只在崇拜习惯上有所改革。

[4] 菲利普·J·鲍尔登斯珀杰，法国人，出生于 1856 年。他的《永恒不变的东方》发表于 1913 年，全名是 *The Immovable East: Studies of the People and Customs of Palestine*，书中配有卷首插画和 24 页插图。

[5] 希尔马·格兰奎斯特 (Hilma Granquist, 1890—1972)，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 (Edvard Westermarck) 的学生。1925 至 1931 年间，她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艾尔塔斯村做研究，出版过的关于巴勒斯坦的作品包括《阿拉伯的儿童问题》(*Child Problems among the Arab*)、《一个巴勒斯坦穆罕默德村庄的研究》(*Studies in a Muhammadan Village*)。

in Palestine)、《一个巴勒斯坦村庄的婚姻条件》(*Marriage Conditions in a Palestinian Village*)、《一个巴勒斯坦村庄的肖像》(*Portrait of a Palestinian Village*)等。

[6] 陶菲克·卡南(Tawfik Canaan, 1882—1964), 巴勒斯坦收藏家、医生, 收藏了1400多件巴勒斯坦护身符, 并用德语写成了4卷系统目录。

[7] 萨义德·希马德(Said Himadeh), 黎巴嫩学者, 1991年去世。他所著的《巴勒斯坦经济构成》(*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Palestine*)于1938年由贝鲁特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8] 伊莱亚·朱雷克(Elia Zureik), 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中东政治社会, 尤其是巴以冲突, 曾经发表过《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和《巴勒斯坦难民及和平的进程》(*Palestinian Refugees and the Peace Process*)。

[9]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原本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城市的耶路撒冷被阿以双方的停火线由北向南切割为东、西两部分。由于停火线在以色列地图上是绿色的, 所以又称为“绿线”。

[10] 拉贾·舍哈德(Raja Shihadeh), 律师, 是位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权组织阿勒·哈克(Al-Haq)的创办者, 曾发表过很多关于以色列占领和人权方面的文章。

[11] 犹太社(Jewish Agency), 成立于1923年, 原先的名字是巴勒斯坦犹太社(Jewish Agency of Palestine), 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提倡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主要负责推动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 以及帮助犹太复国运动者们规划政策。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 更名为以色列犹太社(Jewish Agency of Israel)。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 犹太社中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 负责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12]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 《旧约》里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即古代以色列国和朱迪亚的所在地, 也被称为“以色列之地”(Land of Israel)。

[13] 阿莫斯·奥兹 (Amos Oz, 1939—), 以色列作家、小说家、记者、文学教授。自 1967 年以来, 他积极倡议用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 作品包括《在以色列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Israel*)、《以色列》(*Israel*)、《巴勒斯坦和平》(*Palestine and Peace*)、《我的迈克尔》(*My Michael*)、《黑箱子》(*Black Box*) 等。

[14] 大卫·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1886—1973), 以色列第一任政府总理。1948 年 5 月 14 日, 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仪式, 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 宣告犹太国家——以色列的诞生。本-古里安于 1948—1953 年、1955—1963 年期间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 后人称他为“现代以色列之父”。

[15] 迈克尔·巴佐哈 (Michael Bar-Zohar, 1938—), 作家, 作品包括本-古里安的官方传记《本-古里安: 武装的先知》(*Ben-Gurion: the Armed Prophet*)。

[16] 《不在地主财产法》(*Absentee Property Law*), 在阿拉伯语中称为 Qanoon Elhader/Gayeb, 该法令于 1950 年 3 月实行。《不在地主财产法》把任何因 1948 年巴以战争而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归类为“不在者”(absentee), 他们的土地由以色列保管人(custodian)管理。该法令还规定, 保管人可以把土地出售给以色列发展局(Development Authority)。同样的法律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 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实行, 被剥夺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被占领土, 这些根据《不在地主财产法》得来的土地大多被用于建造以色列军事基地或犹太人定居点。

[17] 清教徒(Puritan), 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16 世纪出现于英国。该派主张清除国教会所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度, 简化仪式, 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后来在国内遭受迫害, 曾大量逃亡到北美建立殖民地。

[18] 琼·彼得斯 (Joan Peters), 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国际时事评论员, 曾经是白宫的中东事务顾问。她在 1985 年出版了充满争议的书, 《来自久远时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犹太人的起源》(*From Time Immemorial: The Origins of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over Palestine*), 该书荣获了美国国家犹太人图书奖。

[19] 萨布里·吉里斯 (Sabri Jiryis, 1938—), 巴勒斯坦律师、学者。著有《以色列的阿拉伯人》(*Arab in Israel*)等。他曾经在以色列工作, 1970年前往贝鲁特, 成为巴勒斯坦研究学会 (Institute for Palestinian Studies) 的主任。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 吉里斯前往尼科西亚 (Nicosia, 塞浦路斯的首都) 继续他的研究。1995年, 吉里斯回到加利利。

[20] 喀土穆 (Khartoum), 苏丹的首都。1967年8月,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第四次首脑会议在喀土穆召开, 会议通过了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

[21] 萨米·阿尔-卡森姆 (Samih al-Qassem, 1939—), 巴勒斯坦著名诗人, 也写作 Samih al-Qasim。1939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加利利, 曾发表过多部诗集, 很多被翻译成英语, 还有不少被编成歌曲, 他同时也是以色列阿拉伯语报纸《全体阿拉伯人》(*Kul al-Arab*) 的主编。

[22] 法瓦兹·图尔基 (Fawaz Turki), 巴勒斯坦作家, 为众多期刊撰稿并教授写作, 定居在美国华盛顿, 是第一位用英语撰写难民营经历回忆录的巴勒斯坦作家, 作品包括《被剥夺的人: 一个巴勒斯坦离散者的日记》(*The Disinherited: Journal of a Palestinian Exile*, 1972)、《离散者的灵魂: 一个巴勒斯坦革命者的一生》(*Soul in Exile: Lives of a Palestinian Revolutionary*, 1988)、《离散者的回归》(*Exile's Return*, 1994)等。

[23] 摩西·达扬 (Moshe Dayan, 1915—1981), 以色列军方领导人和政治家, 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第四任长官 (1953—1958), 他戴着眼罩的样子成为新以色列国的战斗形象。

[24] 拉斐尔·艾坦 (Rafael Eytan), 前以色列国防军长官, 曾把巴勒斯坦人称作“玻璃罐里的蟑螂”。

[25] 《新消息报》(*Yedioth Aharonot*), 以色列主要报纸之一, 创刊于1939年, 是希伯来文的晚报, 发行量30万份。

[26] 迈尔·卡亨 (Meir Kahane, 1932—1990), 美国东正教拉比, 政治运动家, 后来成为以色列议会成员。卡亨在美国创立了犹太人保护联盟 (Jewish Defense League), 一个犹太极端组织, 后来被美国政府宣布为

非法组织。卡亨还在以色列成立了一个极右政党保卫犹太人联盟(Kach),该党后来被以色列政府宣布为种族主义组织,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卡亨的观点被称为卡亨主义,他认为巴勒斯坦人正在试图对以色列人进行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因此他建议人口迁徙,甚至强制放逐,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逐出以色列,包括约旦河西岸。他认为,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是解决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1990年,迈尔·卡亨在美国纽约被一名阿拉伯恐怖组织成员开枪射杀。

[27]《晚报》(Maariv),以色列的一份希伯来语晚报,创刊于1948年,发行量15万份。该报被认为基本代表以色列犹太人的普遍观点,并且因为其情绪化的新闻标题而经常被外国媒体引用。

[28]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1900—1989),即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是一位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这次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他被许多什叶派穆斯林看作精神领袖,从推翻国王开始统治伊朗,直到1989年去世。霍梅尼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被评为1979年《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29]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等时戴的圆顶小帽。

[30]珍妮特·阿布-卢格德(Janet Abu-Lughod),社会学和历史学教授,曾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开罗大学等,也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口和住房专家,曾经与社会学家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结婚,但两人后来离异。

[31]乡村联盟(Village League),由以色列支持的巴勒斯坦政党组织。最早的乡村联盟在1978年成立于希布伦,并在其后3年中一直受到以色列在资金和武器上的资助。以色列希望乡村联盟能够取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领导组织,但是由于乡村联盟被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视为卖国贼,该计划以失败告终。

[32]巴萨姆·阿尔-沙喀(Bassam al-Shaka'a),纳布卢斯前任市长,在一次由犹太恐怖分子制造的汽车炸弹爆炸中失去了双腿。

[33] 乔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国作家, 积极投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写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杂文和小说。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共四卷, 通过主人公格列佛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巫人岛、贤马国等虚构国度的离奇旅行和种种遭遇, 集中反映 18 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讽刺批判英国的内外政策, 歌颂历代进步人士的正义斗争。作品想象力丰富, 构思奇特, 语言精练。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 在世界各地几乎家喻户晓。

[34] 作者在此使用的是 diaspora, 原意专指犹太人在外的散居。公元前 586 年, 犹太人被巴比伦人从朱迪亚地区驱赶走; 公元 135 年又被罗马帝国从耶路撒冷赶走。

[35] 塞得港 (Port Said)。埃及东北部城市, 临地中海, 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北部入口处。该市于 1859 年由苏伊士运河开凿者们建起来, 曾是一个重要的装卸煤炭的港口。

[36] 四方援助救济社 (CARE),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在超过 72 个国家有援助项目, 共有 12000 多名员工。

[37] 移民研究中心 (CMS), 非政府组织, 成立于 1964 年, 总部在纽约, 主旨是推动国际移民和难民流动的多学科研究。

[38] 作者指的是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名诗《罐子轶事》(*Anecdote of the Jar*), 该诗巧妙地表达了诗人关于想象力和艺术能够创造秩序的观点。罐子在诗中象征诗人的想象力或艺术, 而荒野则象征现代世界的混乱。诗中说道, 当罐子被“安放在田纳西一座山坡上”, 四周的“荒野向罐子隆起, 趴在周围, 不再撒野”。

[39] 奥维德 (Ovid, 公元前 43 年—公元 18 年), 古罗马诗人, 生于罗马附近的苏尔莫, 卒于黑海边的托弥。年轻时在罗马学习修辞, 对诗歌充满兴趣。曾三次婚配, 第三个妻子出身名门, 使他有进入上层社会, 结交皇家诗人。公元 1 年发表《爱的艺术》, 描写爱的技巧, 传授引

诱及私通之术，与奥古斯都推行的道德改革政策发生冲突。公元8年被流放到托弥，10年后忧郁而死。

[40] 但丁 (Dante, 1265—1321)，意大利诗人，代表作《神曲》。但丁曾担任佛罗伦萨市最高行政会议行政官。他坚决维护共和政权，反对教皇干涉内政。1302年，但丁被以“贪污、反对教皇”的罪名革除公职，被判处终身流放。但丁度过了近20年的流放生活，1315年，他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41] 雨果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1848年六月革命后，雨果逐渐走向共和的立场，后来成为路易·拿破仑的反对派。1851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被迫流亡国外，达19年之久。

[42] 乔伊斯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尤利西斯》等。1902年大学毕业后，迫于经济压力及为摆脱家庭、宗教和自身狭隘环境的束缚，自行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过着流离的生活，广泛地吸取欧洲大陆和世界文化的精华。

[43] “大拒绝”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的观点，是为他的革命新理论设计的模式。

[44] 比尔泽特大学 (Bir Zeit University)，位于巴勒斯坦拉马拉以北7公里约旦河西岸的比尔泽特，是巴勒斯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924年。

[45] 阿亚图拉，即对伊斯兰什叶派领袖的称呼。



Chapter 4

PAST
AND FUTURE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 耶路撒冷附近的撒母耳圣堂^[1]，1979年。一位牧师远眺拉马拉。

拉菲克·哈拉比，巴勒斯坦—德鲁兹—以色列人，以色列电台和电视台记者，负责报道约旦河西岸。1982年，他写了一本记录他作为阿拉伯以色列人经历的书，尤其是他作为一名记者在被占领土工作的遭遇。哈拉比因为报道了不利于以色列的新闻而遭到解雇，作为一个处于劣势和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的一员，他的职务和观点的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是，那并不是他所写的《约旦河西岸故事》（*The West Bank Story*）如此古怪有趣的原因。哈拉比和大部分评论此书的西方批评家都强调，哈拉比是从一个忠实的以色列人的视角来写作此书的：他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赞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且对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程的巅峰这样的概念，没有什么依恋。然而尽管充满着真实的以色列爱国情感，他的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当然包括每一个重要的章节，都见证了加诸他和他的民族身上的歧视。在他报道的内容中——无论是作为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哈拉比总是被犹太人怀疑，因为是异族人，所以是危险的；还是他在希伯来学校中接受的教育，都完全忽略了他自己民族的历史；又或者是自从1967年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任何地方，都形成了一整套惩罚、歧视和残暴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都没有向读者提供任何理由，去理解为什么哈拉比反复说他坚信以色列对待非犹太人公民根本上的公正，他还不带任何嘲讽地说到，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公民“已经开始感激民主的好处，并且意识到自由生活的含义”。他接着说，犹太人国家中的非犹太人至多是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要么哈拉比过于被蒙蔽，以至于无法认真观察他自己的证据，而事实上他正是因为这些证据而遭到解雇；要么他就是在玩

某个非常精心准备的语言游戏,以至于令我都不能理解。结果就是,这本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轨迹。书里既有对他经历的描述,全都非常苦闷和绝望,也有试图让人安心的碎片式的评论,以及对于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的基本乐观的解释;在这部分文字中,哈拉比似乎正在解释一个和他实际上描述的完全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他说起过自己是一个以色列爱国分子,然后又承认说因为他的遭遇,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以色列社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感谢以色列电视台消除了他“在那一方面上的偏见”。

当我第一次看到吉恩·莫尔拍摄的这张非凡照片——一个年长的巴勒斯坦村民戴着一副镜片破了一边的眼镜时,我想到了哈拉比。虽然破碎的镜片显得相当突出,但这张照片在整体上有一



> 拉马拉, 1984年。

种压抑不住的快乐。我对自己说，这正象征了我们生活中不会消失的一些双重性——难民和恐怖分子，受难者和加害人，以及其他。然而，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对这种想法背后的观念感到不满。如果你诚实地观察这幅照片，你看不到任何暗示这个男人痛苦和虚弱的东西：他拥有一张强壮和文雅的脸；他微笑的表情明显真实（即便其中带着一点儿渴望）；他流露出一种友好和适度自信的态度，十分吸引人。那个瑕疵是在镜片上的，而非在他身上；他的另一只眼睛显得十分好用，即便他的视线有一点儿模糊，他仍然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所有眼前可见的东西。

这张照片告诉我们的，再简单不过的是，这个男人对待生活的矛盾态度。毕竟，他答应在不摘下或者修好眼镜的情况下拍摄这张照片。他已经适应，并且显得相对满意，尽管他的儿子正处于不幸。我看着他便感到心烦，他看起来好似找到了一种愉快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解决。我看到一边的镜片是清晰的，而另一边则是绝望地破损了。无可否认，他并不需要非常依赖那片破碎的镜片，因为那片完好的镜片似乎已经足够，但是不管他看得多么清晰（或者被人们所看到），他的视线总是会受到一些妨碍，而对于那些看他的人来说也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干扰。完好的东西永远不会完好到可以消除坏的东西，反之亦然。所以每当你重新观察这张照片时，这一古怪地达成平衡的不平衡，总是有什么地方烦扰到你。这种效果和哈拉比书中不平衡的文字非常相似。人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意识上的不平衡，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我们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我们尚未把自己历史的狂野和混乱，与我们早已公开宣称并且显然连贯的政治、社会、文化个性协调一致。

我们对解放感兴趣吗？我们想要独立吗？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伟大篇章能够为我们未来的进程制定规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过去仍然残破、耻辱和未被同化，部分是因为我们忍受着被驱散的苦难，却没有被迫（或者没有能够）努力改变我们的境况。我们没有关于巴勒斯坦文化、历史、社会的支配性的理论；我们也不能依靠一个核心的形象（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国红军长征）；也没有适合我们的彻底一致的论述，而且我也怀疑，即便此刻有人能够形成这样的论述，我们是否还能适合它。遍布在我们中的混杂空间，包含着却不能理解我们的过去；象征着没有整体目的的建造，围绕着一片没有标明，而且只部分进行过测量的领域。没有中心，没有主旋律。

也许我只是在描述我自己不能连贯地、有序地、按逻辑地整理事物，或许我在哈拉比的书中和那戴着破碎眼镜的老人身上，所洞察到的无法解决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并不是他们的。我在远方写作，我并没有经历过创伤；如果我经历过，或许就不难找到一种直接和简单的叙述，来讲述我们的历史故事。当我情不自禁地觉得，巴勒斯坦人遭遇的一切都直接来自一处原始的创伤，我就能看到一种模式无情地显露出来，就像是任何其他有关不幸的连续故事那样，互相缠绕着，并且可以叙述。我发现，如果你抓住间隙出现的所有证据——另一场屠杀，又一次背叛，再一场破坏性的失败——你就能够轻易构造出一个按照逻辑展开的反对我们的阴谋计划。就像是所有妄想狂式的构建一样，如果“普通的”世界能够合作，这个叙述也能搭建成一个完整的事物（“能够”是一个条件性的词语）。但是，我们的叙述基本上没有什么官方或公认的地位；几乎没有人给过我们甚至是拥有叙述的特权，更不用

说去推广我们的叙述；作为丧失公权的人，我们总是如此被审查和阻断，以至于我们似乎只能偶然地，把我们的讯息传递到那个漠不关心的外部世界。无论如何，我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妄想狂式的观点。

然而，某些事情对我而言的确非常明显。其一，历史上，我们一直被视作一个本质上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种群，低一等的和受制于经典帝国主义的种族。根据同一条原则，我们被流放、扰乱和剥夺：巴勒斯坦人不是一个凝聚一体的民族团体。（卡纳法尼最悲惨的故事之一《悲伤柑橘的土地》，讲述了一个雅法家庭的游历，其中的辛酸在我们的文学中几乎无可匹敌。）所以，是有可能激进



> 纳布卢斯，1979年。市中心的墓地。

地认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外，对着我们自己所不能提供的权威中心。这就好像是我们把外部权威的观点内部化，并且参与到它的计划中。有时这个焦点是联合国；其他时候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这个或那个阿拉伯国家或领导人；再其他的时候，我们被一个解放的概念聚集在一起；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仍在以色列势力的控制下。

我们扮演起偏离中心的角色。巴勒斯坦人总是处于迁徙中：即便当新的边境被穿越，新的机会被制造，新的现实被创立，巴勒斯坦人的手里总是拿着装有财产的手提箱或包裹，每个家庭都撤离了国土，把土地留给他人。人们甚至可以争论说，我们过于流动，有太强的适应性。这是否就是 1948 年我们没有阻止自己被驱逐的原因？最终，我们无法赞扬自己为恐怖所迫而离开家园，却没有立刻反抗，进行组织和战斗；现在当然也不能再辩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不可撤销的损失会导致我们的离开，尤其是这个借口自 1967 年以来，就一直被用来辩护第二次失去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的恐慌战斗。我的姑姑纳比哈以前经常嘀咕 50 年代和 60 年代，在拉马拉和耶路撒冷建造的那些大房子：她会说，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就要失去这些房子吗？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房子造得如此巨大和招摇？为什么他们没有事先为后来的困难做些准备？她认为，我们还没有被足够地动员起来，不够投入也不够认真，我们没有拿出足够的决心来夺回我们原先的家园，不然我们所使用的力量会比“他们的”更加顽强。

第二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犹太复国运动和美国之间的联盟最终导致了我们的驱逐被剥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伊利·桑巴在他最近发表的研究《巴勒斯坦 1948 年：驱逐》(*Palestine*



> 1967年6月，以色列官方释放巴勒斯坦的平民。

1948: *L'Expulsion*) 中说，这种联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他说，当本-古里安加入转向美国的潮流时，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像桑巴阐明的那样，毫无疑问，在一个偏远且有敌意的区域，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战后社会的欲望，对于美国的政策规划者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他们来说，从起源 (*ab origine*) 的神话般诞生，到后来令人吃惊的富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就一直是合法的。而犹太复国运动者和美国的政治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深远而强烈，令我深深震惊，就像桑巴形容的那样，他们通过假设来判定这片土地是空白的，然后摧毁土地上的土生居民。在美国的头脑中，以色列处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地位，如此有特权以至于成为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这本《美国脑中的以色列》



> 艾伦比桥^[2]，1967年。六月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n*), 用一种田园诗般的形式表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发生在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直接后果和具体的掠夺。就好像在不知名的原住民撤离过程中, 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场所, 直到美国人经过认真考虑, 决定让更加值得嘉奖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来充满这个地方。任何希望理解他或她今天处境中特殊痛苦的巴勒斯坦人, 都必须考虑到美国人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 and 一项事业的几乎完全官方的反对。一个接一个美国的政治、文化或宗教人物, 无止境地声明他或她对以色列的忠诚, 同时美国政府支付天文数字的资金, 援助以色列, 并且不断重复地发动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与加诸我们身上的同样众多的暴行, 折磨、杀戮、侵略, 同时发生; 还有最重要的, 禁止我们的政治身份, 并且对我们的民族进行系统性的剥夺; 你简直不能想象, 对于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说, 看见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直接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暴行下遭受痛苦, 而且我们受苦的事实, 以及我们事业的价值, 几乎完全被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公共关系工具 (或者, 就像用希伯来语来委婉地表示, 为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 所否定。我之所以说“几乎完全”, 是因为自从 1982 年以来, 美国主要民意调查机构为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 (主要是福阿德·莫拉比^[3]和伊莱亚·朱雷克) 所进行的一系列公众民意调查, 结论性地显示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与美国的民众意见相当不一致, 民众意见事实上更加赞成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 而且对于以色列政策的赞成, 也基本上比人们通常假设的要低得多。但是我们无法避开以色列和美国政策之间的可怕一致, 尤其是在最近 10 年间; 以色列和美国在多个方面至今仍然维持联盟, 使得美国官方成为

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每一个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者都不会否认。

第三个事实是，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没有任何方法、途径，或者观点，能够让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独立于或者在很小的程度上超越，那些把我们压制到如今处境的事件和因素。我可以讲得更加直率。对于我们而言，再也没有比被无可避免地视作犹太人的敌人更加糟糕的不幸。我认为没有更加糟糕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命运了，完全没有：没有更糟糕的，没有。最近有这么多关于欧洲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讨论，我非常明白欧洲犹太人被毁灭的事实；这是一桩令我憎恨的事情，但我很难单独来考虑它；人们总是在以色列和犹太人被屠杀之间建立起联系，一方应当如何对另一方做出赔偿。我要说的是，一个时代之后，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正在把我们变成受害者，不过并没有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那样可怕的巨大规模和应受天谴的恐怖。从大屠杀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像是操场上玩耍的孩子那样无足轻重；然而——在这个螺旋中还有一个盘旋——即便是在玩耍，我们也不像玩耍的孩子那样无足轻重，我们不能享受自己，或者不能被简单地看作那样。仅仅由于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每个操场就被视为一处“培养恐怖分子的场所”，每个消遣娱乐都被看成一项“破坏以色列的秘密计划”，就好像我们自己的毁灭不是一桩更加可能发生的大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怎么想或怎么行动，有害的或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总能被归到我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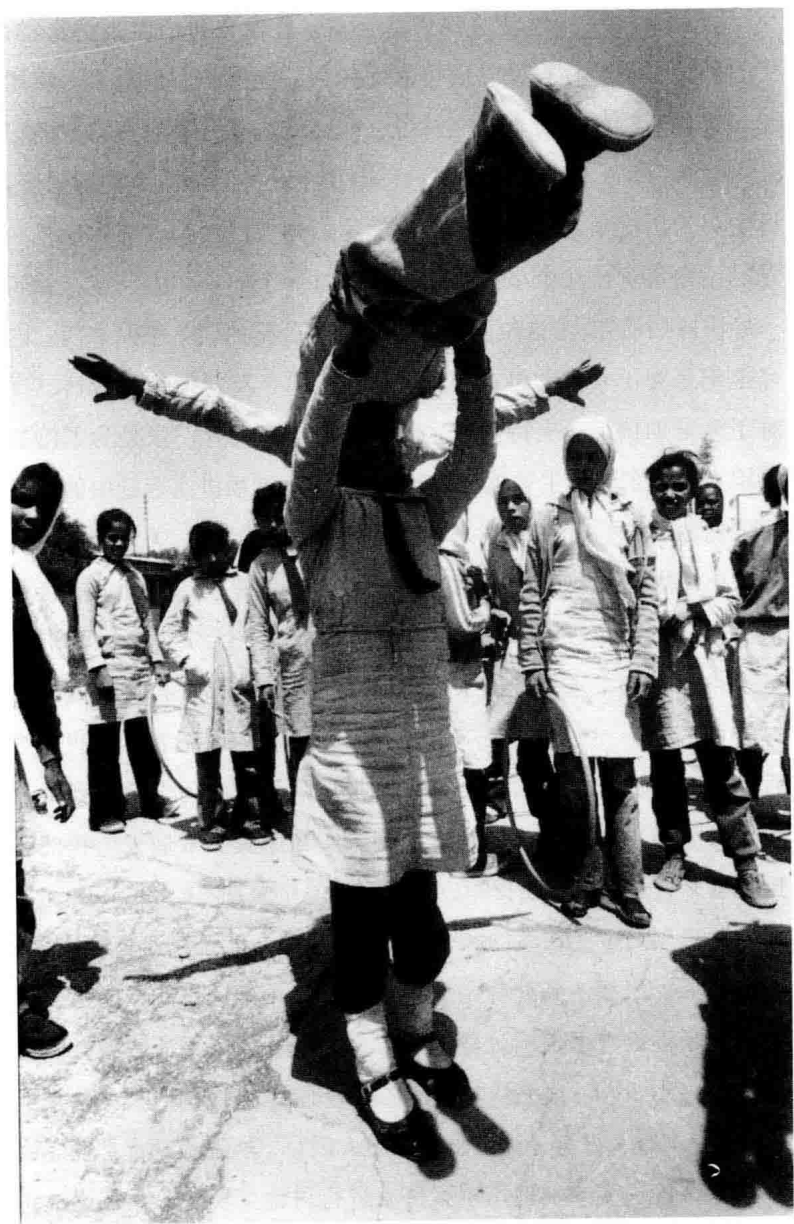
在我们与犹太复国运动者冲突历史的最近时刻，我们受害的总体概要并没有像具体的征兆、生动的细节，以及重要的枝节问题那样，让我感兴趣和着迷，我们对待生命的没有解答的态度成

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特征，因而这些表征、细节和枝节问题经常被我们忽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很轻易就能看到，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仍在继续，到达我们生活的每个小的角落，在任何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插入和建立敌人的存在。比如说，巴勒斯坦烹饪的主要菜肴已经成了以色列人食物的主要成分：塔布勒沙拉^[4]变成“基布兹^[5]沙拉”出现在一些饭店的菜单上。用希伯来语音译阿拉伯词语和名字的标准方式如今彻底统治了美国媒体，这让我异常愤怒。过去，阿拉伯语中的后音“h”会被翻译成英语的“h”。自从1982年以来，《纽约时报》等媒体把它改成了“kh”，这是希伯来语中发音最为接近的拼写。这样一来，黎巴嫩最大的难民营，埃纳尔希尔维难民营就从“Ein el-Hilwé”变成了“Ein el-Khilwé”。这是一个非故意的双关语，“Hilwé”的意思是“甜蜜的”，“Ein el-Hilwé”就是“甜蜜的春天”；而另一方面，“Ein el-Khilwé”的含义则类似于“一个空旷场所的春天”。在新的拼写中，我看到了对经常被夷为平地，但不经常重建的难民营中的大量坟墓的暗示，我也想到以色列的确已经清空了收容巴勒斯坦人的营地。相反，直到最近，阿拉伯语中的“kh”一直都被翻译成“kh”，相当于“Loch”中“ch”的发音。如今它也被惯例地改成了“h”，于是卡利姆·卡拉夫^[6]就从“Karim Khalaf”变成了“Karim Halaf”。无足轻重。

我们能够承受多少这样的无足轻重的恶意？阿卡和雅法毕竟都曾是巴勒斯坦的主要城市，有丰富的阿拉伯传统和很多与欧洲的联系。特雷弗-罗珀^[7]受封为戴克爵士^[8]，这是一个十字军骑士的头衔。我知道，这两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原住民，总是痛苦地怀念着他们的家园、年少时的消遣，和被他们遗留下来的家庭

生活及社区快乐。但是这些仍然存在，就像普鲁斯特说的那样，所有的记忆都会存在，它们可靠而耐久，能够不时地被人再次想起。普鲁斯特没有长寿到能够说，回忆变成了几乎完全官方的记录——像约翰·伯杰说的那样——与历史合并为一。我们都知道，历史只为历史学家而存在，历史学家们则被授命为权势和地位一方的论题负责。几个星期以前，我路过一个同事的办公室，看到一场讲座的通知。（这位同事定期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张贴东西。内容全都是为了有益的事业——反种族隔离、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干涉尼加拉瓜、支持女权主义——却从来没有一张是为了巴勒斯坦人。中东这个主题被礼貌地回避了。）这场讲座标题中的一个词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十字军帝国的阿卡^[9]：关于黎凡特一个地中海城市的介绍”。当然，我最先看到的是阿卡这个词。接下来发生的正如我所预料，太过郁闷而令我几乎无法言表：演讲者是个以色列人，来自希伯来大学。对于这张通知，我只能做出唯一的而且是不顾一切的反应，我观察四周确定没人能看到我，然后取下了那张小小的海报，这张海报从阿拉伯的阿卡跳跃到黎凡特，又到地中海时代，再到以色列，实在令我非常恼火。我把它折叠起来，然后放进手提箱，带在身边6个星期。

阿里尔·沙龙在纽约状告《时代》（*Time*）周刊诽谤案^[10]期间和之后，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沙龙究竟无辜还是有罪的各类观点，这场诉讼对于美国诽谤法的意义，以及裁决象征犹太人的良心等等。比如说，裁决结果宣布之后的那天，《纽约时报》刊登了4篇评论文章，没有一篇由巴勒斯坦人撰写，所有文章都把沙龙当作又一个普通人或一桩民事案件来进行讨论。没有一个评论员想到，这场审判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不仅关系到民事诉讼的细微要



> 杰赖什难民营，靠近伊尔比德，1983年。为参观者进行的体操表演。

点，或是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而且也关系到巴勒斯坦人的整体经历，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机会下，当人们需要从“恐怖分子”和“狂热宗教徒”的行列中得到一些安慰，一个阿拉伯人（对于人们而言，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就会被牵出来说点儿什么——不可避免地用一种显得开明或者温和的声音，完全没有威胁，而且一律不涉及我们的现实情况。

我认为，这些对我们离散生活的小小冒犯都是一致的。以色列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地方，还不如说是一股势力，它那不可估计的力量和目的，把差异和矛盾编织成地毯上的同一个图案。也许这地毯是只属于我的，也许完全是我的妄想让我相信，



> 阿卡，1979年。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从旧港口的城墙上跳下，潜入海中。

即使当我们听到人们把恐怖主义当作一个全球现象进行讨论，实际上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讨论的字里行间总是暗含着巴勒斯坦人的参与，而以色列则不知不觉地成了正义的一方。想一想华盛顿的乔纳森学院，那是为了纪念乔纳森·内塔尼亚胡^[11]，他是恩德培的英雄，是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以色列斗士。

相似地，当纽伦堡^[12]被引用为检验战争行为——比如越南战争——是否正当的标准时，只要涉及以色列，人们就会很快把它收回。有一位曾经密切参与过纽伦堡审判的同事，在1982年侵略期间，突然出乎意料地打电话给我。他说，一个调查团已经设立，将专门调查以色列的战争罪行，而他即将加入其中；他拒绝透露更多。与此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特赦组织^[13]的创始人，肖恩·麦克布莱德^[14]正偕同一群知名法理学家进行调查；他们所



著的《以色列在黎巴嫩》(*Israd in Lebanon*)一书在英国出版,但却从未在美国出版。我的同事此后就失踪了,只在纪念纽伦堡审判的场合和仪式上重新出现。

我们没有法官席。我们是罪犯。我们根本不是受害人。阿拉伯的雅法顶多是一个来自遥远追忆的象征性打扰。我一直在说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存在,去迫使生活的杂乱无章,变成我们自己命运的连贯模式。仅仅从我的例子来看,我们至多能够按照另一个民族的模式来解读自己,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模式——尽管我们是它指定的敌人——我们只能成为它的效果、勘误和反例。每当我们试图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就成了他们演说中的混乱。



> 雅法, 1979年。从旧城瞥见新城。

毕竟，他们使用的是充满力量的语言，当他们的声明不断发出，尤其是在美国这个以色列最为依靠的国家，你意识到——我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异常危险。比如说，各种美国犹太组织的头头儿都拥有惊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有能力去伤害那些为巴勒斯坦人讲好话的人们的事业：包括瓦妮莎·雷德格雷夫^[15]、保罗·芬德利^[16]、皮特·麦克洛斯基^[17]，甚至查尔斯·珀西^[18]，以及太多不那么知名的人，无法在此一一列举。1985年2月25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19]的头脑报告说，目前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最支持以色列的国会”，他的意思是，以色列的任何目的都能在美国国会达成。顷刻间，70或80名参议员就能被动员起来，攻击政府或者总统，胆敢考虑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以换取现金，或者胆敢这样或那样批评以色列。1982年之后的几年中，比耐布里斯组织^[20]、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出版了三四本书，叙述并且百科全书式地记录了支持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顺便说一句，这种集体描述是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的，如今却由别人为我们做了。

另外，有一些重要的美国杂志，它们官方声明的政策是不发表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即使要发表也只能从犹太复国运动者的角度；其他的杂志则坚持，任何关于以色列的内容必须由犹太人，或知名的非犹太裔以色列支持者来写作。还有，美国国内的以色列游说者们和媒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敌意，但是这种敌意并没有阻止游说者们用支持以色列的材料来充斥媒体，用一种如同凶恶的校长批评学生没有遵守纪律的口吻，来攻击媒体竟敢刊登把巴勒斯坦人描写成一个民族而非恐怖分子报道，或者放肆地暗示以色列的铁腕政治毫不文明。（由于通常认为英国、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媒体都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他们也就完全不为这些媒体烦恼了。)

在所有这些义务警员式的宣传中，有某种孤注一掷的东西，它从追随者那里强求来的代价实在令人恐怖。如果你需要一个空想出来的警察去维护一项事业，这里面必然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我并不希望我们的事业也有任何不对劲儿，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任何巴勒斯坦人会有这样的希望。作为被主要受害人所加害的对象，如果我们这种次等的地位有任何安慰作用，那就是从我们相对低等的有利角度，我们看到对手们如何通过无比复杂的程序，去回避我们，或者假装我们不存在。比如说，某个政治哲学家争论说，以色列是犹太复国运动梦想的实现。按照这样的理论，一个简单的巴勒斯坦小贩的存在——非犹太人，明显是二等公民——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所以这个理论必须围以各种保护措施，把巴勒斯坦人隔绝在外，逼迫到边缘。为什么呢？因为巴勒斯坦人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如画的风光，但却也在提醒着人们，以色列国存在以前，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原住民；这个哲学家非但不承认以色列正在统治一个殖民人口，还要回过头去检查自己早期反对殖民主义的论点，从中发现殖民社会的优点，然后宣称，既然殖民主义是由一群拥有着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利的人来执行，那么殖民主义也不可能太过糟糕。然而，小贩仍然在街上辛勤工作，兜售器皿，继续着他的生活。这些争论没有影响他的生活。

或者再举例来看一下美国对被占领土上那些好斗的巴勒斯坦学生的态度。这些学生已经完全成为反对占领的斗争先锋，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锒铛入狱，房屋被毁，学校关闭。如果这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一定会有大量教师集会抗议，反对

侵害学术自由。然而除了一向无畏的少数人以外，实际发生的正与之相反。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以前一个来自以色列大学的东方学学者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访问，他同时也凑巧是被占领土的一名官员（似乎没有人为这样的巧合而感到困扰）。人们为他安排了一些小型的会面，为了某个我至今不明的原因，我也被邀请出席其中一次会面。虽然我几分钟之后就离开了，但是那些自由主义学者对他的尊重令我惊骇，因为这些学者对待类似的美国官员（当时越南战争还在继续）却是无可非议地充满了敌意。我的一位同事在会面中评论以色列“自由主义的”占领，我想他使用的是“奇迹”这个词语。他问到，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洞察力？

当然，从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时，依然不大可能让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兴趣去共同努力，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让其放松对书籍、杂志和课程的审查，或者废除每当某个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节日显得危害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时，就连续几个月关闭整所大学的政策。另外，以色列还实行一套实质上的种族隔绝体系；根据法律规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平等的地位，阿拉伯学生低人一等，也无法从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宣言请愿的签名人那里得到任何重视。就算是以色列和南非，或者以色列和第三世界中——从中南美到非洲，再到远东地区——几乎每一个受压制的右翼政权的勾结，都惯例性地被忽略，或被封锁消息。有一次，我问一位非常知名的学术界朋友，他在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不接受邀请到比尔泽特大学去做讲座。好像无须进行更多解释似的，他回答说，那份以比尔泽特名义发出的邀请，来自该大学中一个英国“朋友”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约瑟夫·尼达姆^[21]、



> 耶路撒冷，1984年。卖水的小贩。

迈克尔·阿提亚^[22]和雷蒙德·威廉斯^[23]等非常知名的学者),我的这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朋友说,这些人组成了一个阿拉伯阵线团体。我必须说,我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因为“阿拉伯阵线团体”这个词组的力量让我丧失了任何说服人的能力。

看看耶路撒冷伊斯兰学校的学生们辛勤努力,就能感到一些满足,他们对待《古兰经》的绝对关注——我是从一个非宗教的观点来讲的——抗衡着所有被用来让他们消失的老练方法。我绝不是指所谓的伊斯兰教复兴,目前所有对以色列的抵抗都被转变成伊斯兰教的复兴(就好像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没有和历史上任何其他游击队^[24]相同的反对占领的动机)。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人对本地的关注——关注他们的工作、家庭、老师和朋友——实际上是打碎关于美国和以色列势力天衣无缝的文字,以及永远完整的叙述的潜在突破。在工作上,我们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只能在不知名的地方做些零散小活,我们代表的是一种具体的力量,它漫布分散,即便是我们自己也不能轻易洞悉。但是它给我们的事业一种破碎的尊严。比如说,莫尔拍摄的一系列巴勒斯坦人工作学习的照片,表现出一种紧张和严肃,与照片本身的偶然和无故事性的本质并不一致。安曼巴喀难民营的裁缝;比尔泽特大学的一间化学实验室;两名学生在做实验,隔壁或许是一群正在上课的学生;安曼大学的诊所里,一名医生和一对母子。这些照片沉默但有力,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关注和留心的交流。莫尔的风格一目了然:他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正在自我维系生存,甚至也在实际处境让人力不从心的限制之外,重新展现自己,其迫切性惊人地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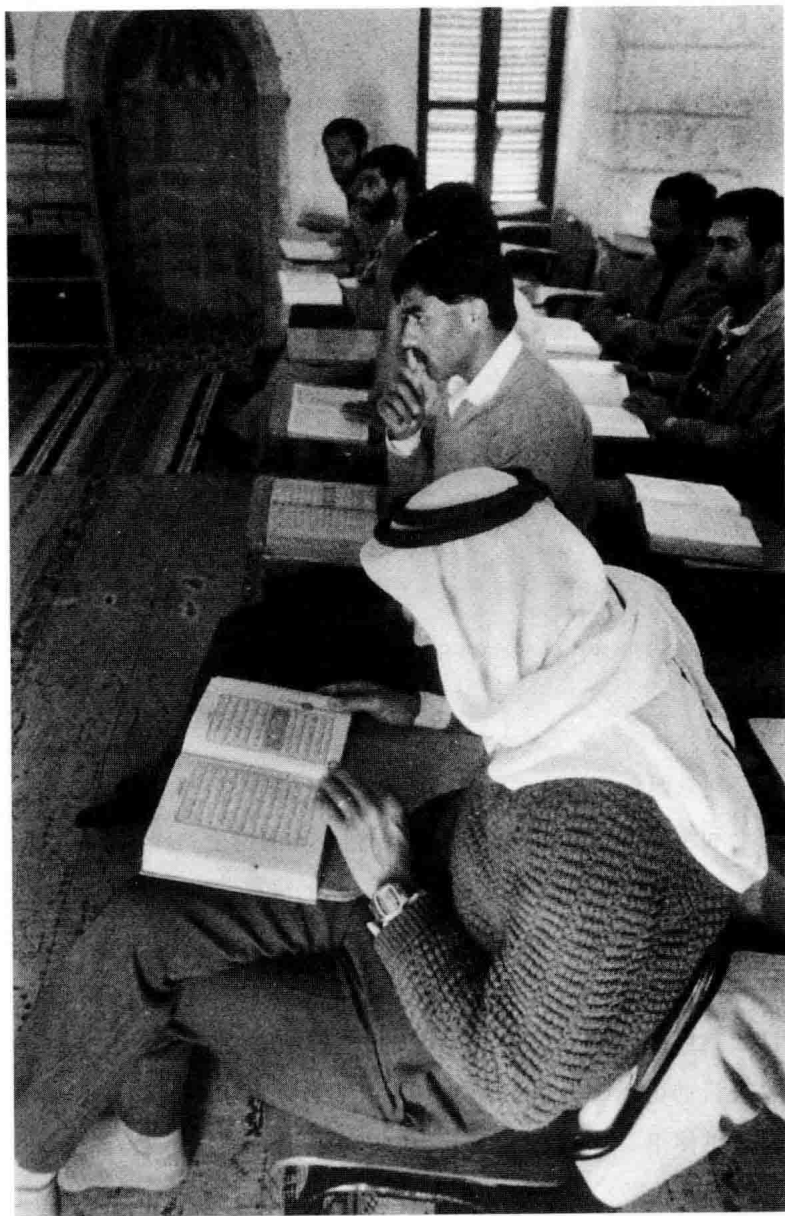
除了这两名年轻妇女佩戴的伊斯兰头巾以外,这些照片中没



> 比尔泽特，1984年。大学屋顶的平台上，两名学生在课间谈话。

有任何东西负载着让这些巴勒斯坦人——难民和巴勒斯坦的居民，工人和学生，医生和技术员——走到今天的历史。你在每一张照片中看到的，都是他或她在关注着自己的境况，解决自己的问题，产生出一种自身的动力，尽管我们假定在这些场景的周围环绕着不稳定的大环境，这种动力仍然令人满意。这些人的工作自我封闭和受到限制的，但是如此令人沮丧的事情，却仍然是解决目前困境十分有效的方案，因为目前并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可供使用。

眼光狭隘？一个被限民族的有限努力？我不这么认为。莫尔的这些照片是对巴勒斯坦人适应环境能力的证明，它并不象征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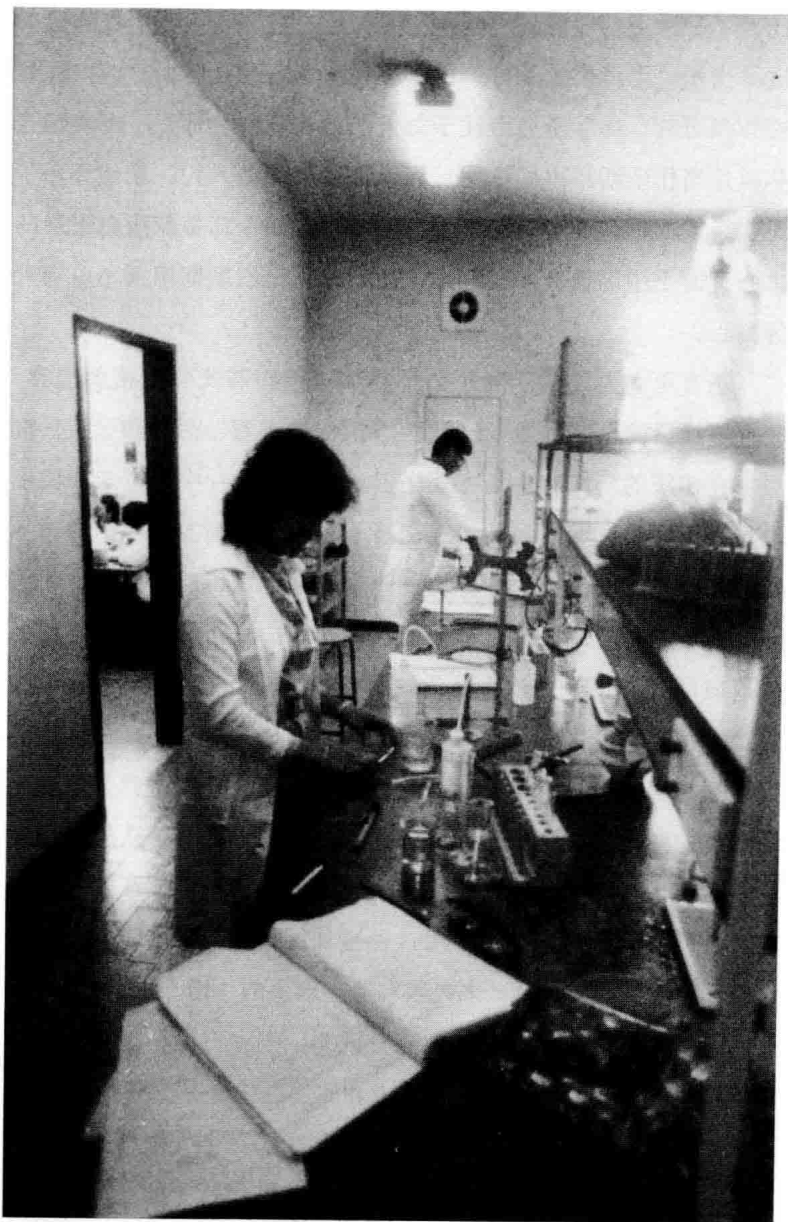


> 耶路撒冷，1984年。在奥马尔清真寺内的《古兰经》研读。

代表了某种虚情假意的民族主义；相反，它表现了我们把自己的世界当作一个世俗的地方，没有去怀念往昔的优越。这些人怀着决心和勇气，竭尽全力专注于每天的物质世界。那么，不要把这些照片当作生活琐事的证明，而是记录着那些人们，虽然经历了无法言表的创伤和幕后的灾祸（nakba），如今却带着明白无疑的决心直面手中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这正是巴勒斯坦人不可磨灭的决心。

还有更多要讲的。阿拉伯世界如今遍布着文化风格的混合，表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式样的衣着、活动和建筑，被添加在传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之上。在这张照片中，古老的城市里布满了无线电和电视的天线网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场所，其中涉及两种传统，一个是本地民族的，另一个则是外国的或者西方的，两者笨拙地互相抑制。它让你去计算这种平衡造成的各种得失，让你认为这两个世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我认为，要表现这些元素的混合究竟是如何发生，并且在现代阿拉伯生活中如何被人体验，一个更加公正的表现方法就是拍摄传统场所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这些传统场所无可否认的中心性非常突出，然后又被周围附属的景物慢慢削减，正象征着大都市现代性的入侵。每个人都采用这种更加缓慢和精细的方式，根据传统和习惯的可畏力量，来吸收和适应新生的一切。

然而，这两个观点都未能充分说明，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质量从1948年以来有所提高。侵占和驱逐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差别，处在“我们”和我们目前的处境之间。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失去家园和历史的剧烈痛楚，也共同背负着我们被赋予的、造成我们不同生活的根源。我们只能把历史的堆积当作一个裂口，一个显



> 比尔泽特大学, 1984年。化学实验室。



> 安曼，1984年。约旦大学的医院，纳伊瓦·库利·博卢斯，儿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



> 安曼，1984年。巴喀难民营，裁缝们。

然没有改变的悬崖，把我们和至今未能获得的民族满足隔开。作为在以色列境内的离散者，作为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没有土地的被拘留者，作为难民和到处流浪的离散者，我们不大可能去恢复已经失去的民族生活的主权。维系我们和我们历史的纽带不仅在1948年被切断，而且也周期性和习惯性地，被以色列镇压我们民族意识的持续战争再次切断。而且每当我们建立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民族生活——在约旦和在黎巴嫩——那些生活也都遭摧毁。每个人都会牢记，1982年9月以色列用卡车从贝鲁特把我们的档案运走的意义。

我相信，这一系列艰难真相的严苛已经融进了我们对于当前

的观念。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经存在的——记忆中的那部分——如今依然在那里存在，但是由于它是不能兑现和无法接近的，它染上了如古老城墙似的那种复杂和冷淡的质地：你既不能拥有它，也不能刺穿它。然而，奇怪的是，历史的这个方面能在当前再次发生，影响了我们每个人关于身处何方、处境如何的判断。如果你知道现在的处境很快就会永远遗失，它的特性只能在不断重复的停留和继续前进的经历中得到保留，你就会学习对你当前处境的一种特殊的关注。回家是不可能的。你学着把机械式的遗失变成一种经常推迟的关于回归的哲学。马哈茂德·达维什：

但是我是个离散的人。

用你的眼睛为我封印。

把我带去有你的地方——

把我变成你的样子。

还给我脸庞的血色

和身体的温暖

心脏和眼睛的光芒，

面包的咸味和节奏的刺激，

土壤的滋味……母亲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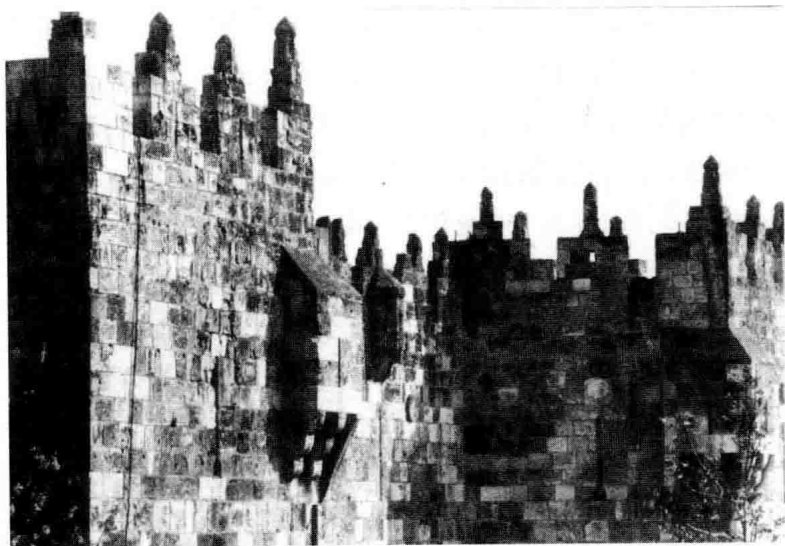
用你的眼睛为我遮蔽。

把我当作遗憾庄园的废墟。

把我当作任何悲剧里的诗句；

把我当作玩具，房屋的砖块

这样我们的孩子将会记得返回。



> 耶路撒冷，1984年。靠近雅法城门的古城墙。



> 耶路撒冷，1979年。电视天线的森林。



> 耶路撒冷，1984年。奥马尔清真寺。

部分是为了让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好过整体。碎片胜过整体。为人掌控的领土上，在一个个定居点中，永不停息的流浪。对于顺从的批评。在一片没有投资和消费欲望的贫瘠平原上，巴勒斯坦人的自我意识。为乞讨而愤怒的英雄主义，依赖他人保护的有限独立。关心，警惕，聚焦。和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却不知何故总是被分离着。用片断来讲述你的故事，如同故事本身的破碎一样。

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并且介乎犹太人离散的封闭轨道之间，以及一个被复原起来的、非常有名的、以以色列为象征的爱国主义。我有时想，我们的到处流浪，要好过他们回到这片土地时的紧闭大门。这是一个开放的世俗环境，而不是对称的宗教救赎。

* * *

这些由老迈妇女、无名流浪者旁观的无精打采的男孩所组成的凄凉的出殡队伍，让我们的历史在我眼前闪过。黑色在这里是突出的颜色——牧师般的袍子、妇女的裙子、男人的外套，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一次普通的死亡，伴随着浪费的午餐、宗教仪式的干尸、虔诚的朝拜、贬值的习俗。我们沉浸在宗教当中，只能看见很小的角落，只有很小的部分关系到我们。巴勒斯坦拥有的是怎样的命运啊：引来宗教想象和神启的戏剧，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后的那一个最为朴素，最不为人知晓，也最为人憎恨。揭开宗教假话的粉饰——用完全可以替换的短语说着“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最好也是最高贵的传统”——一个无耻谎言的火热熔炉暴露出来，沸腾着兽性，血流成河，以及无数的尸体。

无论人们多么乐意原谅但丁、马里^[25]，甚至变节的异教徒萨巴泰·泽维^[26]，把巴勒斯坦的光环据为己有，我都难以接受当代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穆斯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它的不幸民族的仇恨。杰里·福尔韦尔^[27]，或者他的任何一个再生的工作人员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当你听到他们的胡说八道，你会为他们所信之物的全然疯狂感到惊骇，尤其是当你听到他们在访问以色列时受到的特殊待遇——专业向导带领他们到处参观；以色列的主要政府官员向他们致辞。根据这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提出的情节，俄国和以色列——歌革和玛

各^[28]——将有一场世界末日的终极决战，俄国将获得胜利，直到耶稣干涉（然而，耶稣的干涉没有及时到足以防止所有犹太人的死亡；阿拉伯人似乎完全没有被计算在内）。与此同时，真正的基督徒将被悬于以色列之上，在战争的上空，极乐升天，等到战斗结束之后，耶稣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生，从此他们将统治世界。

至于第三圣殿运动^[29]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古希埃穆尼姆^[30]的狂热分子和他们在复兴党^[31]的追随者，这些狂热者想要清除阿拉伯人的力量，补充了与他们相似的基督徒的疯狂。并非徒然地，伊斯兰齐声回应，就像是布莱克^[32]幻想的某个幽灵，或者雪莱晚期启示录式的诗歌，意在让你错过争辩的线索，只抓住可怕模糊和滴血的意象。穆斯林圣战（Jihad）和伊斯兰律法的力量让年轻的男男女女做出反应，他们所采取的这种自杀性的斗争，是世俗解放的政治从未梦想过的。

我们的世界如今被狄俄尼索斯^[33]的王国统治着，尽管媒体似乎不相称地只着迷于伊斯兰教的示威运动。我不知道，这些疯狂的想法，是分裂黎巴嫩的宗派疯狂的副产品，是东西方对峙的残存，还是从十字军东征、审判异教徒以及宗教改革的千年粗糙激情里涌出的遗迹。我知道的是，在这一切和我被抚养大的乏味的天主教氛围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完全的断裂。我童年时代那些冗长的礼拜日，我们经常参加的三场连续的英式、美式和阿拉伯式礼拜，过量的午餐，以及禁止一切比BBC的午后歌剧节目更让人愉悦的活动——吉恩·莫尔对安曼之行的报道激发了我心中的怀旧之情，并让这种感情变得非常强烈。不知为什么，莫尔在安曼偶遇了被我遗忘多年的圣公会社区，他们重塑了30和40年代耶路撒冷屈服和沉闷的气氛。我也记得祖母顽固但温和而无效的抗议，她



> 耶路撒冷，1979年。牧师，苦路^[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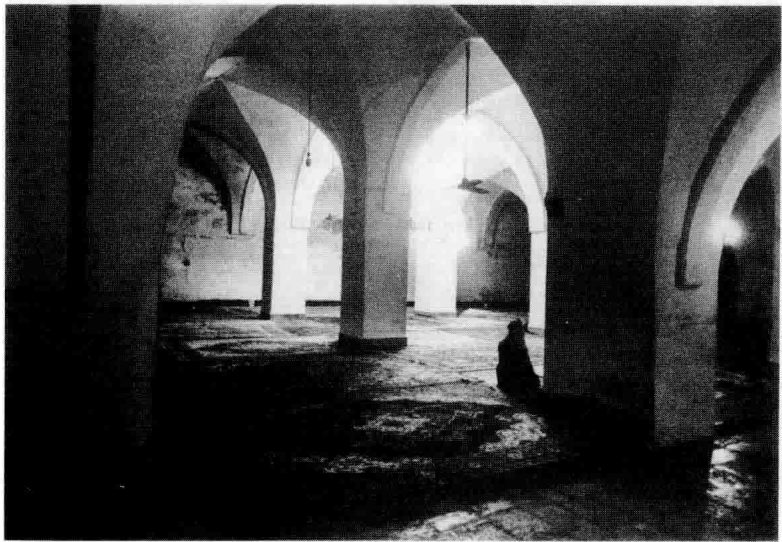
对天主教义的绝对坚持，让她拒绝喝哪怕是来自教会圣杯的一滴酒。每当涉及《圣经》，她就变成一个拘泥字义的人——那是上帝之言——但是对她来说，就好像对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来说那样，重要的是摩西和法老王^[35]、约瑟夫和波提乏妻子^[36]、耶稣和彼拉多^[37]之间发生的故事。慢慢地，这些故事让她无比忠诚于一个朴素的事实，人——既不是带着羽毛的圣人，也不是想象出来的英雄——能够为他们认为正确和正义的事起来抵抗。她非常擅长讲述那些高潮的场景，每一次总是以家常的提示开始：“现在，往这里看。”的确，我们能够看到，普通的男男女女正忙于叙述和演讲，就像我们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信徒们喧嚣的视野旋涡中消失，他们无



> 耶路撒冷，1979年。朝圣，苦路。

法看到社会中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宁愿去圣地做一个单独的游客，忍受世俗和无聊的搜寻，为货币兑换和语言障碍而困扰，也不要专横的牧师、教长和拉比认为确定无疑的戒规和目标。但是那些宗教人物已经成为巴勒斯坦土地上固有的部分。因此，问题就变成如何绕开他们，甚至达到某一程度，如何适当地利用他们而不被他们彻底驱走。托菲克·扎亚德写过关于一条狗的短篇故事，狗的名字叫萨马尔，它比喻的是我们在剧烈风暴中心所丧失的位置。当英国军队侵犯马切布莱村时，萨马尔向英国士兵（也可以就是牧师们）发起攻击；英国人之后来了阿拉伯军队，然后依次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士兵，这只狗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但是至少它能够回到它的村庄，在自己的家里死去，而它主人的家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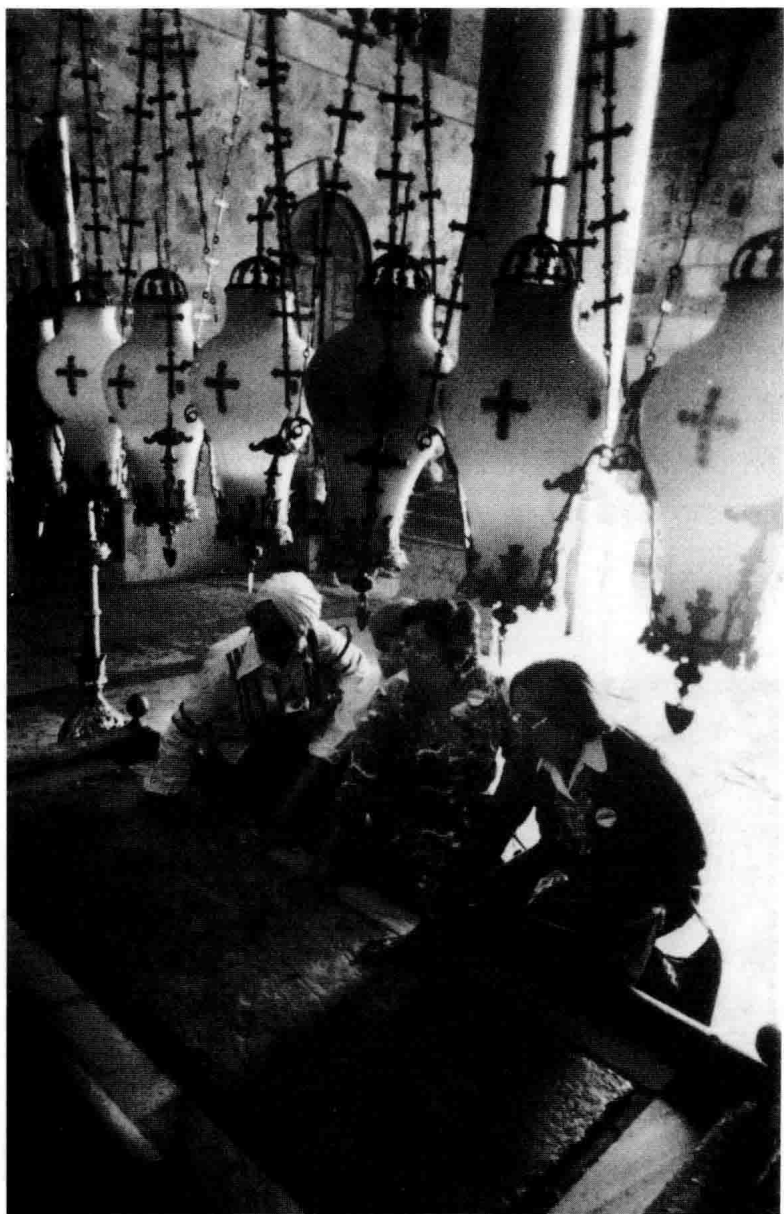
> 希伯伦，1979年。易卜拉欣清真寺。

被人侵占，永远也不能返回。

在我注视吉恩·莫尔的照片和写作这本书的日子中，叶芝的两首诗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丽达与天鹅》^[38]和《在学童中间》，这两首诗的熟悉和杰出持久有力，虽然时间流逝，但依然能有意想不到的含义。1972年和1973年，我在贝鲁特度过了一个休假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和好朋友弗雷德·杜皮^[39]到贝鲁特去看我。当他走进我们在贝鲁特的房子时，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叶芝的《诗集》(*Collected Poems*)，是我从美国带到贝鲁特去的。



> 安曼，1984年。阿莉娅女子学校^[40]的年度嘉宾之夜。娱乐之后，来访者和家长们向圣公会主教伊利亚·库利致敬。



耶路撒冷，1979年。游客在圣墓教堂^[41]朝圣。

“这里有你的叶芝，”他说，“有点儿奇怪，但是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他。”的确，叶芝的写作充满着爱尔兰和希腊的典故，他的作品在1967年后巴勒斯坦复兴的早年间，经常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结合，因为叶芝的作品经常聚焦在遥远的历史瞬间，然后和一连串当代典故汇集，形成一个崭新的时常出乎意料的情感结构。

稍后不久，当我阅读比尔泽特大学一位年轻巴勒斯坦英语讲师哈南·米克黑尔·阿什拉维^[42]所写的精彩论文时，这种结构对我而言逐渐变得明显起来。哈南·阿什拉维的论文是关于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作家感受力的影响，这让我想起了占领——外来势力对普通人生活的强大和粗暴的干涉——和丽达与宙斯故事之间的关联。叶芝的最后一节：

当她被占有之时，
当她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所制服，
在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

阿什拉维说，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必然要做出一些反应，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升民族意识，特殊情况下现实的小心回归，以及或许不那么重要的，发现表达美感的适当形式。她总结说，巴勒斯坦作家不能被低估，因为他们创造了大量反抗和进步的文学，他们为审判以色列的占领提供了证词，他们在读者中推动了团结和民族统一的观念。然而，阿什拉维真正的观点还要更进一步。她指出，在以色列占领下的作家们，大部分作品并不优秀，这是

因为作家们在同一时间尝试做太多紧急的事情。她说，我们需要的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们拥有一种责任感，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巴勒斯坦的（因此就具有民族重要性），或者在政治压力下，就可以理解地缺乏风格和形式，为不好的文学寻找借口。

哈南·阿什拉维批判性的论文在巴勒斯坦当前的情况下，标志着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不是显而易见。我毫不怀疑，我们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如今已经对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不幸感到彻底的厌倦，这种不幸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部分是因为那些侵占我们的人们，部分则是因为我们事业异常的失败，既不能有效动员我们的朋友，也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另一方面，我还没有碰到任何巴勒斯坦人，因为太厌倦当一个巴勒斯坦人而彻底放弃。



> 巴黎，1984年。马哈茂德·达维什，巴勒斯坦民族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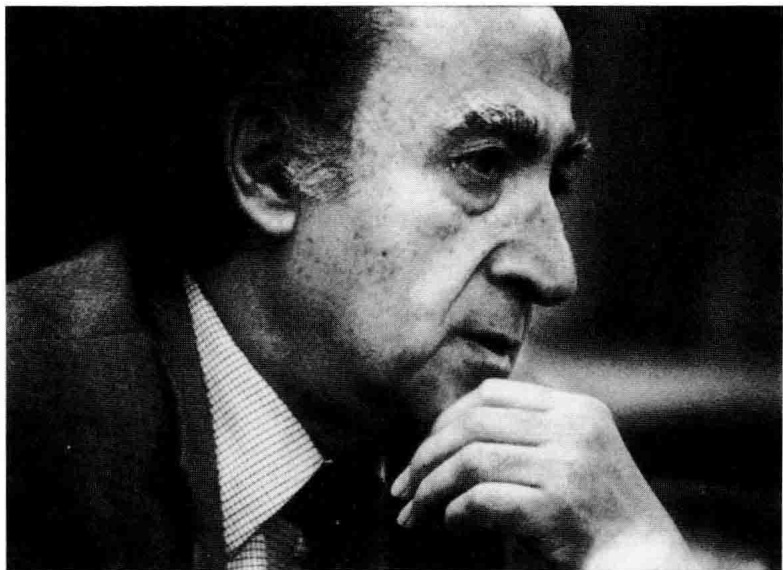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为我们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虽然每当一场新的运动开始进行，怀疑和疲乏（毕竟，你能继续失败多久？）就会出现。因此，我们只剩下对未来解决巴以问题的向往，这种向往含糊但又强烈，含糊是因为不知道这个过程将怎样并且何时才会发生，强烈是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我们和以色列间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些情感中含有明显的倔强，绝对不能忽视。这种倔强来源于不断堆积的巴勒斯坦历史情感，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中，是如此的全民和深深镌刻，因而无法压制或者忽略。今天，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回避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必然命运，虽然存在却在政治上不为人考虑。另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中成长，开始表达自己对巴勒斯坦的热爱。或许阿尔-穆卡达斯，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地理学家，是第一个做出这种重要声明的人。他说，巴勒斯坦“结合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快乐；任何属于这个世界但渴望另一个世界的人，能在巴勒斯坦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魅力；任何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将在巴勒斯坦发现那个世界拥有的所有美好”。

所以，就像哈南·阿什拉维在她论文的结论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新的民族意识，是属于这样一个民族，它的经历应当和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塞浦路斯人、美国黑人、波兰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一起，处在那些恐怖的边境线上，在那里民族的生存和消亡互相模糊，抵抗是必需的，但有时人们也越来越领会到，需要了解这不寻常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前所未有的。因为，在经历了这一切极限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政治上未决的时期，并且被迫提出问题：我们是否已经了解是什

么带给我们这样的命运（或许这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我们能否改变命运？基于我们的历史事实，我们能否负责地准确描述出一个未来，让我们可以坚持和渴望？我们能否“增加”足够的知识，去了解在这个世纪中，如此无法改变地入侵和扰乱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能否看到自己当前的处境，能否真正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很难比假设性地提出这些问题更深入一步了。当我试图把自己的思绪整理成有条理的散文时，太多有关我们各异的、时常显得绝望的离散生活的细节痛击着我。最多，我觉得这些各自不同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旋律（如果不是刺耳的杂音），由多重的几乎令人绝望的戏剧组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旋律，因其正在他或她的生活中同时发生。比如说，现在这里正充满着巴解组织和约旦人要实现和平的气氛。然而，巴勒斯坦的媒体和口舌们却提起新的土地征用、集体惩罚和拘留中心（我们地理上的意识时常被安萨、内韦泰尔扎和阿特利特之类的监狱名字所侵犯，用以色列士兵的话来说，他们在这些监狱里“虐待和羞辱人们”，折磨、殴打和死亡以令人震惊的频率经常发生），提起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里可怕的不卫生状况（同情的西方目击者们曾经痛心疾首地描述过，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无法控制的垃圾和疾病），提起自从1982年以来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巴勒斯坦教育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刚开始显示我们集体政治分散的程度，直到1982年之前我们的集体政治还是统一和集中在贝鲁特，然而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权威，足够强大到能把我们团结起来。

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没有减轻。在西方，我们是到目前为止阿以冲突中最弱小的一方，却被安排饰演最大的恶棍、和平的阻



> 巴黎，1984年。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小说家、诗人、翻译。

碍，我们的诉求过高且不知妥协。因为我们非常弱小，我们被预先要求做出最大的让步。美国人拒绝和我们的代表谈判，因为在1975年，以色列和亨利·基辛格^[43]在有关西奈的第二阶段协议中加入一项条款，该条款说美国人将不与巴解组织接触，除非我们满足意在消灭我们自己的条件——这个方案的傲慢自大令人吃惊，因为它要把闻所未闻的条件强加到我们身上。（在国际外交中，“承认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合法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方可以决定由谁来代表他的敌人？凭什么要求我们接受像242号^[44]之类的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甚至没有提到我们？）我们是受害者，社会遭到毁坏，从此一直忍受侵占，时常是种族灭绝的目标，人们却期待我们要温顺地不做抵抗；另外，我们还被

训诫要停止暴力，不再坚持指派我们自己的代表，放弃拥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愿望，以回应美国人对和平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向我们的敌人提供一切物资，并且拒绝谴责以色列公然非法的行径；以色列使用美国的武器欺凌我们，包括集束炸弹在内，侵略黎巴嫩，轰炸难民营里的平民；以色列拘捕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不给他们战争囚犯的身份；以色列还使用铁腕政策，足以与“二战”时加之于南斯拉夫、希腊、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法国村庄上的恶行媲美。

我们不仅为这一切的不公正感到无比愤怒，我们还在这虚伪造作中发现一种特殊的讽刺；我们的对手被描绘成民主与文明之友，尽管我们正在堕落和野蛮兽性的底层无限期地徘徊。因此，我想要对这些伪善者说，看，真正仔细地看看这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表现了衰老的普遍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因为我们所处的困境而更加严苛；这个过程把我们从童年时的幸福期待，带到快乐青春期的开放自由；再到围攻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强烈防备意识；最后成为现代受害者饱受折磨的象征。如果你仔细观看这条从年少到衰老沧桑巨变的道路，如果你不把这些照片当作某种外国标本的展览，你就会看到，这些照片所表现的人们是你可以用心和感情去关怀的——家庭成员或者亲密的朋友。而你几乎肯定会得出结论，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令人沮丧和悲伤的过程，就像一名老妇饱受苦难的脸庞上留下的痕迹那样；叶芝的诗句说：“一次严厉的责备……竟然在童心上造成悲剧的一天。”

在同一首诗《在学童中间》，叶芝把岁月的不幸表现为不确定的“年轻的母亲，膝上抱一个人形 / 那是“生殖蜜”泄漏给人间的皮囊”。当她想到她的孩子时，“白茫茫披六十来个冬天的风光，



> 纽约, 1978年。在一次支持以色列游行中, 一名反对该游行的巴勒斯坦人。



> 大马士革, 1983年。赛伊达·采那布难民营。刚从黎巴嫩来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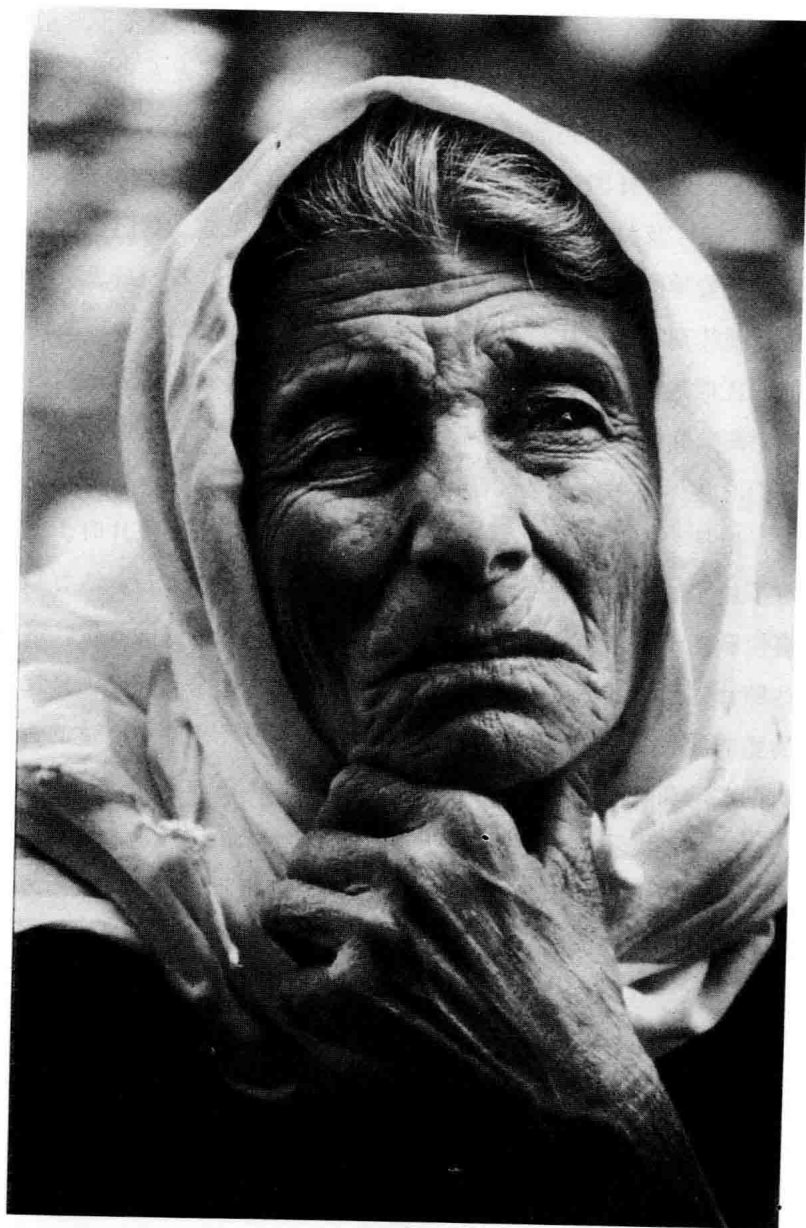
是报偿了生她儿子的痛苦 / 还是愁他人世前途牵肠挂肚？”当然，我们有资格就我们的历史询问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受制于时间、发展、变化和衰落，这个事实能够消除任何认为巴勒斯坦人是永远无家可归和恐怖的范例的想法。我们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反对这种想法，和叶芝的诗拥有相似的背景，一个成熟的意识探究、面对和思考着它目前自我意识的具体渊源。

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所要求的认识和责任正如叶芝的诗歌，“只要躯体不为取悦灵魂而自残”，只要 we 和自己的历史像舞者和舞蹈一样融合，我们能把自己不当作“悲伤”和“无家可归”的空洞生命，而是如我们的诗人和作家们看待我们的那样，充满着丰富的经历，是我们斗争和失败的历史——以及更多——的结果。

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很好地为人所理解，



> 比尔泽特，1984年。一名学生。



> 加利利，1979年。拉马附近难民营里的老妇。

无论是为陌生人还是为我们自己，人们没有精确地或者如照片般地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于非巴勒斯坦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来说，我们也不是简单的“其他人”，那种可以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来表现的外国和不同的人物。无论我们对于世界做出怎样的声明——以及关于我们自己的声明，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这个为人所安排的固定地方无法得到安宁——事实上，我们最真实的现状就体现在我们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地方。我们成为不断迁徙的任何地方的移民，或者混血，但却从不属于这些地方。作为一个离散和始终在迁徙的民族，这正是我们生活最深处的连续性。我们时常无法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特质，我们也总是不希望看到它，但是至少对我来说，在看到吉恩·莫尔所拍摄的照片时，就有了偶尔的机会联想到它。这样说吧，这些照片中兴奋、活力和喜悦跃然纸上，强烈地打动着你，然而通过一种适度的直接，这些照片提醒你迁徙不需要总是追逐或离散。在这个男孩充满喜悦的脆弱胜利中，你可以看到一丝我们很多人都在生活中有过的暂时的成功和瞬间的才能：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就时常需要掌握但不去支配，快乐但不去伤害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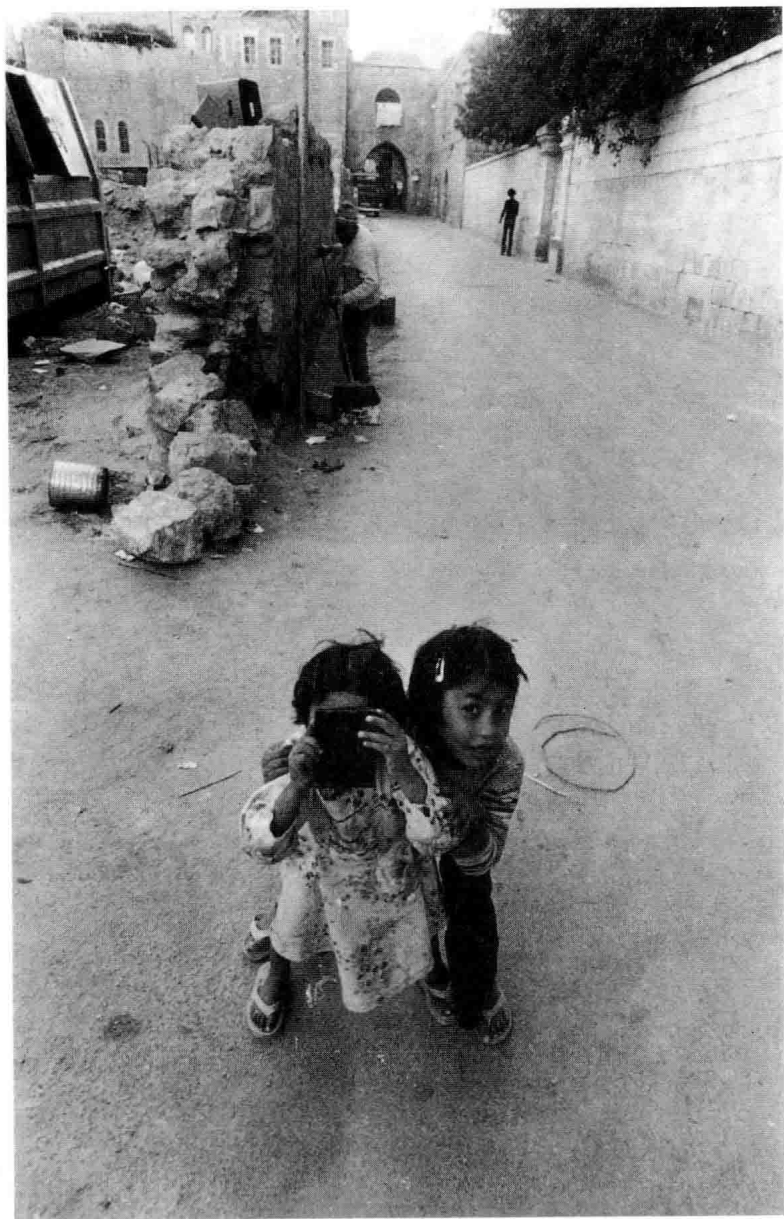
这些肯定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稍纵即逝的特质。即便是被活力少年的照片鼓舞得兴高采烈的人们，也仍然会回过头想起巴勒斯坦人生活中压倒性的悲哀。我们感到一种令人沮丧的无力，不仅因为构造起我们环境的平庸、暴力和人类垃圾，还因为我们被层层包围在对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令人不安的忧虑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不断推迟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显得并不令人鼓舞。在我快要完成此书时，我对此的感觉尤为强烈。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我们民族的完整历史，甚至也没有完整的记录，记载我们的



> 加沙，1979年。童工。



> 塞尼尔村，靠近拉马拉，1979年。被拯救的小鸟。



> 耶路撒冷，1979年。摄影师正被人拍摄。

遭遇，以我们的名义所实行的暴行，还有我们对别人实施的一切。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和吉恩·莫尔一起，告诉人们我们目前本质上的民族不完整性，我相信这种不完整性只能从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充满同情与协作地进行描绘。这本书中缺少解决方案正反映了实际的情况：它源于离散。我曾经希望，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有机会去一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一些以色列朋友许诺会询问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我可以获准前往，安全旅行，并且可以如愿离开。因此，我曾计划在旅行回来之后加一个总结。我的想法是能够通过巴勒斯坦境内和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触，使这些照片变得圆满。然而，我至今仍在等待最后的消息；我相信，这种无常或许更加适合我不确定的立场，正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政治模糊。

然而，我愿意认为，这样一本书不仅向读者讲述了我们，也通过某种方式讲述了读者自己。我愿意认为，我们并不只是这些照片中被人看见和观察的人：我们也在注视着我们的观察者。我们巴勒斯坦人经常遗忘这一点——在一个接一个国家中，对巴勒斯坦人的监视、限制和研究正是削弱我们地位和阻止我们民族成就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只是作为相反和不平等的“其他”，我们也总是处于防卫——我们也在观看、细察、衡量和判断。我们并不仅仅是某人的目标。我们也不仅仅是被动地站在那里，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观察我们。如果你无法最终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决不会允许自己去相信，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失败。再也不会了。

译注

[1] 撒母耳 (Samuel, 约公元前 11 世纪),《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英雄、希伯来先知和法官。

[2] 艾伦比桥 (Allenby Bridge), 在约旦河下游, 位于约旦河西岸与约旦的边境线上。

[3] 福阿德·莫拉比 (Fouad Moughrabi), 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等。

[4] 塔布勒沙拉 (Tabooleh), 用小麦和欧芹制成。

[5] 基布兹 (kibbutz), 即以色列的集体农场。

[6] 卡利姆·卡拉夫, 前拉马拉的市长。

[7] 特雷弗·罗珀 (Huge Trevor-Roper, 1914—2003), 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 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研究的权威, 出版于 1947 年的《希特勒的末日》使他一举成名, 1983 年又因为为伪造的《希特勒日记》出庭作证而名誉扫地。其他的历史学著作有《希特勒漫谈》《格贝尔斯日记》和《北京隐士》。2003 年 1 月 26 日, 罗珀在牛津的一家收容院里去世, 享年 89 岁。

[8] 戴克爵士 (Lord Dacre, 又写作 Baron Dacre), 英国贵族头衔, 曾被数次创设, 又数次没收。第一任戴克爵士是 1321 年受封的拉尔夫·戴克 (Ralph Dacre, 1290—1339)。

[9] 公元 1110 年, 十字军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阿卡, 将阿卡建成其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 之后又把阿卡定为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

[10] 1982 年黎巴嫩战争期间, 沙龙是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黎巴嫩马龙派民兵在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屠杀了约 460—3500 名巴勒斯坦人, 当时以色列军队在沙龙的命令下为马龙派民兵提供后勤保障, 并且守卫难民营出口。之后, 沙龙因此事被迫离职。1987 年, 美国《时代》杂志发表文章, 暗示沙龙应当直接为萨布拉—夏蒂拉屠杀负责。沙龙向美国和以色列法院起诉《时代》杂志诽谤,《时代》杂志最终在美国胜诉。

[11] 乔纳森·内塔尼亚胡 (Jonathan Netanyahu, 1946—1976), 以色列国防军成员。恩德培 (Entebbe) 是乌干达南部城市, 位于维多利亚湖畔。1976 年,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恩德培机场劫持一架法航班机, 以色列突

击队发动攻击,救出大多数入质。乔纳森是该行动的指挥,也是在行动中唯一丧生的以色列军方人员。

[12]纽伦堡(Nuremberg),德国拜恩州北部工商业中心。“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曾多次在此召开代表大会。1945至1946年间,成立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了24名主要纳粹战犯。

[13]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主要由全世界的社会学教授组成,监察国际上违反人权的事件。目前,国际特赦组织在全世界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会员,是全球最大的人权组织。该组织宣称:“我们奉行并推广《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际法的人权法则,主要的工作为预防及终止肆意侵犯身体以至精神方面的健全、表达良心的自由以及免受歧视的自由。”1977年,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4]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1904—1988),爱尔兰政治家 and 律师,曾是爱尔兰共和军长官,后来成立爱尔兰共和之家(Clann na Poblachta),并出任爱尔兰外交事务大臣。他是国际特赦组织的创始成员,并于1961—1971年间出任该组织的国际主席。197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获得列宁和平奖。

[15]瓦妮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1937—),英国女演员,出身于演员世家,被认为是英国最优秀的戏剧演员之一,也是积极的左翼社会活动家。瓦妮莎曾经以《摩根》和《绝代佳人》两次荣获戛纳影展的最佳女演员奖,六次提名奥斯卡并最终在1978年凭《朱丽娅》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还曾经出演过《女孩向前冲》《末日救未来》《碟中谍》等片。瓦妮莎热衷政治活动,是“英国劳工改革组织”的领导人。1978年,当瓦妮莎上台领取奥斯卡奖时,她当众发表了反对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政治言论,引起了很大风波。之后,她还资助拍摄了一部反以色列的纪录片《巴勒斯坦人》。

[16]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美国共和党人,美国前国会议员(1961—1983),他公开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曾与阿拉法特会面。芬德利认为,该委员会的政治影响让

很多政治家，包括他本人，在选举中落败。芬德利著有《敢于直言》一书，描述了以色列说客们在美国的政治影响，以色列对白宫、媒体、高校和教会的影响，以及美国的国家政策是如何轻易地为以色列所操纵。

[17] 皮特·麦克洛斯基 (Pete McCloskey, 1927—)，美国共和党人，美国前国会议员 (1967—1983)，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持反对意见，人们认为他正是因此而未能继续担任众议院议员。

[18] 查尔斯·珀西 (Charles Percy, 1919—2011)，美国贝尔蒙公司主席 (1949—1964)，共和党参议员 (1967—1985)。1982年，珀西投票支持波音公司出售空降警告和控制系统技术给沙特阿拉伯，因此得罪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影响下，珀西在随后的选举中落败。

[19]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原名为美国犹太复国运动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代表以色列的利益游说美国政府，自称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成员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20] 比耐布里斯 (B'nai B'rith)，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至今仍在运行的犹太人组织，名称来源于希伯来语，直译为“盟约之子”，1843年由亨利·琼斯 (Henry Jones) 在纽约市成立，大力支持以色列。

[21] 约瑟夫·尼达姆 (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即李约瑟。英国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他的研究让世界承认了中国古代的技术科学成就。约瑟夫·尼达姆因尊崇老子，遂以李为姓，起中国名字李约瑟。1942年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此后专事中国科技史研究。1948年返回英国剑桥大学，着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第一卷问世。该书计划出7卷34册，已基本出齐。李约瑟是英中了解协会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22] 迈克尔·阿提亚 (Michael Atiyah, 1929—)，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父亲是黎巴嫩人，在埃及的开罗和苏丹长大。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授，牛顿数学研究院创办人，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23] 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英国非常

有影响力的学者、小说家和批评家，剑桥大学的戏剧艺术教授，社会主义者，对语言、文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出版多部著作。

[24] 作者在此使用的是“Maquis”一词，即马基，法国国内游击队的通称。Maquis 在法文中意为丛林、密林，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游击队即以此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又沿袭此名。

[25] 马里 (Ma'arri)，即 Abu ibn Abd Allah alMaarri (973—1057)，阿拉伯诗人和作家。相信无神论，在他生活的年代十分少见，因而著名。

[26] 萨巴泰·泽维 (Sabbatai Zevi, 1626—1676)，自称是救世主，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逼迫下，萨巴泰宣布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创建了东马 (Döme) 派，吸取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元素。

[27] 杰里·福尔韦尔 (Jerry Falwell, 1933—)，美国基督教浸信会牧师，十分著名的保守派活动分子，是现代美国基督教界最有争议的人物，支持以色列，公开批评美国的公立学校和世俗教育制度。

[28] 歌革和玛各 (Gog and Magog)，在先知的预言中是人类反抗基督的领袖。第一次提到玛各是在《创世记》，他被视为雅弗的儿子，雅弗是诺亚的三个儿子之一。雅弗的后代占领了以色列北部的版图，即现在被称为欧洲和亚细亚的地区。先知的作品曾提到歌革和玛各。在每个事件中都提到了北方的各国联盟，由歌革领导，进攻和威胁；或者是以色列重新聚集的国民，或者是基督的信徒，或者两者。在每种情况下，歌革的军队都由于神直接干涉而被毁灭。

[29] 第三圣殿运动 (Third Temple Movement)。相传公元前 1010 年所罗门王开始在摩利亚山 (现在的圣殿山) 建设圣殿，以便存放约柜、诺亚方舟等圣物。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王杀到这里，摧毁圣殿，赶走了犹太人。直到公元前 538 年，波斯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后，犹太人才被允许返回，并在公元前 516 年动手在第一圣殿的原址上补建第二圣殿。公元 70 年，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起义，将重建的圣殿彻底焚毁，只留下西墙墙基的一段，后人收集残石在墙基上垒出了一堵墙，这就是如今的“哭墙”。以色列建国后，修建了把哭墙和苦路连接起来的隧道。而极端犹太组织一直声称要推倒两大清真寺，重建他们的第三圣殿。每年这些极端分子都要把一块据说是从犹太圣殿中保存下来的巨石运到哭墙附近，举行象征性的重建圣殿仪

式。

[30]古希埃穆尼姆(Gush Emunim),希伯来语,即“忠诚的信仰集团”,以色列政治运动,起源于1967年的六月战争,1974年成立正式组织,鼓励在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31]复兴党(Tehiya party),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78年,反对《戴维营协议》中把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并且撤出犹太人定居者的决定。80年代末,复兴党在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消失。

[32]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著有诗集《诗歌随笔》《天真之歌》《经验之歌》《耶路撒冷》等。诗作充满幻想和哲理,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绘画以线描淡彩著称,全部作品都是书籍插图。

[33]狄俄尼索斯(Dionysus),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为了纪念狄俄尼索斯,在古代雅典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酒神狂欢节(Dionysia),活动内容主要是悲剧和喜剧的表演,是仅次于泛雅典娜节的最重要的节日。

[34]苦路(Via Dolorosa),也译成苦伤路,耶路撒冷旧城的一条街道。据说,在这条弯曲的小路上,耶稣背负着十字架游街示众,走向刑场,其间经历了14件事,因而苦路也有14站,因此在苦路走一遭,就成为教徒们的朝圣旅程。耶路撒冷很多街道的名字在英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都有不同的翻译,只有苦路,在这三种语言中都被叫作Via Dolorosa。

[35]《圣经》中的故事,摩西(Moses)的生平在《旧约》中有详细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进入埃及数百年,繁荣兴旺,后遭到埃及法老王的种种迫害。据载,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到西奈半岛,并创造许多奇迹。在西奈山上,上帝向摩西颁布十诫及其他律令。后摩西又设立宗教祭司与审判制度。自此犹太教有了完备的教义。摩西被视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和领袖。

[36]《圣经》中的故事,波提乏(Potiphar)是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约瑟夫被带到埃及后,被他的兄弟卖到波提乏家里做奴隶,后来被提升到家务总管。之后,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夫,被约瑟夫拒绝,她便恼羞成怒,反诬约瑟夫要强奸她。波提乏信以为真,便将约瑟夫关入监狱。

[37]彼拉多(Pilate),即Pontius Pilate,公元26年到36年间朱迪

亚的罗马地方官员，传说是他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38]《丽达与天鹅》(*Leda and Swan*)，叶芝的代表作之一，其神秘主义倾向在这首作品中尤为明显。这首短诗从希腊神话中取材，讲述的是宙斯幻化成天鹅与美女丽达结合并生下两个女儿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一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军队统率阿伽门农的妻子）。关于叶芝创作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评论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诠释和解读，有人认为是“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性爱和战争”，有人则认为是“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39] 弗雷德·杜皮 (Fred Dupee)，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

[40] 阿莉娅女子学校 (Ahliyyah School for Girls)，位于约旦首都安曼，成立于1926年，是一所非营利的国际女子学校。

[41] 圣墓教堂 (Church of Holy Sepulcher)，又称复活教堂，耸立于东耶路撒冷旧城的卡尔瓦里山上，耶稣的坟墓和坟墓的进口都在此教堂之内。圣墓教堂位于苦路的尽头，苦路的第10至14站都在其中。据传，这里原本是贵族约瑟夫购买的墓地，当年他因敬仰耶稣而把自己的墓地捐献出来埋葬耶稣。但是后来人们见到耶稣显灵，便打开圣墓查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人们就此认定耶稣复活了。

[42] 哈南·米克黑尔·阿什拉维 (Hanan Mikhail Ashrawi, 1946—)，比尔泽特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曾经担任阿以谈判中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发言人，并且主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一个人权组织。

[43]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1923—)，犹太裔美国政治家。1955—1968年间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政府的各种机构中担任安全事务顾问。1968年受尼克松任命，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 (1968—1975)、国务卿 (1973—1977)。

[44] 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决议，1967年11月22日通过。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军撤出在最近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终止一切交战要求或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其在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和平地生活而免遭武力的威胁或行为的权利。

后记：贝鲁特的衰落

THE FALL OF BEIRUT

当代巴勒斯坦的历史在阿拉伯世界到处展开，具体表现为离散的人口（如今占到我们总人口的一半）和离散的地方——开罗、大马士革、安曼、科威特、巴格达、的黎波里、突尼斯、利雅得。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还没有一个地方像贝鲁特那样，充满着令人惊愕的暴力和无法预期的适应性。从官方角度来讲，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关系在1982年8月被切断，那时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被以色列军队围困三个月后，撤离了贝鲁特。然而，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留了下来。对于那些仍留在那里的人们，以及我们这些已经离开但仍和那个地方有关联的人来说，贝鲁特的非凡戏剧在继续上演。

我从来不认为贝鲁特是中东的巴黎，或者黎巴嫩像瑞士。这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当前的痛苦少一些可怕，让贝鲁特无情而复杂的自我分解——大部分都在主要时段的电视中上演——少些不可预估，或者对于目击者而言少些冗长而麻木的悲惨。整个过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部大型版本的劳雷尔和哈迪^[1]电影，电影中两个男人复仇心切地毁坏对方的汽车和房子，一件接一件，针锋相对；当他们怒目而视，并在很多次“接招”中自我鼓吹时，他们周围的世界被彻底毁灭。如果权力和领土的斗争在贝鲁特继续不受抑制，那么等到并且如果，最终的胜利者出现时，权力和领土都不

会剩下什么。我的一个巴勒斯坦好朋友经历了整场折磨，他从贝鲁特打电话告诉我说，除了要忍受轰炸和混乱以外，仅仅是阅读当地的报纸也能让任何人发疯；没有两份报纸讲述一样的内容，试图弄清正在发生什么，或者谁正在为什么原因攻打谁，就像是捕捉云彩一样困难。

我直系家庭中的一些成员仍然生活在贝鲁特，我的妻子是黎巴嫩人，她的大部分亲戚都还生活在那里。这些勇敢到不可理喻的人们太过固执，太不愿意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太过执着于这个城市，因此不愿意离开贝鲁特。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自从1982年以来，我就不再认为访问黎巴嫩是明智的，尽管我的妻子玛丽亚姆以及两个孩子在以色列入侵之后去过几次黎巴嫩。我寡居的母亲勇敢地坚持独自生活在她西贝鲁特的房子里，相当敏感地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供电短缺、电话故障、寻求帮助的困难，以及黎巴嫩镑的贬值。当我母亲和其他亲戚到伦敦和纽约之类的地方小住一阵的时候，我不时见到他们；他们有办法旅行，还是幸运的。1983年前后至今，玛丽亚姆和我就不再尝试去注意他们脸上或举动中的变化，这发生在特别的尝试“轮”（就象杀戮较量的名字那样）之后。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既不能追踪也不能重塑，仅仅是他们的幸存就已经显得如同奇迹。我们发现自己在回避考虑他们必然承受的内部伤痛。我们的大部分表弟表妹和侄子侄女，都成长于10年的不间断战争中，他们往往交替地说起电脑游戏、足球比分和大屠杀，他们能够轻易分辨出网络分析与显示系统（Grads）^[2]、角色扮演游戏（RPG）^[3]和喀秋莎火箭炮^[4]，这种能力令人寒心；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坚持要给他们“普通的”生活。大部分的日常词汇并没有什么改变。尽管怪异的政治仍然“在

那里存在”，民兵、领导人和敌对政党也一样，战争当然也随处可见。

萨布拉、夏蒂拉、布尔杰-舍马里——这些丑陋的到处蔓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就位于贝鲁特南部——再一次被包围、轰炸和蹂躏，这一次的凶手是什叶派阿迈勒民兵，最早由巴勒斯坦人武装和训练。尽管什叶派的胜利概率巨大，什叶派发言人也无数次发表关于胜利的宣言，巴勒斯坦人对阿迈勒的抵抗持续不减。1982年，萨布拉和夏蒂拉发生大屠杀，制造者是由以色列军队支持的马龙派民兵。虽然是不同的季节，但受害者还是一样。

我几乎已经放弃试图推算这些变化和转折，因为每一次都比前次更加密集和复杂，每一次黎巴嫩赚钱、阴谋、个人和集体谋杀的能力都让我吃惊。然而，所谓的传统领导人和他们各自平庸的后代并没有改变，他们伪造并且几乎立即就背叛了彼此之间，以及与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伊朗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和沙特阿拉伯人（似乎在资助所有人）之间的联盟。在这太过漫长和肮脏的白痴般的暴力，以及无止境的贪污的景象中，没有人值得仰慕或信任。有人认为，即便是那些无辜的平民，不断继续着他们勇敢的道路，能够数次重建和重新开始生活，勇于在枪炮下生存，即便是他们也一定在暗中纵容他们的领导人让战争继续进行。否则，战争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这是贝鲁特，并不是什么巴黎或瑞士模式的异化。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孩子，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们会从巴勒斯坦穿越贝鲁特的郊区，前往一个沉闷的山村——杜勒什维尔，我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到无法说明的程度。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往来是那时我生活中的主要路径。黎巴嫩的群山对我而言象征着我在其他地方从未经历过的不变的沉闷。在漫长的山中

夏日，除了穿越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的两次以外，我们只去过贝鲁特一次。早晨，我们来到一家银行，父亲在那里兑换了一些货币；然后这天剩下的全部时间，我们都会在海滩上度过，在那里游泳是绝对美好的事情。

贝鲁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迅速，在那些年代中，遍布黎巴嫩全国的革命和政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相当数量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被剥夺的阶层，知识分子、政界和商界人士。巴勒斯坦人构成了其中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群体。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以前就一直通过贸易、家庭纽带和历史互相联结。很自然地，被以色列建国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会逃往黎巴嫩，在那里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非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然而，这些各色俱全的涌入，强度非常之大，现在回顾来看，这种强度大到令黎巴嫩无法承受。人们可以从贝鲁特的外观上发现这一点，它从一座围绕中心区建造各种边远区域（大部分是基于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拥有无数建筑的城市；有些房子非常别致，有些则建造得很糟糕。少数区域——比如阿什拉菲耶，仍然是基督教徒和中上阶层的区域——保持着派别的区域结构；其他地方则完全扩张成任何能够创造利益和带来好处的区域。夜总会、饭店、时装店和银行是那个时期首选的增长行业。到 70 年代中期，西贝鲁特已经成为一个巴勒斯坦区；与那些最大的难民营接壤的法卡哈尼区，被人称作“巴勒斯坦共和国”。

当贝鲁特变成世界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时，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那是石油经济爆发的结果，加速和夸大了所有已经在黎巴嫩逐渐发生的过程，尤其是在贝鲁特。在经过几乎 30 年令人不满意的转变后，1972 年至 1973 年间，我第一次在贝鲁特度过完整

的一年；在我仍然清晰的关于那年的回忆中，最显著的感觉就是，在那时的贝鲁特，任何事情都显得有可能——所有种类的人、所有的主意和身份、所有极端的财富和贫穷——所有这一切不连贯又是如何减弱，甚至消失在那一刻的快乐或苦恼中，诸如有关黎巴嫩南部的一次杰出的研究讨论，或者是以色列对那一地区的恐怖残酷的袭击。那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贝鲁特期间，我得以在阿拉伯语言和文学领域中重新自学；在之前的20年中，我一直专注地学习西方文学，而现在我终于能够体验自己民族的丰富传统。由于这同时也是巴勒斯坦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复兴时期，我在贝鲁特的这一年以及之后在那里度过的一系列夏天，成为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时期。

70年代初那些日子里的一段情节，令人忧虑地提示了即将到来的灾难。1971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计划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自1942年以来他就一直热爱的山村。父亲在那里十分知名，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对杜勒什维尔给予过捐助。自从他1963年迁往黎巴嫩以后，他结交的大多数朋友都来自那个山村。然而，当我们要在当地的墓地购买一小块土地时，我们遭遇了荒唐的经历，直到如今这段记忆仍然令我愤怒，因此不愿意列举具体的细节。这样说吧，我们无法与杜勒的任何基督教堂达成购买协议，只除了一座教堂例外，但是当这座教堂接受我们的出价时，我们已经接到了如此之多的电话炸弹恐吓，以至于只能彻底结束我们的计划。我意识到父亲仍然是一个外人，一个巴勒斯坦人（陌生人，是比较婉转的说法）；无论当他在世时村民们是多么快乐，当地人绝不愿意忍受他的长期存在，即便是在他过世之后。

这发生在1975年的“事件”之前，然而在当时，黎巴嫩人

日常生活中的分隔已经令人不知所措。突然间，在 70 年代中期，人们意识到这些分隔已经存在，但分隔间却没有连接的走廊。这些分隔甚至不在同一片连续的土地之上。贝鲁特变成了互相交迭的区域的汇集，并且向外延伸到阿拉伯世界、欧洲、美洲和以色列——这些延伸和利益，将轻易打破黎巴嫩实际地理疆域内残缺的平衡。第一批路障出现在 1975 年的夏天，我还能记得自己那时被害怕和无常所震惊的感觉。那是 8 月的一个星期日，我驾车穿越东贝鲁特前往山间度假胜地布鲁马纳。在一条我几个星期来一直通过的街道的尽头，有一个用木头和带刺铁丝网做成的路障，还有挥舞着自动步枪的年轻人正在巡逻。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在瓦解的贝鲁特中最通常的感受——作为一个平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只能无助地任凭武装者处置，而这些武装者的官方指挥却在他处。你可能在任何地方被杀，而指挥这一切的人却正坐在遥远的叙利亚宫殿、美国使馆、以色列办公室，或是黎巴嫩的牧人小屋中。

黎巴嫩社会学家萨米尔·卡拉夫^[5]所构筑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说，拉斯贝鲁特^[6]，是从西贝鲁特伸向海面的海岬，在那里坐落着美国大学^[7]；直到内战之前，拉斯贝鲁特区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无宗派的、兼容和开放的社区，由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商人和艺术家构成，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巴勒斯坦文化和思想复兴的大部分都发生在拉斯贝鲁特。我想，卡拉夫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哀悼拉斯贝鲁特消逝（如今被分配给了德鲁兹和什叶派）时可以谅解的愤怒当中，他并没有足够地承认，当拉斯贝鲁特陷入绝境时，大多数人已经持有潜在的宗教和派别的意识。而事实是，在拉斯贝鲁特，就像是在大贝鲁特地区，每个

人都知道其他人的宗教、派别和种族起源。的确，一切几乎只是人们下意识的认识，但它们确实被注意着。你知道，也听人说起，瓦赫是从士麦那^[8]来的亚美尼亚人，活跃于马龙派政治中；或者莫纳是个逊尼派知识分子，很受萨特和阿卜杜尔·纳赛尔的思想吸引；又或者维奥莉特是个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与阿拉伯民族运动共命运。

在我从那里离散的日子里，有关贝鲁特这个城市，以及它作为主要城市的抑郁的命运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一是它的边际性。在这个拥有密集人口的大都市里，人们把彼此分裂，却与任何一种核心对抗没有明显的关系——也没有任何可以详细说明的原因来这么做——世界相当着迷地在旁观看，却几乎没有卷入其中。贝鲁特是个自由的地方（对于那些有能力负担的人来说），它拥有自由的媒体，它为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最为全球性的娱乐和休闲。这一切似乎都没什么留下，尽管荒谬地，黎巴嫩的书籍、报纸和杂志仍然轻而易举地成为这个地区的最为活跃的出版物。

关于贝鲁特悲惨命运的第二点，是宗教和派别信仰所扮演的阴险角色。我惭愧地承认，有关我朋友和家庭表达宗教观念的大量早期回忆都是令人难受和不愉快的。1954年，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穆斯林是灰尘，他们应当被吹走。”另一个优秀的基督徒、著名的哲学家和前黎巴嫩外交部长，则经常使用“纵欲”“伪善”“腐败”和“堕落”之类的词语，向我谴责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先知。后来我发现，这些并不是单独的观点。任何关注过黎巴嫩或者这个地区其他地方基督徒好战性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构成了少数派观点的核心，而这则反过来，为占大多数的穆斯林社会安排了一个永远的激怒理由。这样的表达往往而且显然已是互相

的。结果就是一种统一的仇恨，威廉·黑兹利特称之为“仇恨的快乐”。黑兹利特说，这种快乐的一个特点是，它“腐蚀宗教的核心，然后把宗教变成怨气和固执；它拿爱国主义作为借口，把枪支、瘟疫和饥荒带入其他的土地：它事实上什么也没留下，只除了吹毛求疵的精神，以及对他人行为和动机的一种狭隘、妒忌、审问式的警觉”。这些话与扫荡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以及美国，历来都有介入这三个国家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显而易见。

无法否认，人们为贝鲁特的堕落感到极度悲哀和愤怒。我能肯定，这两种感情在我写下的文字中清晰可见。我无法完全了解，贝鲁特的公民们经历了些什么（虽然玛丽亚姆偶尔会向我简单说起那种非常深重的悲哀），但是我能斗胆地代表如同我这样的离散者——贝鲁特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家——做出回应。无论我们说过多少关于黎巴嫩的腐败、肤浅和暴力的话，如今我们却发现自己被可怜地撇在一边。贝鲁特的天才在于，当阿拉伯世界里的阿拉伯人变得压抑、单调和无法容忍地平庸时，它立即对我们的需要做出回应。在几年中，任何人可以在贝鲁特燃烧出激烈、如宝石般的火焰；即便是这个城市的罪恶与放荡，也有你在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才华。当代贝鲁特唯一没有给我们的，是保持它的力量，或者说，在它耀眼的热情好客之下，贝鲁特没有对其易碎的基础给予足够的关心。在这些黑暗时期中的主要安慰，是认为既然贝鲁特曾经从黑暗中崛起，那么它将再次从灾难性的毁灭中复兴，并且会有更加团结、更加人道的公民。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及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普遍来说——增强容忍和共性的好处是确定无疑的。

译注

[1] 斯坦·劳雷尔 (Stan Laurel, 1890—1965), 奥利弗·哈迪 (Oliver Hardy, 1892—1957), 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戏剧搭档。两人于1926年开始合作, 在之后的30多年里, 瘦子劳雷尔和胖子哈迪创作了100多部无声和有声影片, 风靡全球。在影片中, 劳雷尔总演到处闯祸的傻瓜, 而哈迪则总是扮演自以为是的戏剧性庄重人物。

[2] 网格分析和显示系统 (Grid Analysis and Display System),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发展的、用于分析和显示大气资料的一种功能强大的软件系统, 推进了大气科学业务和研究可视化的进程, 已在日常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3] 角色扮演游戏 (Role-playing game), 电脑游戏中的一种。在游戏中, 玩家扮演虚拟世界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特定角色, 在特定场景下进行游戏。角色根据不同的游戏情节和统计数据 (例如力量、灵敏度、智力、魔法等) 具有不同的能力, 而这些属性会根据游戏规则在游戏情节中改变。

[4] 喀秋莎 (Katyusha),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火箭炮的流行名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 萨米尔·卡拉夫 (Samir Khalaf), 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行为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中东的全球和本土遭遇》《再造的贝鲁特》《黎巴嫩的困境》等。

[6] 拉斯贝鲁特 (Ras Beirut), 意思是“贝鲁特的尖端”, 是西贝鲁特的一个区。

[7] 即贝鲁特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简称 AUB), 中东极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成立于1866年, 是一所独立和非宗派的私立大学。

[8] 士麦那 (Smyrna), 即伊兹密尔 (Izmir), 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 第三大城市。古时为爱琴海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曾有“亚洲第一城”称号。现为重要工业城市, 有纺织、食品加工、烟草加工、船舶制造、拖拉机工业等工业。